

EA97/29
辑首词语：国务院总理李鹏语录
中共聊城地委委员、高唐县委书记王国生题词
高唐县县长路广业题词
政协高唐县委员会主席孙桂香题词

封面题字：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董凤基

封面照片：国营高唐棉纺织厂并粗车间副主任、山东省“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人大代表刘志霞在车间辅导操作（1985年）

主 编：吴 宪 明

编 辑：王 琴

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同历史和国情教育结合起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摘自国务院总理李鹏1993年3月15日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發揮窗口作用
吸引起來
越聚越多
的人
熟悉
高店
熱愛
高店

王國生
九三年
書

溫故而知新

路平也

九三·五·五

以史為鑒振興經濟

孫桂魚

九三、

五十六

政协高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1993年3月五届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邵庆臣
副主任：吴宪明 耿玉玺
委员：田中玺 白玉华 李玉祥
赵瑞生 郭玉珍 程辛木

目 录

- 国棉厂的建设与发展.....田身修(1)
- 沙荒变绿洲.....于卫青(18)
- 金融事业发展梗概.....祝秉仁(30)
- 商联会会长王长庭二三事.....张兰亭(38)
- 忆“同仁堂”中药铺.....宋德臣口述 王琴整理(41)
- 郝家当铺点滴.....张立亭(47)
- 朱九武生平.....徐惠英(50)
- 余热献人民.....**杜道时**(54)
- 杜道时简历.....空军十六航校(63)
- 介绍同乡参加革命.....董 华(66)
- 姚彤辉传.....姜维扬(72)
- 浅忆房雪蓑.....杨胥先(77)
- 郭瑞林血战疆场.....于海舰(81)
- 刘文豹勇斗日本兵.....吴光中(85)
- 京剧在高唐.....鞠立楷 张兰亭(88)
- 张少英小传.....石超昆(95)
- 大石漂游录.....朱希江 刘恩水(99)
- 朱昌祚为民请命.....石业华(113)
- 武进士轶事.....杨胥先(117)
- 刘清如先生.....于海舰(120)
- 周化南事略.....周善宏 王 琴(123)
- 古代历史人物简介.....文史科(129)

县政协的沿革发展.....		吴宪明 (144)
光荣的事业.....		李兴成 (165)
李开芳部久据高唐.....		史唯真 (171)
移民溯源.....		何庆臣 (177)
郝祖修花钱买郎中.....		张立亭 (181)
万家洼.....		杨金龙 (183)
胡家林.....	吴光中	胡文泉 (186)
王辛庄民兵叛变真相.....	张艺民	孔宪忍 (190)
杀人魔王刘昭祺.....	孔宪忍	张艺民 (194)

国棉厂的建设与发展

田 身 修

国营山东高唐棉纺织厂，始建于1958年，初名“高唐县棉纺织厂”，1966年更名为“济南仁丰棉纺织厂高唐分厂”，1972年定名为“国营高唐棉纺织厂”。三十五年来，这个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中型企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她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记实存真，有利于以史明目，努力奋进，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

英 明 决 断

1958年，中共高唐县委、县政府在上级“大办工业”精神指引下，结合高唐实际情况，决定发挥高唐棉花优势，兴建高唐棉纺织厂。当时，规划确定该厂的生产能力为3000枚纱锭，100台布机，人员编制300余人。上级领导调县武装部副政委亓维修任厂党支部书记，县社的王善起、刘香才同志分别为正副厂长。山东省纺织厅高度重视和支持这个厂的建设，派高级工程师陈景美、车××前来帮助工作。后来，陈、车二位同志分别接任正、副厂长职务。随他俩前来支援建厂的还有数十名工程技术人员、科室管理人员和车间技术人员，他们对加强高唐棉纺织厂的生产建设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该厂不久便生产出18—21支棉纱和平面白布，高唐县从此开始了机械化纺线织布，逐步取代了传统手工纺线织布的生产方式。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县商业局、百货公司积极包销棉纺织厂的产品，除保障本县供给外，还运往全国各地销售。各乡镇许多棉农也纷纷送棉到厂里来加工棉纱或棉布，高唐棉纺织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逆境求生

1959年至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促使经济复苏。中共高唐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关停并转了部分企业，保留了棉纺织厂、电厂、油厂等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企业。当时，棉纺织厂的职工大部分下放到农村支援农业第一线，少数职工调动出厂，只有十余名职工留守本厂。中共高唐县委、县政府为加强棉纺织厂的留守工作，先后调田身修、华永恩、庞承禄进厂建立了党支部，华永恩和田身修同志分别任正副书记。他们带领留守职工尽职尽责，保证了国家财产完好无损。1964年，聊城地区经委决定将高唐棉纺织厂的一百台布机调往临清棉纺织厂，中共高唐县委、县政府几次向上级反映意见，要求保留布机，但未能如愿。县领导坚持要求恢复棉纺织厂的生产，于1965年下半年，派田身修同志赴省纺织厅（驻青岛）汇报要求恢复生产事宜，先后往返十几次请示。省纺织厅派工程师邹××前来调查了解，副县长张警民和办公室主任王贤功汇报了情况。邹工程师认为厂房旧，不具备恢复生产的条件。后来，县委、政府提出创

造条件恢复生产，省纺织厅领导明确指出：“如果高唐解决不了厂房问题，就将原高唐棉纺织厂的纺纱机全部调出，不再在高唐设棉纺织厂了”。县政府及时召开办公会议，决定将酒厂的车间、仓库、酒精塔等房屋全部划归棉纺织厂使用，以解决恢复生产之急需。县领导当即写出申请棉纺织厂“上马”的书面报告，再次派田身修、李友庆同志向省厅呈递报告作口头请示。省厅答复在次年(1966年)的计划会议上定高唐棉纺织厂这个项目。1966年3月，全省计划会议召开，高唐县委副书记张警民、计委主任张永庆参加会议，田身修同志作为会外人员列席了会议。当时，正值全国上下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加强“三线”建设。高唐县是山东省的内陆县份，属“小三线”地区，在高唐建棉纺织厂符合形势要求。省计划会议确定采取“母鸡下蛋”滚动发展的方式，以老厂办新厂，建设高唐棉纺织厂。山东省经委和财政厅分别下达(66)经企良字第129号文和(66)财建贷字第101号文，批准济南仁丰棉纺织厂(现为济南第三棉纺织厂)在高唐建分厂。初建规模为5000枚纱锭(包括原有设备生产能力)，100台布机，总投资54.9万元，其中财政贷款26.5万元，济南仁丰棉纺织厂出资28.4万元。省纺织厅办公室主任陈九如，召集由济南仁丰棉纺织厂负责人和高唐县代表田身修参加的接头会，研究建厂事宜，确定当年三月底以前，济南仁丰厂领导带领技术人员到高唐实地考察。1966年3月31日，仁丰厂党委副书记孙浩义率领宋品三、解焕威、米伯明、刘学傲等六位同志来到高唐，了解第一手资料，和高唐棉纺织厂的领导一起具体规划建厂工作。当时高唐接待条件很差，济南来的同志住在原高唐棉纺织厂办公

室，吃饭在酒厂食堂，他们情绪饱满，积极开展工作。选择厂址，初考虑厂址设在原内燃机厂，经过反复讨论，后又决定在原高唐棉纺织厂兴建。规划方案确定后，济南仁丰厂的孙浩义、宋品三带领工程师和技术员（包括基建木工等方面的技术人员）来高唐工作。仁丰厂党委安排宋品三同志负责整个基建行政工作，土建施工由郑德镇同志负责。1969年5月17日省纺织工业局颁发“公私合营济南仁丰棉纺织厂高唐分厂筹建处”印鉴。同年5月30日高唐县人民委员会印发高办行字（66）第15号文件，成立济南仁丰棉纺织厂高唐分厂筹建委员会。筹委会由11人组成，分管高唐县工交财贸工作的副县长张警民为主任委员，仁丰厂党委副书记孙浩义、高唐县工会主席董宏光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县物资局、交通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筹委会下设办公室，孙浩义兼办公室主任，开维修任副主任。筹委会成立后，党组织也随之建立。中共高唐县委正式明确原纺织厂党支部为筹委会党支部，从济南和外地调来的中共党员均介绍到这个支部参加组织生活，至1966年底这个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已有四十名之多。党员们在党组织和筹委会的领导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高唐棉纺织厂的恢复和发展努力工作。

合作结硕果

高唐棉纺织厂的恢复生产和顺利扩建，是济南仁丰厂和高唐县通力合作的结果。两个单位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不分彼此，互相支持，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济南仁丰厂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积极给筹委会配备技术人

员，将来高唐工作的孙浩义、宋品三、解焕威等同志的粮户、组织关系，尽早转到高唐，随后又给大批技术人员办理了调动手续。仁丰厂认真做好支援“三线”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来高唐工作的同志认识到支援“三线”建设的重大意义，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期望，做出优异的成绩，报答党的关怀。他们在工作中，积极务实，不怕苦不怕累，施展了过硬的技术本领，给高唐的干部职工以巨大鼓舞。当时，从济南调来高唐的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丁茂祥的老技工，他来高唐后，喜添一子，就给孩子起了个“三线”的名字，以示支援“三线”建设的决心。丁茂祥同志的心意，表达了济南人的共同心愿。高唐县委、县政府积极与仁丰厂配合，及时给筹委会调配了党务、行政、后勤干部，将原高唐棉纺织厂干部全部移交给筹委会，又先后调开维修、朱杰三、李炳汉、封瑞亭、卜文华、殷传尧、傅宗明等同志来纺织厂加强筹建工作。另将县城鼓楼（遭地震破坏）的木材（美国松）调拨给筹委会，用于建设厂房，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大力支持棉纺织厂的筹建工作。筹委会在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很快组成了财务、土建、安装、行政、后勤等专职部门开展工作。首先是狠抓了基建工作，对原酒厂的车间、仓库、酒精塔进行了改造，新建了细纱车间和织布车间；其次组织了招工，招收了本县120名亦工亦农轮换工（三年后均转为正式工），招收了聊城青年80名。这200名新工人于1966年8月1日入厂后，在筹委会的领导下边学习，边劳动，平整场地，搬运设备，工作积极性很高，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和考验。筹委会为了提高这批新工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安排王大海、封瑞亭带领他们赴济南“老厂”学习技

术，于1967年2月回厂上岗。筹委会在筹建工作中，按照“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处处为生产建设着想，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当时，为给职工解决住宿困难，曾发动职工自己动手脱土坯盖土房（干打垒），没有床铺就搭地铺。职工们以“铁人”王进喜为学习榜样，发扬“三老四严”作风，为建设高唐棉纺织厂立下了汗马功劳。如老工人朱信福、新工人姜连祥（女）等，思想作风过硬，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的表彰和职工群众的赞扬。县直各部门、各单位也大力支持棉纺织厂的筹建工作，百货公司职工送货到厂，在土坯房里设门市部，连续经营了几年。经过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1966年底，基本完成了土建工程，随即转入紧张的设备安装阶段。经过近两个月的日夜奋战，完成了5000纱锭和104台布机的设备安装任务，1967年2月正式开工投产。投产后，又面临着电力不足和温湿度难以控制等难题，筹委会带领干部职工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确保正常生产。用电不足，就采用柴油机发电辅助供电的办法来解决（有潍坊调来的300马力柴油机一台）；柴油机不好发动，就组织人工拉启动轮发动；温湿度没有条件控制，就采取“笨办法”解决，用田楼、祁寨村湾坑里的冰块降温，终于保证了生产的需要，战胜了困难，生产出精美的棉纱和白布。产品品种有18支、21支等5个棉纱品种和3个平面白布品种。当年生产棉纱550吨，棉布64万米，总产值232万元，为国家创利税39万元，取得了合作建厂的辉煌成果。

乘 胜 前 进

高唐棉纺织厂发展生产的大好形势，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1968年5月20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以(68)计办工字第57号文批准高唐棉纺织厂续建、扩建5000枚纱锭，304台布机。厂领导和广大职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边生产、边扩建，做好各项工作。同年7月17日，高唐棉纺织厂征用城关公社二街村6.6亩土地，8月19日聊城地区建筑公司承包高唐棉纺织厂续建工程。续建工程项目有9700平方米主厂房、270平方米锅炉房、烟囱一座、2600平方米宿舍和厂区道路等。山东省纺织设计院设计的9700平方米主厂房，全系单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锯齿形屋顶，跨度大，采光充足，重要生产车间铺设菱苦土化学地坪，硬度适宜，不宜起尘，符合标准设计要求。在各项准备工作如期就绪情况下，1968年10月23日破土动工，棉纺织厂的生产建设进入新阶段。

1968年9月6日，高唐县“三支两军”领导小组适应形势要求，加强国棉厂领导班子建设，批文成立了高唐棉纺织厂革命委员会。朱信福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宋品三、朱杰三同志任副主任。全厂干部职工在厂革委会领导下，齐心协力，边生产边建设，于1970年初，建成“一条龙”生产线，生产出18×18斜纹布，18×18华达呢，18×18咋叭布新品种。1970年底，整个主厂房工程全部竣工，并购进、安装了1511型布机782台(报废两台)，形成了884台布机的生产规模。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行政组织建设也逐步完善起来。1969年

11月6日各科室和车间建立了连、排、班民兵组织，以此推动生产。厂部还设立了群工组和福利委员会。田身修、彭寿松分别任正副主任，具体抓全厂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工作，对当时的生产起了很大促进作用。1970年1月24日，高唐棉纺织厂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孙浩义、李炳汉两位同志任副组长。1970年6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唐棉纺织厂，对厂革委会进行了调整、充实。军宣队队长、部队参谋长袁学久同志任厂革委会主任，全面掀起“向解放军学习”的热潮，大力开展“四好连队”和“五好职工”活动，年底总结评比出十个“四好单位”，273名“五好个人”。1971年4月1日，高唐棉纺织厂建立政治部和生产指挥部，孙浩义任政治部领导小组组长，亓维修任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田身修任生产指挥部政治指导员，进一步加强对政治工作和生产工作的领导，生产任务不断增加，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至1972年6月底职工人数已达1000余人。为贯彻毛主席的“民兵工作三落实”号召，1972年6月15日成立了高唐棉纺织厂民兵团，袁学久任团长，厂革委会副主任鞠洪恩任政委，通过民兵组织形式，发挥行政管理和生产指挥作用，推动各项工作。为了发展配套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厂领导研究决定筹建印染车间，决定由林治文同志分管，刘伟同志负责，带领老工人张俊生等30名同志组成印染车间。这些同志积极工作，建成了染槽十几个，置烘干设备若干，染出青、兰色布几万米，后因无拉宽设备而停产下马。

经过全厂职工五年多的共同奋斗，高唐棉纺织厂较大的生产规模基本形成。1972年10月，济南仁丰棉纺织厂高唐分厂移交给聊城地区管理，更名为“国营山东高唐棉纺织

厂”，改变了与济南老厂的隶属关系，两厂成为兄弟厂家，保持业务关系。高唐棉纺织厂隶属关系变更后，聊城地区纺织工业局进一步加强高唐棉纺织厂的组织建设。1972年10月31日，国营高唐棉纺织厂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高唐棉纺织厂委员会。山东省“五七”大队下放干部庄铭丁同志任党委书记，老红军吴贵珠（12级高干）任党委副书记，各车间和厂部机关建立了党支部，田身修任机关党支部书记。1973年3月4日，厂首届团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高唐棉纺织厂委员会，田汝华同志任团委书记。1973年4月26日，“军宣队”完成“三支两军”任务离厂，朱明庆指导员和郑玉坤、汤兆丰两名排长转业留厂任中层干部。1974年11月聊城地委派陈波三同志（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来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革委会主任，陈波三同志当时年近60岁，事业心强，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学会了细纱接头等操作技术，他保持旺盛的斗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给全厂职工树立了榜样，至今受到人们称赞。

厂领导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高唐棉纺织厂实际情况，成立了国棉厂上山下乡办公室，动员了30余名知识青年到姜店乡张井、玉楼村插队落户，并投资一万多元，帮助张井村建了面粉厂，“知青”经过基层锻炼，进步很快，不久就全部回县招工分配了工作，给企业增加了新生力量。1974年7月17日，高唐棉纺织厂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招收培训20名学员脱产学习，壮大了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力量。

再上新台阶

1975年，高唐棉纺织厂根据形势发展和市场需求，开始生产腈纶纱，为创织新产品奠定了良好基础。1975年11月14日国家轻工业部批准高唐棉纺织厂再增加10000枚纱锭的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厂领导利用这一机遇，抓紧组织设备进厂和厂房扩建。高唐县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帮助解决厂地困难，将县皮麻社、防疫站、党校房舍转给纱厂使用，并批准国棉厂招收了580名合同工。这批工人不但对当时的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后来大都成为技术骨干，有力地促进了扩建工作，保证了36784枚纱锭生产能力的发挥，使高唐棉纺织厂的生产建设上了新的台阶。厂领导十分重视发挥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于1977年9月5日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发动了“创优质、夺高产”大会战，宋品三任会战指挥部总指挥，陈波三任政委。会战指挥部首先抓了织布车间“三八”女子检修队先进典型（当时是全省首例），调动全厂女职工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接着又在全厂开展技术操作表演活动，掀起崇尚技术的热潮，不但直接促进了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而且在聊城地区纺织行业技术操作运动会中夺了冠。女工华玉贵技术过硬，获全区第一名和省操作表演能手称号，为高唐棉纺织厂和聊城地区增了光。厂领导及时将职工中蕴藏的“技术热”，引导到创“万米无疵布”和“高产拉练”活动中，涌现出华玉贵、刘志霞、黑佩丽、田俊凤、田海涛等模范标兵。由于技术操作竞赛活动的开展，国棉厂的产品产量不断上升，质量档次不断提高。

1978年生产的“白鸚鵡”32支筒子纱，打入国际市场，产量达182吨，创产值100余万元。厂领导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时研究决定了对厂科技人员的政策。1978年6月6日批准恢复了三人的技师职称、12人的技术员职称，新提拔技术员12人，助理技术员12人，壮大了技术力量。1978年10月18日中共聊城地委任命宋品三同志为厂长。1979年7月23日中共聊城地委决定高唐县委副书记徐祥之同志兼任高唐棉纺织厂党委书记。新上任的厂领导除了抓好生产工作外，毫不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号召职工增强主人翁意识，动员机关科室人员深入车间，调查研究，急车间所急，想车间所想，帮助车间解决实际困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在高温高湿季节里，机关党支部带领机关人员下车间参加劳动，送水到车间台位，鼓舞一线职工战高温，夺高产，职工感受到党的关怀，加深了同党的感情，干劲倍增，不但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而且全面做好党的工作，在贯彻“计划生育”方针的全厂职工大会上，有十五对夫妇自愿报名生一胎，领取了独生子女优待证，奖金和奖品，推动了全厂“两个生产”一齐抓。为了使企业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980年3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162名代表行使民主权利，讨论通过了本厂《1980年的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1980年创优质产品计划》、《1980年财务开支计划》和《1980年至1982年发展计划》，全厂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厂领导又及时组织召开了技术操作表演运动会，狠抓质量管理，使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这一年生产的21×21哗叽和32支纯棉出口纱获得山东省优质产品称号，32支腈纶筒子纱被评为全国优良产品，36×18华

达呢和36合股线获全省同行业优良品种。厂领导关心爱护职工，于1980年9月1日在生产车间正式实行“四班三运转”工作制度，减轻了一线生产工人的劳动强度，受到职工群众的欢迎，

1980年，棉纺织厂各项规章制度基本建立健全，但由于对制度的执行检查不够严格，加之个别职工思想麻痹，纪律松弛，导致了一起严重工伤事故的发生。这年11月26日，清花车间栾振武、林善福两名青工违犯操作规程，林善福被抓包机抓伤，整个右手被打掉，造成终身残废，厂党委认识到这次工伤事故的严重性和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决定将林善福同志被打掉的右手放在药液里永久保存，每年11月26日为棉纺织厂安全教育日。1982年，为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棉纺织厂于3月22日至23日召开了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171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有女代表61名，特邀代表2名，会议审议通过了《厂长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纪律监督、财务监督、伙食监督、住房分配、劳动保护等五个委员会，通过了各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加强了各项工作的具体监督，民主管理工作空前加强。

受挫猛醒

1982年第三季度是纺织行业的黄金季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特大火灾事故在这时发生了，9月27日中午12点，正是职工们吃午饭的时候，突然，露天原棉仓库的腈纶垛燃起了大火，火势凶猛，火苗窜至好几丈高，黑烟滚滚，直冲云霄，一、二十里外都能看到，全厂职工震惊异

常，迅速赶到现场奋勇扑救，田汝华副厂长和田身修同志指挥带领青壮年闯入火海中抢运财产物资，用各种灭火工具救火，县消防队全力扑救，济南市和兄弟县（市）闻讯派消防车赶来了，由于道路狭窄，车辆拥挤，又不能靠近火源，所以，火势仍不能完全控制，时至中午两点多钟，在聊城开会的厂长宋品三等人回厂即加入了组织灭火的战斗，这时，火势已逐渐减弱，五点多钟大火被扑灭，厂领导及时组织人员清理现场，安排善后工作。这次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2219000元之多，是建国以来聊城地区发生的最大一起火灾事故，地区领导对这次事故高度重视，派地区纺织局徐祥之局长带工作组进厂调查事故原因，进行整顿，经过反复调查证明，这次火灾事故是一次责任事故，张朋贞（城关二街建筑队队长），无视“厂内严禁吸烟”的规定，将烟头扔到腈纶棉垛底，引起火灾，张朋贞是造成这次火灾事故的直接责任者，他触犯了刑律，构成犯罪，公安机关将其依法逮捕，后经试验，烟头不会引起明火，改变了对张的处理。郑际春，身为值班警卫，邀集数人在距起火点八米远的警卫室喝酒，竟未发现火情，不负责任，玩忽职守，被判刑三年（服刑中死亡），宋品三，身为厂长，犯严重官僚主义错误，长期不重视安全工作，对事故应负领导责任，但他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检讨深刻，受留党察看二年、撤销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职务并降低一级工资的处分。市委常委、副厂长田汝华，分管生产，对安全工作重视不够，对事故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他决心改正错误，受撤销常委职务和记大过处分。市委常委、副厂长王茂端直接分管原棉科，对事故也负有一定责任，受党内警告处分。其他事故有关人员，如原棉科负责人、

保管、警卫人员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党内和厂纪处分。全厂干部职工引以为戒，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安全措施，并评出救火有功人员230多名。厂领导召开全厂大会向救火积极分子颁发奖状，对下步的安全工作提出了要求，动员全厂职工为挽回火灾造成的损失加倍努力工作。在副厂长田汝华的主持下，各项工作抓得很紧，生产稳步上升，工作秩序正常，出现了新的局面。火灾发生距今已十周年，人们依然记忆犹新，十年来的实践证明，高唐棉纺织厂的领导和全体职工一直重视安全生产，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再次发生。

班子更迭保发展

1983年3月22日，中共聊城地委任命綦孝兰、李吉信为厂党委副书记，綦孝兰主持党委工作，同年4月5日，聊城地区行署任命田汝华、魏善林、孙泽民、牟聚华为副厂长，田汝华主持全面工作。在1984年召开的中共高唐棉纺织厂第二届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厂党委，魏善林任党委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高唐棉纺织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玉珉任代理书记。1984年6月28日，中共聊城地委任命牟聚华为厂长，7月14日厂长任命田汝华、李志军、王大海为副厂长，8月14日，厂长聘任中层行政干部，正当新组成的领导班子成员准备为高唐棉纺织厂的腾飞大显身手的时候，一盆冷水浇来。8月9日凌晨，暴雨倾盆而至，降雨量高达170毫米，全厂956间房屋被淹，职工被迫停产救灾，水灾造成经济损失29万元。

1985年4月3日，高唐棉纺织厂召开第二届团代会，选举

产生了共青团二届委员会，作出有关决议，选举赵新兰任团委书记，团的工作跃上了新台阶。4月8日至9日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工会工作报告》、《厂长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厂规厂纪》、《职工住房方案》和《关于实行民主评议干部制度》等，成立了生产经营、提案落实、监督等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1985年6月9日，聊城地区将高唐棉纺织厂下放高唐县管理，隶属工业局。县委、政府很关心棉纺织厂的生产和发展，县经委、工业局大力支持厂的各项工 作，同年12月11日新安装两台锅炉，购进新型精梳机一套（四台），对更新产品、提高质量和增加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棉纺织厂开始实行厂长责任制，明确党政工团职责，理顺相互关系，进一步发挥三方面的积极作用，全厂紧紧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环节，实行厂长全权负责、党委核心领导、职工民主管理监督体制，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内部改革和生产的发展，当年实现利润近二百万元，比1984年提高38%，被聊城地区评为文明建设先进单位。1987年5月，棉纺织厂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除通过有关决议外，决定再扩建一万三千纱锭项目，将全厂划分为纺场、织场、机动场等三个分场，以便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1989年3月15日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清水和赵春美为工会正、副主席，通过了有关报告和决议，确定新建3300平方米五层教育中心大楼。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中共高唐棉纺织厂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魏善林为党委书记、王玉珉为副书记、牟聚华、李清水、田汝华、颜廷林、曹东镇为委员的七人委员会，加强了对一万三千纱锭扩建工程的领导，保证了1990年

顺利投产使用。1991年教育中心大楼破土动工，1992年10月已完成主体工程，包括装饰工程可在1993年5月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棉纺织厂在高唐县城首先竖起五层大楼，为城市建设增添了新的光彩。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高唐棉纺织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对县毛纺厂、麻纺厂、染织厂、高申棉纺织厂及聊城、莘县的有关单位，派出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帮助进行设备安装、技术传授、企业管理和物资配件供应等工作，并且输送很多技术人员到这些厂工作，还曾派出杨磊工程师到国外（圭也那）援建棉纺织厂，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尽了微薄之力。

现状令人欣慰

1992年聊城地委行署任命田汝华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于振福、王大海、张四清、吴建秀被聘为副厂长，赵衍亭、曹东镇为厂长助理，郭玉庆为总工程师。调整充实后的新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按照“高、严、精、细、好”五字标准向上攀登，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迈进，全厂工作蒸蒸日上。到1992年10月，已发展到拥有5万枚纱锭的生产规模，布机拥有数量达到858台，年生产能力可达7500吨棉纱，2400万米棉布。主要产品种类有棉纱、腈纶纱、涤棉纱、棉布、涤棉布、哗叽、平布、细布、府绸等高中低档不同品种二十多个，产品质量大大提高。32支腈纶和纯棉筒子纱走出国门销往东南亚国家，21×21哗叽、30×36化

纤布、30×40府绸和32支纯棉纱获优良产品称号，适应了市场需求，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在该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4000万元之多，厂区占地面积287.1亩，其中生产区占地169.75亩，非生产区占地117.35亩，建筑面积99175平方米，续建工程竣工后总建筑面积可达102475平方米。厂内组织机构设置符合实际需要，厂党委下设办公室、纪检委、组织科、宣传科、教育科、人武部、工会、团委等，各车间建立相应的基层组织。厂部下设办公室、总工程师室、生产计划科、质量检查科、设备科、技术科、安全科、计量节能科、电力科、供销科、财务科、审计科、销售科、原棉科、基建科、保卫科、总务科、房管科、卫生科。主要生产车间有清花车间、梳棉车间、并粗车间、细纱车间、准备车间、后纺车间、织布车间、整理车间。此外，机修、电力、锅炉空调等辅助生产车间也一应俱全。全厂职工3420人，其中干部总数372人，具有技术职称者242人，具有中高级职称者31人，车间干部121人，科室干部175人，附属单位干部76人，一线生产工人3048人。职工生活福利设施齐全，有食堂、卫生室、托儿所、技校、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劳动服务公司、宿舍管理室等后勤服务机构，形成了优美的环境和方便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保证了生产正常进行，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目前全厂干部职工，正在积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奋发图强，努力发展大好形势，创造更加光辉的业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沙荒变绿洲

——记清平镇黄淮海农业开发治沙示范区

于 卫 青

古语道：偏远处自有好景致。如果您到清平，就会发现这里有一处鲜为人知、丰茂秀丽的好地方——清平新村。

步出清平北门，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路会把您引向前方不远处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大路的两旁，阡陌纵横，沟渠交织，把整体分成了很有规则的方块。五行繁茂挺拔的白杨树整齐地排列在每个方块周围，宛然一道绿色屏障。方块里面，低矮的果树、种类繁多的庄稼蔬菜相间分布，错落有致。绿丛掩映中，隐约显露出座座红砖瓦房。时值仲夏，好浓郁的绿！其实，这里四季都有美不胜收的好景色。春天，这里是花的世界：春风催促着，桃花、杏花、梨花、苹果花竞相绽放，争鲜斗艳，粉的似霞，白的似云，辛勤的蜜蜂嗡嗡嘤嘤，忙个不停，轻盈的蝴蝶扇动斑斓的翅膀在花丛中来回飞舞……。这里的秋天是丰实的：沉甸甸的谷穗谦虚地低着头，硕大的棉桃欢喜得咧嘴笑，一串串的葡萄似珍珠，赛玛瑙，黄澄澄、金灿灿的苹果和皮薄肉厚的鸭梨把枝头压得弯弯，诱人垂涎欲滴。这里，冬天如果下一场雪，又完全变成了玉树琼枝、粉妆玉砌的迷人世界……

这里吸引您的或许是沟渠清水中成群的鹅鸭，悠然自得地游动；或许是林间草地上的群羊和牧狗，欢快地嬉闹、追

逐，或许是牛背上的牧童，吹着响笛，婉转悠扬……。

也许您会惊叹这无际的绿，陶醉于这天然的美，沉浸在无限美好的遐思里。

然而，这里既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不是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别墅。路旁，一个影壁式醒目的路标：

黄淮海农业开发治沙示范区3331127工程

解放以前的千百年间，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据《黄河志》记载，西汉时期黄河频决，多次改道。这片沙区就属黄河故道的一部分，在高唐县呈西南——东北走向。多少年来，这里风沙肆虐人迹罕至，白茫茫、光秃秃、大大小小的沙区横亘在这片土地上悄无声息地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隋代开始有人从山西洪洞、山东东部等地相继迁来，开始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顽强的斗争。可是大风起时，黄沙蔽日，即便是白天，屋里也阴暗得非点灯不可。每年春季，古老的清平城总是被沙土淤埋，人们要踏着沙土从城外平地一直走上近三丈高的城墙，官府不得不组织民工把清平城从沙土里“扒”出来。解放后，清平城外还有几个二、三丈高的沙区。据说那就是“扒”城的遗迹。曾路过这片沙区的人们常常心有余悸地感叹：推着小车到了家，还忘不了清平那片沙。凭着大风的威力，沙丘肆意搬迁，没有固定的地貌。也许就在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沙丘不见了，平地上突兀出现了一个新沙丘，被沙土埋着的树木只剩下树头的枝丫零落地露出沙面……在这里，屋毁人亡、村宅并逝的惨剧无情地演示着，许多沙区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直至

清代，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繁衍生息，这里依旧是一片破败景象。清代的一位县令曾提出在这里植树造林的设想。在那个时代，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到解放前夕，沙区的农民还按风沙控制下的特殊节令安排农业生产活动。俗话说：三月青，四月黄，五月不误种高粱。这里因为立夏前风头高，气候不稳定，沙害比较严重，即便这样，农民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照样今天种，明天刮，后天苗搬家，颗粒难收。“黄风一刮家家愁，沙埋庄稼汗白流；年年月月把地种，十年有九不得收。”这首民谣充分反映了人们憎恶为害深重的风沙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恶劣的自然条件，原始的耕作方式，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茫茫飞沙给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把治理这片沙荒作为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千秋大业来抓，率领群众以扭转乾坤的气魄和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人力、物力大规模地开发古老的荒漠。

五十年代，国家投资在沙区中心兴建了国营林场，在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起了良好作用。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虽几次治理，但沙区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的春风最终吹绿了这片沙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平镇党委、政府摆脱了极“左”思想束缚，决心彻底根治沙荒。这首先在领导层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些同志面对这千百年都没能治理好的沙荒顾虑重重。根治沙荒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创举，任务艰巨，照老做法，走老路子是走不通的，必须在全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成功与否？尚是未知。清平镇党委、政府细心学习党的文件政策，深入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过去治沙的经验教训，全面考虑主客观条件，就根治沙荒的必要性、可行性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在扎实细致的工作基础上，领导班子内部克服了畏难情绪，取得了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了根治沙荒的决心和信心。

广大农民群众倍受风沙危害，深知治沙艰难，怀疑政策的稳定性，对根治沙荒普遍存在畏难情绪，持观望态度。为此，清平镇领导深入沙区村村户户，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耐心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消除各种顾虑。经过调查总结，认识到过去治沙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造林大呼隆，管理大锅饭。镇党委、政府集中讨论了承包后责权利的处理问题，把治理沙荒的自主权、管理权和经济利益用承包合同的方式定下来，由镇、村、户三方签字，司法部门公证，让承包户大胆放心地到沙荒安家，扑下身子踏踏实实地搞治沙。这一措施，解除了群众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在镇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鼓励下，广大群众根治沙荒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清平镇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思想统一之后，在县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制定了开发治理万亩沙荒的规划。他们按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近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的要求，采取了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专业承包、适度规模经营的措施，开始实施根治沙荒的工程。

治理工程开始前，清平镇党委、政府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首先，准确掌握沙区情况。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科学认识，全面掌握沙荒，才能对症下药，达到目的。清平镇科技人员通过对沙区作实地考察，从而对沙区有

了一个准确的全面认识。整个沙区1.2万亩，大小沙丘133个，长条土岭6条，沙丘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25个。由于地表水比较缺乏，沙质土壤结构松散，沙粒细小，粘合力小，造成固定沙丘的沙化和流动沙丘，加之缺少地表植被，沙质土壤表层的细小沙粒得不到有效控制，风起沙扬，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沙区面积不断扩展。

其次，宏观控制，统一规划。对于这样大规模连片治沙工程，镇政府一开始就统筹安排。他们按规定的模式，打破了村界，水、土、林、田、路统一规划。以路、沟、渠为界划成均等的方块，每方块30亩，每方块内打一眼机井，盖三间瓦房，由一个农户承包，承包户在方块四周各植五行用材树，约200棵，占地15亩，中部15亩种植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

再次，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承包户。清平镇党委、政府为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制定了八项优惠政策：一是实行家庭承包方式开垦沙荒，承包期三十年，在承包期内有继承权和转让权；二是五年不交农业税，扣除一个河工名额；三是原来在本村承包的责任田，仍由本户耕种；四是本村的沙荒地由本村农户优先承包；五是承包户开垦沙荒所需的柴油、化肥由镇政府给予照顾；六是盖房有困难的专业户由镇政府协助贷款1300元；七是用材林采伐的收入由镇、村、户按1：2：7分成；八是方块地内种植的经济林、庄稼、瓜菜收入全部归承包户。

在做好上述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清平镇党委、政府于1982年冬动员全镇男女劳力，组织五千民工开始了第一期治理工程。如果您参加或亲见集体施工的劳动场面，肯定会被

那热烈、宏阔的气氛所感染，毫不动摇地加入到施工劳动的洪流中去，人们感受到的是肆虐的风沙、数九的严寒，看到的却是到处飘扬的红旗、来往繁忙的人群，听到的是嘹亮的号子声……在这里，您分不出哪是群众，哪是干部，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忘我地苦干着，寒风吹裂了手指，汗水浸湿了棉衣……狂暴的风沙退缩了，严寒也被他们的劳动热情融化了。他们用自己简陋的铁锨、铁锹、祖辈留传的独轮小车移沙整地，挖沟植树，仅仅一个冬天就挖沟渠14条，建桥涵、闸11座，打机井95眼，造林植树八万株，平整土地3000亩，动土25万立方，这为第一批移民安家承包打下了基础，1983年初，清平西关北街12户农民率先进入沙荒安家。到1987年，清平镇已有116户农民满怀治服千年沙荒、要让穷壤变富乡的豪情壮志，在茫茫荒原上安家落户。1987年，第一期治理工程基本完成，彻底改造沙荒3480亩。为巩固沙荒开发成果，清平镇党委、政府投资30万元架线通电，解决了农户生活生产用电。还从镇政府机关专门抽调了三名有实际工作能力、热心服务的脱产干部到沙荒成立了治理委员会，以便做好林、果、棉、粮、瓜菜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

1988年冬季，在第一期工程成功的基础上，镇党委、政府又组织4000人，施工20天，开挖沟渠18条，树沟1224条，总长达137公里，动土133万立方，又新打机井129眼，高速优质地完成了133户的治理单元主体工程。受第一期工程成功的影响，各地群众踊跃承包，镇党委政府采用了投标办法，当年完成了133户的安置工作。到1990年第二期工程结束为止，有233户农民在沙荒安了家，改造沙荒5000亩，近两年

又完成插方2000亩，至今改造沙荒面积总数已逾万亩，现尚有2000余亩沙荒地待进一步开发改造。

随着治沙工程的逐步实施，承包农户的日益增加，沙区生产的迅速发展，人们迫切需要有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1987年10月12日，新村治理办公室成立了，它虽然还不是一个行政村设置，但行施诸如治安、文教、卫生、福利等全部职能。它的建立不仅加强了管理，便利了群众，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原来千百年一片空白的沙区图上诞生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型农村，这在治沙史上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几年来，清平镇党委政府一直把治理沙荒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倾注了大量精力，做了许多细致的实际工作。为保持沙荒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清平镇党委政府迄今虽四次换届，每届党委书记、镇长一直亲自主持这项工作，“萧规曹随”，按既定规划实施。从1982年起，清平镇政府专门派人搜集科技信息，多方联系，购进大量适宜在沙荒生长的粮棉瓜菜品种，聘请专门技术人员。1991年4月，镇政府又从中国药物研究所引进了新型经济作物——杜仲树，并在沙荒试种成功。另外，镇政府为治理沙荒提供农药11吨，化肥3.2万吨，柴油158吨，帮助承包户推销树苗800万株。还投资60万元，组织了三次统一施工，投工35万个。从1987年到1991年，清平镇党委政府高瞻远瞩，投资36万元新建了占地60余亩的清平镇中学。1989年镇政府为解决沙荒承包户的子女就近上学，又新建了一处新村小学。

1982年以来，在清平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积极组织动员下，清平镇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根治沙荒，以他

们顽强的毅力、无穷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使这片古老的荒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治理过程中，人们共搬动土方76万立方，修路55条，长103华里，开挖沟渠32条，长50华里，建桥涵32座，插方10,000亩，植用材林3800亩，果树林2200亩，达29.8万株，面对这一串串的数字，您会有怎样的感受？

清平治沙工程的历史丰碑上永远铭刻着这些领导同志的名字：翟瑞华、李宗生、张程震、成师农、于×秋、曹学亮、郑延柱、孔昭信、杨玉明、武希勇等同志。是翟瑞华和武希勇同志首先提出了根治沙荒的设想，并为规划的制定、工程的实施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李宗生同志风雨无阻，经常亲临治沙现场指导工作；是曹学亮同志拍板决定为首批在沙荒安家的12户农民架线送电；是孔昭信同志及时拨款支持每户打一眼井，为了集中人力施工，他免了清平镇两年河工任务；为了及时供应生产资料，孔昭信同志又单独把新村从十五个乡镇计划中单列出来，每季度都亲自审批。人们至今念念不忘的武希勇同志，是他和翟瑞华、杨玉明同志具体研究了治理措施；是他，不顾黄河水的冰冷，挽起裤子拿着铁锹看着涓涓细流浇灌充满希望的第一批幼苗；是他，在承包户遇到困难而退缩时亲自登门做思想工作，解决实际困难；是他，联系技术传授、良种引进和产品推销……最令人感动的是地区农委于×秋主任，他生前曾多次到新村指导工作，并对新村优惠政策的制定起了重大作用，后来他因癌症逝世了，临终前，他拉着前去探望他的武希勇同志的手深情地说：“我不能再到新村去了，我死后就把一部分骨灰埋在新村，和你们做伴，看着新村发展吧！”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这就是一位老干部、老党员对新村的殷殷深情！正是在诸多这样的干部领导下，新村才有这样历史性的转折和飞跃。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历史。

这一历史巨变也是清平镇人民群众，尤其是承包农民十年来克服无数困难，辛勤劳动的结果。初进沙荒，他们就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场风沙，封埋了刘长亮的房门，早晨风停沙止，沙土把大半截房门封得结实，他不得不先用铁锹把沙土铲到屋里，才能出去。一场风沙，彻底破坏了刘明山兄弟十余日的劳动成果，兄弟俩辛辛苦苦挖好的一千多个树坑，一夜之间竟被风沙淤平！……群众没被吓倒，而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精神同风沙斗争，逐步扎稳脚跟，在党和政府领导帮助下辛勤劳动，安家致富。孙太石，这位朴实的农民，是率先承包沙荒进入沙荒安家的代表，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和领导帮助，他早起晚睡，辛勤劳作，常常晚上点着油灯割韭菜，每天晚上十一点前几乎没有睡过觉，早晨则黎明即起……辛勤的汗水凝结成丰硕的果实，第一年，他种植了西瓜、花生，当年收入1300元，以后每年逐增均1000多元。1988年，他处理了一批杨树收入逾万元。1992年虽然灾害比较严重，他收入也达8000多元。孙太石的精神和事迹不仅积极带动了众多承包专业户，而且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他先后当选为政协高唐县委员会第二、四届常委，第三届政协副主席。李和同志，这位刚在沙荒安家并不太长、很有实干精神的治理办主任，以豪爽朴实的言语表达了承包群众的心声：“一颗心两只手，勤劳致富，奋斗终身战沙丘”。正是因为这些勤劳、顽强的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实现了千百年来根治沙荒的宿愿。

十年的综合治理，改变了沙丘的自然面貌，在沙区形成了立体的防护林体系，特别是林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神奇的“绿色效应”。1992年与1982年相比，平均风速降低了21%，空气平均湿度增加了3%，年降雨量增加了48毫米，水土流失及风沙灾害基本上得到控制，沙荒彻底变了样：原来草木不生的茫茫沙区，出现了一行行白杨树，一片片的防护带，沙区已变成了沟渠纵横，路林成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村。

开发治理，不仅改变了沙区的自然面貌，而且也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九年来沙区粮食总产达153万公斤，皮棉23.4万公斤，花生60万公斤，瓜菜130万公斤，干鲜果品19万公斤，存养牲畜、家禽48981头(只)，林木蓄积量为11834立方，累计资产总值达1105.2万元，是原投资232万元的近五倍。现在第一批用材林已开始采伐，供应市场，果树早已挂果见收，每年还向市场供应大量瓜果和畜产品。在沙荒安家的承包农户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纷纷发家致富。1989年全体专业户收入达64万元，户平均2750元。其中11户成了万元户。1990年，这里遭受了水灾和雹灾，但专业户的收入仍然有所增加，总收入达80万元。其实，只有你走进新村的庭院，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富足的生活。去吧，无论到哪一家，淳朴好客的新村人都会盛情地款待你。走近绿色的庭院，一排宽敞明亮的红砖瓦房出现在眼前，这是堂屋正房。堂房左右的侧房用途广泛，有车库、仓屋、鸡舍、牛棚等等。当你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听着录音机或观看电视节目，品尝着应接不暇的瓜果特产，注意

到室内入时的家俱、电器时，您会真正感受到：新村富了。

当您看到新村人在碧绿的菜畦里清除杂草的时候，当您看到新村人在果香飘溢的庭园里采摘果实的时候，您会有怎样的感受？与其说是劳动，不如说是享受。谁不羡慕他们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呢？

当您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脚下这片千百年来被风沙困扰的土地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时，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自然是伟大的，然而，党领导的人民更伟大。

清平镇治理沙荒的成就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和普遍关注。1988年，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同志专程来这里指导沙荒开发治理工作，充分肯定了清平镇沙荒治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把这一作法总结为“3·3·3·1·1·2·7”治沙工程模式。即：每户30亩地3间房，承包期30年，每户一眼机井，用材树由镇、村、户一二七分成。省地领导同志谭启龙、王乐泉、郑义堂、徐祥之等先后来这里视察工作，对这里的开发治理予以高度评价。1988年，清平镇沙荒治理开发被列为黄淮海农业开发重点项目。1989年，中国农业科技影业公司来这里，把清平镇治沙的成功过程拍摄成科教片。1990年，澳大利亚林业参观考察团来到这里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1992年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科研人员来这里考察，认为清平镇治沙工作在国内居先进水平。1989年以来，邻近的卅里铺乡在清平镇治理沙荒的影响和带动下，看到了希望，吸取了力量，发动群众向沙荒进军，现在已有40余户在沙荒安家，开垦1000亩土地，取得了初步成效。

即将铺好的沥青公路将贯穿整个沙区，如果能进一步完

善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各种服务机构，如果能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挖掘出新村的潜力；如果能积累资金，真正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果增加科技投入，搞好技术培训，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如果能发展起规模经营，更深层次地开发各种资源优势，搞好产品深加工，逐步由小农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入市场经济机制；如果能全面推广这里的先进经验，把附近乡镇的沙荒地连片全部治理，那么，又会是怎样一个光明灿烂的前景啊！

唯有人民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久的将来，如果您再到清平，将会读到它更加巨大完美的惊叹号！

金融事业发展梗概

祝秉仁

金融事业，泛指社会上进行资金融通活动的行业。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事业，具有不同的活动特点和作用。本文着重介绍高唐金融事业发展的情况。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高唐的金融业有典当、钱庄、银号、银行。典当分为“当铺”和“代当”，本县典当始于清朝末年，县城内历史上没有开设当铺和典当的商家。尹集大地主郝家在外地设有不少当铺，是积聚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该村开办“代当”的有二十余家。入当者多是贫苦百姓因生计把仅有的衣服、被褥“当钱”，也有地主老财因特需将金银首饰、古玩、玉翠、字画等入当的。当钱数额不超过实物值的50%，当期一年、保留半年，即十八个月，到期不赎，当票失效，当物归当铺自行处理。当物不书当物人姓名，只用毛笔填写物的名称、当钱多少、利息、当期。认票不认人，概不挂失，所当物品不论新旧程度，一律写上“破旧”二字，以防讹诈。当票上的物品名称，局外人不认识，是一种专用字，入当铺学徒先学“当字本”，类似字典，仅限于物品名称。如羊皮袄一件，写成“支奥一牛”。当字不

外传，是当业主垄断当业的手段。

银钱业商号，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最盛，全县有数十家。史志记载有：文茂栈、文会祥、协永祥、协和号、协和成、森记号、乾德堂、丽生公司、丽生东、庆泰昌、公泰钱号、同聚致和堂、积德堂、广裕号、中和公司、和生公司等银号，专营银钱交易，通过放出贷款，获取高额利息。1931年（民国二十年）间，银钱业生意日渐凋敝，均相继停业或改棉业。

省众议员尹宏庆曾创办高清银行，经营存放款，于1929年关闭。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经县长赵仁泉倡议，组织信用合作社，全县农村基本普及，解决了部分农民资金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民国二十六年日寇入侵高唐，信用合作社解体。

二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八路军于九月份解放高唐县城，成立民主政府。当时在工商局设有“货币股”（属银行前身），其主要任务是供应解放区军政需要的货币支付。设立了外汇交易所，收兑黄金、银元，向敌占区购买急需物资，少量供应商店收购农副产品货币需要，及时对农村个别困难户发放少量生活贷款。1946年6月冀南银行冀鲁豫办事处在内黄县成立（当时高唐县隶属冀鲁豫边区），高唐县冀南银行也正式成立。1948年12月1日，华北、山东、西北解放区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统一货币，即现行的中国

人民银行钞票。1949年8月20日，平原省成立（原冀鲁豫边区），高唐县支行属中国人民银行平原省分行聊城办事处管辖。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开始在尹集、梁村、卅里铺行政区建立了银行营业所。1952年在城关、辛店、杨官屯建营业所。1953年在旧城、琉璃寺建营业所。至此，全县行政区划分为八个区，全部设置了营业所，县、区金融机构设置健全。

中央、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金融机构的设置及时进行调整、完善，目前我县金融机构有：

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工商银行。1985年1月设置。

农业银行。第一次称农业合作银行，是适应土地改革以后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需要成立的。成立于1951年8月，1952年“三反”后精简机构时被撤销。1953年国家实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学习苏联经验又建立了农业银行。由于是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的，分家过程中，在机构设置、领导关系、业务与工艺方面产生许多矛盾，未能合理解决。1957年4月，国务院决定撤销了农业银行。1960年初，我国经济发生了困难，党中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及一系列政策措施，国务院决定于1963年11月成立农业银行，不再归人民银行领导，直属国务院，对下实行垂直领导。由于管理体制有些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影响着人、农两行业务开展，1965年11月国务院决定两行合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农业银行。我县于当年十月一日恢复了农业银行高唐县支行至今。

建设银行。于1979年9月11日成立。

保险公司。1951年初，高唐县人民银行内设保险股。1952年建立保险公司，上级决定于1954年3月撤销。1981年高唐县人民银行内又增设保险股，对外挂“高唐县保险支公司”的牌子。1984年4月上级决定恢复了高唐县保险公司，升格为局级单位。

信用合作社，是民间信用组织。建国以来逐步发展壮大，实行党委政治领导，业务由银行管理。1952年开始重点试办，在大李六村、尚官屯村建起了两处信用合作社，农民入股为信用社员。1953年发展五处。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信用合作社发展到83处，入社农户45503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3%。目前高唐县设有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乡镇设有信用社15处，管理区设信用业务片78个，中心集镇设信用分社七处，村设信用站417个。

三

金融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机构发展健全。由原来一家银行目前发展为多家银行、公司。（2）存、贷款迅猛增长。银行各项存款，1949年为21万元，1959年为319万元，1969年为554万元，1979年为1225万元，1988年为17752万元；各项贷款，1949年为2万元，1959年为1754万元，1969年为3475万元，1979年为5088万元，1988年为28801万元。信用合作社各项存款，1954年为14万元，1964年为395万元，1974年为222万元，1984年为7278万元，1988年为9419万元；各项贷款，1954年为10万元，1964年为136

万元，1974年为86万元，1984年为2384万元，1988年为4301万元。

金融事业，对工农业生产、流通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金融部门支援农业生产。1945年9月高唐县城解放，1947年实行土地改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为帮助翻身农民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银行开始发放实物贷款，有小米、棉饼、耕畜、种子等。至1948年底累计发放实物、冀钞折合人民币7000元，解决了315户贫困农民发展生产的困难。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放贷款45.2万元，重点支持农民打井3775眼，购买耕畜1353头，种子168.1万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党中央作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解决贫下中农入社交纳股份基金的困难，于1955年专门建立了“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较一般贷款期限长，利息低，共发放32万元，促进了农业合作化。1978年中央要求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年发放农机无息贷款95万元，支持生产队购买拖拉机470台。1979年开始扭转农贷投向，由支持以粮为纲、支贫、支持机械化转向商品经济（棉花）为重点，75%的农贷款用于棉花生产，比上年增加30%，这一年向国家提供商品棉11万担，1958年达到35万担，社员分配由人均48元增加到155元。1982年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农行、信用社具体帮助81个生产队开展项目60个，支持贷款38.7万元，获得纯收入114万元；帮助1827户社员搞副业项目69个，支持贷款48.5万元，增加收入84.6万元，使部份农户脱贫，到

1984年共扶贫2.7万户，累计发放贷款1350万元，脱贫的占92.7%。从1979年到1988年为乡镇村办企业，累计发放设备贷款1270万元，生产流通贷款19990万元，有效地支持了乡镇村办企业的发展，获得显著经济效益，共获利润8155万元，集体积累3000万元，为农业提供发展基金1219万元，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支持工商企业发展，活跃商品流通。建国前夕有工商业坐商347户，行商238户，均属私人经营。建国初期（指1950年前）有了公营企事业单位：公裕商店、机器轧花厂、书店、人民医院、合作社等。当时国家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银行采取了对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起领导作用的公营经济重点扶持，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先存后贷，存款、贷款、汇款相结合的合同办法。”到1950年底发放贷款2万元，对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了作用。1953年党中央提出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此，银行贷款着重支持国营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对私营企业本着“利用、限制、改造”的精神，适当给予扶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放款1431万元，国营工商业贷款占98%，私营企业贷款占2%。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58年县委决定大办县、社工业，银行积极支持贷款230万元，新建25个工厂，当年实现产值672万元，比上年增长5.8倍，为今后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通过管紧、管严贷款，促进了企业的关、停、并、转，减少了信贷资金占用，为国民经

济尽快好转发挥了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银行及时制定和采取了一些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如“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加强宏观控制，搞活经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扶优限劣，提高效益”等，对企业改善经营、提高效益收到明显效果。1984年协助县造纸厂落实销货合同850吨，按实际生产进度发贷，管理贷款，年累计发放34.3万元，完成产值74.4万元，销货收入56.5万元，实际利润3万元，转亏为盈。1985年对企业和产品进行分析排队，一类企业有5户（国棉厂、纺配厂、机械厂、麻纺厂、工具厂）；二类企业10户；三类企业3户。重点支持一类企业。对产品进行排队后确定优先支持畅销产品晴纶纱、纯棉纱、棉布、羊毛衫、麻袋、凸板纸等。对一类企业贷款570万元，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帮助工业企业清理应收款115万元，处理积压产品180万元，处理“水分”26万元，补充自有资金2万元。帮助商业企业挖潜162万元，发放清欠贷款30万元，解决相互拖欠70万元。

对企业各类固定资产发放贷款1138.1万元，支持34户工业、供销、粮食加工企业新上项目45个，其中：工业技改贷款项目28个，601万元；小额设备贷款项目4个，90.6万元；科技开发项目5个，112万元；节能专项贷款96万元。项目完成后有的小型企业升为中型企业，产值、效益翻番，为社会提供更多产品，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

（三）通过基本建设拨款，发放贷款，强化工程项目管理，有效地支持了我县基本建设项目完成。经拨款重点支持的工程项目有：农业局农技中心楼，建筑面积2538平方米，

投资54万元，提前完工交付使用，为培训农业技术人员创造了条件；优质棉基地建设的加工厂，投资77万元，建筑面积2867平方米，1988年6月竣工交付使用，保证了优质棉加工；高唐县棉花储备库，发放基建贷款106万元，用于库房建设，面积达4648平方米，解决了高唐储棉困难；旧城林场，（1980—1987年）国家给预算拨款64万元，银行发放基建贷款43万元，建成速生丰产林8900亩，育苗55亩，幼抚7000亩，整地6000亩，打机井20眼，加速了林区基地建设。

强化工程项目管理与服务，节约基建投资，北关中学教学楼工程推行招标办法，节省资金9万元；县医院病房楼工程中标造价68万元，比面议造价低14万元。强化审查工程项目预决算400份，价值3380万元，净核减100多万元。如县酒厂白酒车间预算价值57万元，净核减5.7万元；县电厂厂房建设预算价值78.27万元，净核减9.04万元。经办引黄济津工程款的监督拨付款317万元，按时完成了桥、闸、涵洞33座及渠道整修，为保证天津人民生活及工业用水贡献了力量。

（四）履行保险职能，减轻、补偿灾害损失。对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明显作用。保险种类由少到多，从试办到基本普及，目前开办的险种有：企业财产险、机动车辆险、种植业、养殖业、人身险、子女婚嫁金、独生子女险、农村干部养老金及自行车险等。种植业承保率已达100%，重点保棉花雹灾、麦场火灾，1986年以来三年受灾赔偿支付费用46.6万元，为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保险部门的职能作用，也促进有关部门及当事人对各种灾害和意外事故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和防止了事故的发生。

（由于资料原因，本文数字与情况限于1988年底）

商联会会长王长庭二三事

张 兰 事

王长庭，字志静，高唐镇西街人，1920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高唐县文庙高小，受进步思想教育，深感劳动人民的疾苦，立志走救国救民的道路。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响应党的号召，1964年由芦洪年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高唐县商联会会长等职。他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仅就我所知，略述如下。

一、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联合货栈。高唐解放初期私营商业占绝对优势，仅在县城内就有私营货栈十八家之多，而国营企业只有“公裕”、“利民”两家。人民政府号召私营商业走集体道路。王长庭于1948年任高唐县商联会会长。翌年秋，组织“联合货栈”，由十七家私人货栈，每家抽一人，出2000斤小米作资金，有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县工商科长李希亮任名誉经理，王长庭任经理，冉繁仁任副经理，下设棉花主任张松亭，粮食主任杨思正，会计主任崔彭年，我为主管会计。当时高唐县的国营经济除上面说的两个货栈外，县供销社、花纱布公司、粮食公司、油脂公司正在筹建，“联合货栈”的建立，成为个体工商户走向集体的一个典范，“联合货栈”的经营范围，开始是给济南“成通纱厂”收购棉花，给粮食公司销售粮食，给油脂公司收购花生米、花生

舖，业务非常繁忙和兴旺。到了1950年，济南“成通纱厂”经理苗海南，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飞机的资金后，资金方面不充足，在高唐停止了棉花的收购业务。“联合货栈”随即又给花纱布公司收购棉花，日收购量最多达到四十个扎个（每个扎个约200斤皮棉）。每天从黎明忙到将近中午，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大家毫无怨言，这给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个体户以很大影响，使他们在犹豫不决、等待观望之中，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和前途，增强了走集体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更重要的是，“联合货栈”所经营的货物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对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物价、搞活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所以，许多个体工商户陆续停业，逐步走向集体的道路。到了1951年下半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发展，“联合货栈”完成了历史性的过渡任务而停业。

“联合货栈”的青年人（不含工人），由县工商科主持，人事科介绍，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到百货公司，有的到税务局，有的到城关基社，我和祝秉仁同志被介绍到人民银行，开始了新的工作。

二、繁荣经济修建新市场。解放前，由于受日寇和伪杂的蹂躏，我县人民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商业不兴旺，县城内仅有的一条比较繁华的果木市街，被杂团袁采荣放火烧了以后，从南头到北头一片凄凉惨景，目不忍睹。身为商联会会长的王长庭挺身而出，号召商户在果木市街中心的一片空场上修建“新市场”。由商户自愿投资，每户建上下两间、土木结构的小楼，共修建十八座，一九五〇年竣工，小楼虽然不大，但在全城没有一座楼房的情况下，还算新生事物，使县城面貌大为增色，逐渐形成了商业中心，日

繁趋荣，成为五十年代高唐最繁华的地方。

三、为支援抗美援朝组织义演。1950年春天，王长庭会长利用在平县京剧团在高唐演出的机会，与剧团协商，在该剧团演出的最后一天晚上，组织本县的京剧爱好者（票友）进行义务演出，其中有陈子楨等演《空城计》，崔长卿等演《打渔杀家》，张兰亭等演《起解玉堂春》，冯振河操胡琴，其余旦角、文武场都是剧团的人，票价两角，剧院观众爆满，轰动一时，票价收入全部支援抗美援朝。

四、积极参与修建高唐县烈士祠。高唐解放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更加怀念为革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1950年，县长陈光汉提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办修建烈士祠，当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要负责人员有陈光汉、孙醒民、董诚、姚伯芳、王长庭、姜世钰、金高兰、高家兴、左凤田等，大家推举商联会会长王长庭负责修建工作。王长庭同志为此各方奔走，加强宣传，得到各界人士的纷纷响应，全县十大区群众、商联会棉业分会、城关商民群众等共捐小米37788斤，唐山市艺新剧团捐款200元，建华运输部车商捐款320元（1953年币改后一万元折一元），在东关原奶奶庙旧址，修建祠堂五大间，院内建碑、亭，植花木。碑文为陈光汉县长撰写，碑的正面是张洪泽先生书写的“为我牺牲”四个大字，碑阴是革命斗争史、捐献名单等。祠堂正面的匾是谷官屯乡的书记李金栽送的，匾额书“生伟死荣”，祠堂内肃立着烈士们的灵牌。1951年4月举行了烈士祠落成典礼，整个修建过程形成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大宣传，王长庭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忆“同仁堂”中药铺

宋德臣口述 王琴整理

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在高唐享有盛名的“同仁堂”中药铺，是我父亲宋昭同1937年底创建的，座落在高唐县城东关一街（今综合大楼的位置）。它以零售自制中成药为主，也行医看病，医药结合。自制、出售的各种中药药真价实，药到病除，因而赢得了顾客信任，终于使“同仁堂”药铺在与县城几家大药铺的对峙抗衡中得以立足、发展。解放后“同仁堂”中药铺在为高唐人民治疗疾病和卫生事业建设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我祖籍章丘县普集镇祖营坞村，父亲宋昭同读过几年私塾。1920年章丘地主刘斋正在高唐县城开“生生堂”药铺，经理刘逢占聘我父亲为其管帐。在此其间，他通读了诸如《医宗金鉴外科》、《丸散配本》之类的医药书，逐渐掌握了一些医科知识，管理帐务之余给顾客抓药包药，为患者治疗一些常见疾病。

1930年春，我高小毕业，父亲托人把我送到尹集“恒春堂”中药铺当学徒，那年我才十五岁。我在“恒春堂”一干就是八年，碾了三年药引子，四年之后出徒，才允许我在柜上抓药、包药，学习切药、碾粉、炮制药材、制作成药的技术。经过几年的实践，我掌握了中草药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膏丹丸散的泡制技术。

父亲为人老实，性格内向不善说，但很有心计，早有自立门面的打算，他之所以不满足于管帐、算帐而学习医药知识，又让我长期在“恒春堂”学徒，目的都在于此。1937年他辞去了“生生堂”药铺的差事，着手筹建自己的药铺。

那时高唐匪杂猖狂，特别是日寇占据高唐县城后更是人心惶惶，有些店铺纷纷关门停业，而我们这时候却要创建商号，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在朋友鼎力相助下，租借了东关皮条商吴长远的两间门头二间柜房，1937年底，药铺勉强开业，父亲为药铺定名：“同仁堂”，取了他名字中的“同”字。

解放前民众看病主要靠私营医药——药铺、药店、民间医生。抗战时期分布在高唐县城的药铺主要有：“生生堂”药铺（今鼓楼粮店向东路北）、“仁和堂”药铺（位于四楞子碑）、“德生堂”药铺（位南门）、“恒仁堂”药铺（位东关）、“中和堂”药铺（位于果木市街路东）、“大安堂”药铺（位于果木市街路西）、“德成裕”药铺（位于东关）等。与“同仁堂”一墙之隔的“恒仁堂”中药铺是前清时期兴办的，具体时间及创业人已无可考证。我随父到高唐时，“恒仁堂”药铺由博平人刘子正经营，有坐堂先生及伙计三十多人，药铺门面阔气，资金雄厚，据说附近县城没有比“恒仁堂”药铺声望高的，1935年，高唐东关后花园大地主王子新买下该店。“同仁堂”药铺西边是一家西药铺，十字路口路北是“德成裕”药铺。这几家药铺都有钱有势，批发兼零售，买卖红火，相比之下，“同仁堂”药铺倍受冷落。我们父子二人，父亲坐堂行医兼管柜面上的事，我管炮制药材、卖药等。开业后生意一直很清淡。旧高唐的街面很窄，平时街上很少有人，十天三个集，逢集日进城的人也不多。日军占

领县城后，百姓出入县城诸多不便，来“同仁堂”药铺求医买药的人就更少了，那时我们每天最多接待两三个病人，有时整天没有人来。更为困难的是当时伪顽杂团势力猖獗，对其我们得罪不起，为减少麻烦，使生意能维持下去，他们来药铺看病拿药，我们只好不收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我商量卖药铺回章丘老家，可是把价格压到最低限额也无人问津，只有咬牙干下去。每天收入寥寥无几，除支付房租以外，父子俩的生活也未着落，为此我经常去一街干广庆家赊玉米面。为维持生活，我于1939年春去济南富官街振业印刷局当雇员。父亲独自在高唐支撑门面，到秋天，“同仁堂”药铺开始好转，我又回到高唐。

由于“同仁堂”药物炮制精细、货真、疗效显著、价格公平等多方面的原因，生意日渐兴旺，加之我们的东邻“恒仁堂”药铺内部勾心斗角，买卖日趋清淡，所以来“同仁堂”求诊买药的人次越来越多。从此“同仁堂”药铺进入了发展时期，在高唐享有一定名气。

1945年9月我父亲宋昭同病故，我内弟陈永泉和表弟林昌伦来“同仁堂”药铺帮忙，陈永泉负责帐目，林昌伦负责柜面上卖药、采购药材等，我开始行医，但主要是制药。妻子陈永荣集中国劳动妇女的优点于一身，吃苦耐劳，虽没有文化，但在我的帮助下学习制药，做了许多辅助工作。

高唐县城解放后，建立了新政权，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同仁堂”中药铺步入鼎盛期，每天顾客盈门，应接不暇，资金不断扩大，积蓄日渐增长。1949年“同仁堂”中药铺，盖新房十一间，门市部、药房、制药间及住房俱全，业务量不断增多。我们仍然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保持药真

价实的本色，中草药、中成药品种多，药物全，群众有求必应，发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受到群众称赞。

“同仁堂”中药铺当时在高唐享有名气，是因为它有如下特点：

创始人宋昭同以谦虚诚恳的医德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他诊病细致认真，对症下药，对患者疑虑作耐心解答，对所用中药的性能疗效向病人作详细介绍，在精神上给予安慰和支持，提高治疗效果，他为人慈善，行医重医德，对求诊买药的人，有钱无钱他都认真接待，一视同仁，不分贵卑。那时看病买药对穷苦人家可以赊帐，有的人家到年底还不了钱，我们同情谅解从不要帐。一街冉庆春老人慢性病羁身，无依无靠，生活十分困难，他登门求医，我们连续让其服用几副药，效果明显，旧病除根。父亲精通外科，尤其擅长治疮。俗话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有名的疮据说是由人体肠胃的毒气引起，难以治愈。解放前高唐流行的有“肠更组”、“对口”、“搭背”几种名疮。东关一街林官五家生活清苦，经常揭不开锅，其母长“搭背”疮，难忍疼痛奇痒，不能行走，父亲得知后每天上门为林母换药，治疗三月有余，痊愈后分文未取，林家很感动，送布匾“济世活人”以表感谢。林寨李泽民的姐姐小腿长浓疮，大如手掌，流血水不止，去济南等地诊治不愈，时间达两年之久，不得好方，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同仁堂”，经父亲治疗渐渐根除。南街杜方义之妻胎死腹中，经多位先生诊治无效，后请我父诊断，服中药一副，顺利下胎，杜方义倍受感动，赠布匾镶金字“功同良相”报答。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病人赠送诸如“万病回春”等各种匾额三十多块，挂满了二间房

屋，我还记得有位病人为“同仁堂”药铺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同业并同堂，百年事业宣万古；
仁德兼仁义，一世妙术传千秋。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唐人民对“同仁堂”中药铺的信任。

在制药方面，我们坚持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既学习前人经验遵古炮制，又不拘泥于古人。父亲经常叮嘱我，制药必须货真、精细。我和父亲都在药铺做事多年，深谙药材品类、价格、质量、疗效。为保证药真、药纯，我们从不购进成药，都是自己炮制。中药材分为十一类，有根、茎、果实、花、叶、草、皮、树脂、菌藻、矿物、动物。购进的生中药材先是筛簸、手拣、除净杂草，然后经泡、切、晒等加工手续，制成膏、丹、丸、散，以质定价出售。如川芎去掉四边切成方形叫八方；川贝、连翘、寸冬等加工时先去心再配药，如此加工精制才能获得疗效。草药中的加工方法甚多，用盐炒、醋炒、酒炒、麸炒、炒成炭等方法，才能取得不同疗效。如盐炒入肾，炒成炭止血，蜜炙润肺。药材加工讲技术讲质量，精益求精，所以“同仁堂”出售的常用药如当归、之角、甘草、肉蔻及膏丹丸散等疗效显著，极为畅销，慕名前来求诊买药者络绎不绝，常听到有人问病者：“吃过同仁堂的药了吗？”五里铺郑立本得了一种病那时叫旱病，发烧发热昏迷不省，经祁寨老医生赵立荣诊治，连服三副药不见效，这时医生愕然，认为诊病准，药方准，病人服药后怎会不起作用呢？怀疑用药不纯、不真，这时郑来“同仁堂”，我按赵立荣先生的药方配药，郑服一副药就大见功效，服

完三服药后，彻底痊愈。八里庄一妇女产后中风，经专治产后病先生诊断后，两副药不见好转，这时先生叮嘱他要到“同仁堂”药铺取药，产妇服用“同仁堂”的一副药后明显好转。

为确保“同仁堂”药物纯真，我们不断到济南、天津等地采购川广云贵药材，定期参加祁州一年一度的药材交流大会。配制中成药应加的贵重药材如人参、麝香、鹿茸等我们绝对按比例配伍，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少充多。对尚缺药材，从不用代用药。在药剂包装方面认真负责，不论药味多少一律分包，并写上药名校对后交付。

由于以上原因，“同仁堂”药铺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好，到“同仁堂”诊病取药的由每天十余人增加到一百多人次，中药销售量由每天十几副增加到四、五百副，药材品种由开业时的三十多种增加到二百多种。

1955年11月，“同仁堂”药铺全体人员响应上级号召，接受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我将“同仁堂”的药品药材（折合伍佰伍拾万旧钞，合计人民币五百伍拾元）和家具用具无偿贡献出来，和宋昭元、陈荣、唐德荣、唐德基、刘克顺等七人成立了东、北两关联合诊所。1958年联合诊所并入灯塔医院（今城关镇医院）。

1992年11月

郝家当铺点滴

张立亭

尹集郝家是我县历史上有名的大财主。当铺，是郝家发财的龙头，典当业使郝家赚取了大量钱财。

当铺是旧社会以收取动产物为抵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宋代称“质库”，元代称“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到清朝典当为极盛期，典当者多为城镇贫民、小手工业者，特别是乡村百姓春天青黄不接，急需资金作农本，求借无门，只得当物借钱银，解决春种和生活之急需。也有一些破落富户，以典当家产维持生计，还有一些富贵人家出门，怕贵重物品丢失而存当。

典当业旺季在春秋，即所谓春当秋赎，农民春种时急需资金，故多以物品作抵押，秋后若资金有余，赎回当物。

当物主要是衣服、首饰、金银铜器、农具及农产品等，入当物以不违禁者为限。

当铺当期，清代长至十八个月、两年不等，民国后多数为一年，最短为六个月，期满后当户交足本息赎回当物，到期无力赎回者即为满当，当物归当铺处理。

当铺以零星抵押放款收取利息为目的，利息一般按月计算，初为一分到一分五厘，后增至二到三分之间，当足十日即按一月计算利息。腊月十五至正月十五赎当可受到半价优惠。

当物评价一般是原物价值的五成，俗称“当半”，当物既

使是全新也作七、八成计价。当物折成后登记编号付以当票，作为贖当之凭证。当票上写有当铺名称、票号、当物名称、当期、当价、利率。当票附以暗记、密码以防伪造。客户贖当以当票为据，看票验物，收息付当。当票遗失需找人作保，说明票号、当物和入当时间等方可补票或贖当。

据在世的老人们回忆，郝家当铺的经营者有郝祖修（号静堂）、郝玉桥、郝玉渡、郝玉常（号子刚）等。当铺分别设在河北、泰安、长清、东阿、济宁、曹州、宁阳、泗水、济南等周围省、县（市）。郝祖修经营的当铺有八处，设在聊城鼓楼附近的当铺是规模较大的一处，雇用一百多人，当物有金银财宝、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及有价值的古玩字画等，但不知什么原因，新旧帽子一概不收当。有一年郝祖修收当了一座高两米的古钟，上面有金属小和尚按时打点，郝家将此视为珍贵物品收藏，遇有主要节日或结婚等喜庆日子郝家才将古钟搬出观赏。日本人出一百两黄金买这一古钟，郝祖修都未答应。抗战爆发不久，郝家开始衰落，郝祖修过得愈发拮据，常向他的亲家、济南商会会长张子衡借钱。张早就对郝家收藏的古钟垂涎三尺，恨不能马上将其占为己有。他心怀叵测，假意借钱给郝祖修，后来郝无力偿还，只好忍痛将古钟抵借款给了张子衡，另外把他在济南的一处宅子也划给了张子衡。郝家当铺一般不希望当死，目的是靠放款收利息，但旧社会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入当物品大多数都当死了。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郝家当铺，世人已知甚少，仅就点滴情况，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根据王万信、尹序更、韩其友、陈文俊、朱长贵口述

整理)

【续后语】本文记述的是旧社会高唐郝家典当的点滴情况，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典当业又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情形与旧社会已有很大不同。至于它是否具有剥削性质，与典当这种融资形式、与典当业（当铺）这种信用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种形式和机构，使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朱九武生平

徐惠英

成都军区原顾问、副军职离休干部朱九武同志，因病于1992年5月26日在成都军区总院逝世，终年70岁。

朱九武同志1922年1月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杨屯乡朱庄，1938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班长、排长、区队长、冀南军区八分区基干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副中队长、中队长、华北第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副科长、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总务科科长、第二步兵预备学校队列处处长，成都军区装备处处长，四川凉山军分区后勤处处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军需处处长、军需部部长，重庆兵站站长，37分部部长，成都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物资部部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军职顾问等职。1955年5月被授予中校军衔、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2年11月晋升为上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朱九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他奉命打入敌军内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凭着他对党的赤胆忠心，成功地带领一支400余人的敌军队伍反正，出色

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十八兵团管理科科长，在太原战役、进军西北和西南等重大军事行动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我军的发展壮大贡献了毕生精力。

朱九武同志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尤其是后勤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工作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效率；他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表现了较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领导艺术；他坚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襟怀坦白的崇高品质。

在“文革”动乱中，朱九武同志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离休后，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军队建设，关心和支持干休所的工作。在身患恶疾之后，仍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积极配合治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表现了高尚情操，保持了革命晚节。

朱九武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遗嘱》，表示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丧事改革的号召，一切丧事从简，并将他平时节省的一万五千元存款，向党组织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拳拳之忱和高风亮节。他以自

己的模范行动填写了一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合格答卷，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朱九武同志顾全大局，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讲党性，守纪律，不为名，不为利；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他团结同志，联系群众，生活俭朴；他严格要求子女，不计较个人得失。朱九武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廉洁求实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我军失去了一位好战士，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朱九武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一〕1992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载文《最后一次党费》

“我有存款一万五千元整，这些钱就作为我向党交的最后一次党费吧！我是党的儿子，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这些钱是党的儿子给母亲的一点心意，请党组织一定要收下！……”这是老八路朱九武临终时的遗嘱。

成都军区后勤部原顾问、副军职离休干部朱九武是1938年5月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领导，忠于党的事业。

在担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物资部部长期间，他勤俭节约，坚持精打细算的办事原则，为部队后勤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朱九武同志由于身患绝症，于1992年5月26日逝世。前面那份遗嘱，就是他在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让老伴徐惠英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的。（王兴家、杨则强）

〔附二〕

朱九武同志晚年曾给政协高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了《当年鏖战急》、《记庞均同志二三事》、《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等珍贵历史资料，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朱九武同志去世的噩耗传到高唐以后，中共高唐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等单位及朱九武同志的生前友好致电成都军区朱九武同志治丧办公室，对朱九武同志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余热献人民

杜道时



杜道时

我从台湾驾机起义飞回党的怀抱已逾四十一年。古语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身经旧社会的腐败黑暗，更珍惜新社会的无限光明，饮水思源，老一辈用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了我，良师益友用科学知识武装了我，中华民族的血汗使我掌握了较复杂的飞行技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我参加了党的队伍。七十三年坎坷而光明的岁月，四十一年喜怒哀乐的路程，

更加使我热爱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的一切是和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四十一年来的桩桩往事，更使我加强了对党的信任和爱戴。

一、党恩无穷

党对我的恩情数不尽说不完。从到达北京的第一天起，除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三次接见宴请外，1967年叶剑英同志曾在临潼空军疗养院问候我的病情，向我介绍素粥疗

法，廖承志、经谱春同志曾邀刘善本同志和我作长夜之谈。

我不能忘记，在开国大典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我驾机通过天安门，接受他老人家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检阅，并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盘旋警戒。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有机会发挥我的技术专长。在党的信任和重用下，使我得以在飞行训练、科研试飞、抢险救灾、野外降落、抢运伤员、支农飞行、空运、雾中起降等项任务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党给我勇气和智慧，使我敢于在设备和气象条件受限制的情况下闯进万公尺积雨云的腰部洒水降雨；为完成运输任务，暗夜无灯起降；为试验人工消雾利用无线电导航，多次在浓雾中起降；多次及时果断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飞行事故。党交给我带飞训练的学员，一个不淘汰，优质安全地提前完成训练任务。

党对我的一些微小成就，总是予以及时的鼓励嘉奖和各种荣誉。1951年，因教学成绩突出，我荣立三等功；1958年8月因人工降雨试验成功，荣获吉林省委通报嘉奖；因起义有功，1962年9月15日，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胜利功勋荣誉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为清除“文革”流毒，挽救党和国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空军和兰空党委根据党中央落实对起义人员政策的指示，1980年摘掉强加于我的“刘善本分子”、“企图外逃”、“特务嫌疑”恶毒诬陷的罪名，在政治结论中明确指出“清队整党中对杜道时同志审查是错误的。其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恢复名誉”。党中央明鉴，不仅是对我一家的关怀，也是对全体起义同志的安慰，对所有向往祖国的爱国同胞也是个鼓

励。回首前尘，没有党中央，就没有我杜道时的一切，虽肝脑涂地，难以为报。想起当年，不禁壮怀激烈夜不能寐。

二、喜迎新秀

我已年逾古稀，尝恨报国之日渐短，但喜在中央政策指引下，台湾爱国同胞更加心向祖国。1980年以来，蒋军中的爱国飞行员黄植诚、李大维同志振翅来归，用实际行动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喜见祖国统一的曙光，已在喷薄东升，必将普照大地。1983年四月中旬，喜闻大维抛舍亲人和富贵，翩然归来，立即去电欢迎（电文附文后），并在陕西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即席赋诗《贺李大维同志弃家跨海起义归来》：

一
又是衔泥筑巢时，春燕展翅返祖居。
滔滔骇浪等闲过，霏霏云雾亦不迷。
中央政策导航向，四海归心盼统一。

二
高堂年迈妻女娇，生离死别实难抛。
搔首徘徊增愧感，抚心坚毅决盾矛。
献身民族为团结，黄炎子孙全大孝。

三
喜讯传来举国钦，长夜辗转忆往尘。
敝履富贵舍妻女，先登征程卅四春。
伯牙子期知首者，相敬何必曾相闻。

（1983年4月26日）

诗以言志，谨表示我对后来同志衷心欢迎之情，趁此身

心尚健，誓愿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尽力之所能，奋老骥之壮志，作春蚕之贡献，象当年献身于人民空军飞行事业那样，把一切献给党。

三、老骥新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振兴中华，收复港澳，统一祖国，做了大量工作。党给我落实了政策，1978年3月，在兰空党委推荐下，我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参加了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第四、五、六届会议，得以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物质文明建设，为繁荣经济、统一祖国，就力所能及，调查研究，深钻细研，献计献策。通过口头和书面发言以及提案的方式，对陕西的丧葬改革、森林植被、农田水利建设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得到答复和采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秋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瞻仰领导集中营斗争的烈士。我素来敬仰的北京四中学生会主席、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领导人之一、抗战时新四军秘书处长黄诚烈士，因为他坚贞不屈，敌人对他又怕又恨，秘密将他和李子英烈士服毒面后活活勒死，不料到达上饶馆后，没有看到黄诚烈士的事迹展览。馆长告诉我，黄被诬为叛徒，受到掘坟、砸碑、撤展的残酷对待。我一团火热的心如泼冷水，不禁神昏意乱，心脏病突发，经随团医生抢救后，我断然声明这是一桩冤案，我一定要为之平反昭雪。回西安后，我以省政协委员身份先后五次写信给南昌烈士馆领导鸣冤，但无回音，又给北京四中学友陶希舜去信，托其子陶宗海（中学教员）在百忙中多次去北京图书馆查考

学运资料中有关黄诚烈士部份，以铁的史实证明烈士并非叛徒后，通过向省政协提案转江西民政厅，终于为烈士平反了冤案，1979年冬恢复了烈士的革命事迹展览。又如，位于陕西户县（我部队所在地）的涝河，沿岸绿竹漪涟，水清可见底，鸟鸣鱼跃，景物宜人，所惜源头秦岭山化工厂、热电厂排放废水煤渣后，1958年以来被严重污染，竹枯、鱼死、鸟遁，黑水毒流，无法饮灌。1980—1983年我连续三次提出提案，指出变污水煤渣为宝的方案，终于使厂方停止排放污染物，使涝河逐步恢复本来面目。

我作为抗日战争空战亲历及目击者，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通过统战部门和航空联谊会，为抗日有功或空战牺牲的国民党空军烈士出具证明，使其家属子女脱掉“反革命家属”的极左帽子的禁锢，落实了政策，才华得展，有的出国深造，获得博士教授学位，为国争光出力（如华东师范大学郑毓蕃），有的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如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姚远），有些生不见父的遗腹子，在我的帮助下，组织给予了公平合理的政治待遇，近三十年的临时工，因德才兼备而被破格提拔为女干部（惠安化工厂杨安里）……。我敢于柄董狐之笔，执太史之言，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聊尽绵薄，被全国航空史研究会聘为顾问。

1982年我在陕西户县空军领航学院担任顾问职务，时年65岁，组织安排我离休。1984年夏搬入西安机场干休所。干休所是党对老干部关怀照顾的寓所，使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终。作为一个多年受党培养的共产党员，于感激党恩之余，更应贡献余热，为国分忧，为军增辉，尽量做点利国利民之事。

1987年体检医生说我是“百分之百的前列腺癌症”。我怀着对身体锻炼效果的自信，在狭窄炎热的病房里坚持锻炼、读书，向法院方请假乘公共汽车去老战士大学听课，并同时复习汉语。1988年除夕，我还坚持连夜参加全国首届汉语大奖赛，主办单位郑州“读来读去读书社”，1990年以较高评价在《世界——我要对你说》专刊发表了我的短文。

1988年4月间我参加了航空联谊会迎接援华抗日的退休美军所成立的驼峰（即喜马拉雅）协会招待宴会，帮助勾通中美老年航空人员的战斗友谊，增进相互了解。夏季参加了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对荷兰福克（FOKKER）飞机公司订购民航机的洽谈会，为洽谈中提出的航空专用英语名词提供了汉语解说。1989年5月我接待了八十五岁的美籍中华航空女杰张瑞芬女士及其女儿女婿一行四人，因其子女长在美国，宾主以英语交谈甚欢。他们返回美国洛杉矶后，六月初来信向我致谢，适逢北京“六·四”事件之后，她在附言中写了一句“北京发生的事使我很难过，希望一切恢复正常”。我立即复信，并告以“平息暴乱后，北京和全国都已安定，中央正在大力兴利除弊，惩治贪污，扫除六害，爱国而单纯的青年，都应学好中国历史，一定会从中得到当今祖国可爱的这一结论”。她得信后，由女儿立即来信向祖国致敬，并表示今后要学好祖国的历史，增强爱国心。

1990年5月8日至10日，我代表陕西航空联谊会接待了抗日时期援华抗日的美国十四航空队（飞虎队）协会副会长MILT MILLER和财务组组长EUGENE L. BOYARS两对夫妇，他们受原十四航空队“飞行队员协会”之托，前来中国重寻当年驻扎战斗之地，从美国到北京——南京——

西安——桂林——昆明——成都，回美国后将组织五百多对夫妇于1991年重来旅游观光。我受陕西航联理事会委托，负责在西安迎送和宴请，使客人们受到很大感动。在共话当年抗战时期的战斗友谊和留美、回国途中的往事时，更感中美人民友谊之深。

作为陕西省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成员之一，我还对远在美国和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中的往日同学和同事做了一点应做的工作，在电台发表讲话，在海外的《中国周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爱国盼归的文章和诗词，与在美国和台湾的同学欢叙友情。1979年在空政联络部支持下，我和老伴李淑静同志，与1940年和我同堂结婚、七十年代已定居美国的张君逸、马云霞夫妇在北京饭店会见叙旧，相偕去八宝山一室刘善本烈士灵前献花。1984年10月他俩作为国宾参加建国卅五周年国庆，又来西安旅游，并到干休所看望病中的李淑静。1940年同堂结婚的另一对夫妻刘冶之、赖永芳亦写来情意恳切的问候信，王寄哲同学向他们通报了我为抗日牺牲的航空人员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并和他们的遗属友好交往的事实，使抗战余生的老同学们对我增加了亲近感，对我政府增加信任感。亚运会期间除了曾经和我同飞行组的李家瑞和边庚源同学外，还将和更多的同学故旧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来大陆探亲访友，到我家叙旧，我将尽力之所及，宣扬党的政策，促使他们更加向往祖国，为台湾全省早日回归，做些应做的工作。

平息暴乱后，我国旅游业因外宾锐减而处于低潮，上海航空公司1989年底送来日本观光客人近二百人，因遇大雪天气而改降兰州机场，未达到观光秦皇陵的目的，赔款道歉，国

家经济和信誉受损不费！为国分忧，义不容辞。今年四月省政协开会前，我和于福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投掷者）、侯骏初（两航起义人员，延光厂子校校长）三人联合花费近两个月时间赴空军西安指挥部向西北航空公司运输、安全技术、营运、航务各部门负责人求教座谈，进行调查、讨论，考察新建的咸阳民航机场和综合机场的航路管理、设备更新、通讯保障、气象预报、备降场使用、公路维修和停车设备等问题，写出六个提案，请省政协转给有关部门，务求达到航空客流畅通，以求改变过去那种飞机进不来、出不去的被动局面。

1990年，我已进入生命的74年，感谢党的教育关怀和桑梓父老师友之情，使我摄取的甚多，而奉献的甚少，回想当年抗战爆发前为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的高唐同乡、好友袁子俊、郭宗芳、张述古等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曾经相互帮助，亲如手足。特别是1936年秋，我身染恶性疟疾转为大叶性肺炎，生命垂危之际，一起入伍的袁子俊同学，一面向领导要求尽快送医院，一面给我家拍电报，及时汇款治病，并利用休息时间守候病榻，在我昏迷中给我喝水吃药，增强了抵抗力，从阎王殿里逃回，得遂抗日之愿，而他却离开航空，不知所往。五十多年不相见，言念及此，心为之痛！

为了能够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迸发出更多的光和热，我每日坚持锻炼身体，不管多么忙和累，都坚持早晚练太极拳和中老年健身操，从锻炼中换回健康，以达到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争取多贡献几年余热。

（一九九〇年五月于西安）

【附】杜道时给李大维的贺电

空军政治部联络部请转李大维同志：

欣闻在共产党感召下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驾机回归祖国，特驰电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你英勇的行动，不但为祖国立下了不朽的丰功，而且也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黄帝和后代子孙们所创建的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向心力，是任何力量所分裂不了的。三十四年前的四月我也曾为着团结救国的目的飞回人民怀抱，在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为建设祖国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三十四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光荣而正确的道路，值得引为自豪，值得为一切爱国同胞所效法。希望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学习，继续为祖国的团结统一和建设事业发出应有的光和热！临电不胜感奋，不尽欲言！顺致敬礼！

杜道时

1983年4月24日晨

杜道时简历

空军十六航校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革命战士、原空军领航学院副师职顾问、离职休养干部杜道时同志于1992年2月2日5时在西安因高血压、心脏病不幸逝世，终年75岁。

杜道时同志1917年2月21日生于山东省高唐县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9年4月17日驾机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12月在第二航空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杜道时的青少年时期，受到父辈救国救民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早年就立下了报效国家的志向。1935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他考入国民党航校，1940年调入远程轰炸机部队——空军八大队。1942年，他曾要求去延安地面抗战。1947年他积极策动亲朋学友，组织起义机组，终于在1949年4月17日黎明前（国共和谈破裂前三天），驾驶未曾飞过的最新式C-46型运输机飞归大陆。杜道时同志是第一个从台湾驾机起义人员，影响极大。4月23日在北京怀仁堂他受到了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解放军朱德总司令的宴见勉励。同年5月，他被分配到东北航校任教，后被航空局任命为航行科副科长。开国大典时，他光荣地参加了天安门上空的编队飞行，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人民空军成立后，他被分配到长春二航校工作，先后任主任教员，科长、中队长、独立大队副大队长。1958年8月，他出色地完成了在积雨云禁区实施人工降雨的任务，缓解了水电站缺水发电的困难，受到吉林省通报嘉奖。

空军第十六航空学校（现空军领航学院）成立后，他奉调来到学校，先后任校飞行技术检查主任、第一训练团副团长、校副参谋长、研究员、副师职顾问，于1982年11月批准离休。任职期间，他热爱飞行事业，精心培养人民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勇挑重担。他曾多次在浓雾大风、夜暗、无灯光等困难条件下，为抢救伤员和灭蝗救灾在野外、在山区河谷安全降落。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扎扎实实，为学校的飞行训练、教学工作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几十年的飞行生涯中，他共驾驶过27种不同型号的飞机，安全飞行四千余小时。先后荣获三级解放勋章，荣立三等功，受到省电台和中央报刊的报道，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胜利功勋荣誉章。

离休后，杜道时同志奋老骥之壮志，做春蚕之贡献，身兼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航空联谊会副会长等职，不顾年迈，全心致力于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他经常通过各种渠道，致书于尚在台湾的旧日同僚和部下，阐述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海峡两岸统一的重大意义。此外，还为黄诚烈士的平反使之恢复名誉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都表现出了杜道时同志永不衰退的革命意志。

杜道时同志对党赤胆忠心，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军队的各项制度，从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立场坚定，敢于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意见，勤劳俭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表现了一个

共产党员、老干部的高尚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爱戴。

杜道时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老同志、好战友。

杜道时同志永垂不朽。

（杜文更供稿）

介绍同乡参加革命

董 华

我于1939年在家乡高唐经李锡慈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把我和郭苏凯（郭宗光）、罗廷训同志编为一个党小组，苏凯任组长，当时我们都已从避难的农村搬回了城里故居，在城内开展工作。

1940年我即外出到德州、济南、保定、上海等地上学并做地下工作，1944年秋转到北平，党的组织关系属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领导的地下党组织。

我到北平先考入日伪中华新闻学院插班学习，1945年初毕业后留校当了训育主任，兼做教务员、事务员的工作。不久，我哥哥姚卿诚（现名姚伯强，在北京化工学院离休）和卢长海（夏津人，常在高唐城内居住经商）来到北平找到我，要求去我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当即由我带到保定郊区地下交通站，送往晋察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河北省阜平县），后又送到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学习。姚伯强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城工部工作，1946年从张家口市派往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到1948年秋回到解放区城工部，1949年初随解放军进入北平，在全国妇联工作。卢长海由城工部介绍回敌占区工作，后自行脱离革命。

我在新闻学院学习期间，我本家叔叔姚公霖（现名姚南

珠)也去北平闲住,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形势与革命问题。他于抗战前在北平上学时,曾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加上他的亲戚姜克夫(一位中共老地下党员,当时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对他的帮助,思想进步,参加过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开始时,他又经姜克夫介绍在济南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与韩复榘合办的第三集团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其中多数人是进步的平津流亡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去聊城范筑先部工作。不久,就被家庭强制追回济南(当时家已迁往济南)。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经历,于是在1944年就很高地参加了我们的地下工作。1945年初,学院放了寒假,我回到高唐,他也从济南回到家乡,我们商量趁寒假时机,在高唐办一个中学生的补习班,借机认识一些学生,以便去他们中间开展工作。姚公霖通过他哥哥姚伟庭(时任高唐县伪商会会长),向伪县公署教育科立了案,并申请借给了县师范一间教室做课堂,由我俩和张守常(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放寒假也回了高唐)三人做辅导教师。当时约有二三十名中学、师范生参加,记得有寇金英、姚绍梅、张守真、李淑君、王国骥、刘炳麟等。

1945年春开学以后,我又介绍姚公霖到北平中华新闻学院学习,我在那里工作,我俩互相配合,在学生中开展工作,为了自卫的需要,我请他设法从伪军军官处借来手枪一支,长时间保存在我处。抗战胜利后,我又把姚公霖介绍到《中国日报》社做副刊编辑,他文才甚好,工作胜任有余,受到报社欢迎。我们一位地下党员刘燕雯,曾是《中国日报》(后改为《建国日报》)副刊编辑,不幸病故。当时领导她的宋汝芬同志(现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告

诉我说，几位地下党员拟写几篇悼念刘燕雯的文章在《中国日报》上刊载，问是否能够刊出？有无把握？我找姚公霖谈了此事，他满口答应尽力办成。以后宋汝芬把稿件送我转交姚公霖，他把这些稿件编了一个悼念刘的专刊，发表在该报副刊上了，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成功。1946年夏天，他在报社（当时已为《建国日报》）玩弄手枪时不慎走火自伤，出院后回济南家中休养，即与我失去了联系。这支手枪是他在日伪时期从家中借来供我们自卫用的，春节期间，我俩曾趁燃放爆竹的时候，试射过几次。济南解放后姚公霖曾在省广播电台工作多年，后在山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任副教授，现已离休。

张守常在北京大学读书，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大学子的爱国民主、反蒋反美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在全国学生运动中也举足轻重，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成果。张守常在这个环境中，一方面受到了革命的正面教育，另一方面也从国民党的卖国、专制、腐朽的反动行为中受到了反面教育，积极参加了革命工作，1947年由我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斗争，他当时在北平私立山东中学和育青女子高级职业学校兼任教员，次年又加入了中共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该组织已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可以从加入“人教联”起计算革命工龄）。他到育青女职任教（1945年12月开始）是我介绍去的，当时我由组织派到育青女职做教育工作，在党内担任副小组长。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余涤清、陆禹、杨伯箴等先后在该校当教员，藉以作职业掩护。余涤清当时是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陆

禹、杨伯箴都是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当时北平的地下工作主要是做学生的工作。北平解放后张守常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现为历史系教授，在史学界有些名望，常到外地讲学，也有一些著作问世。如《中国近代史纲要》（1952年新华书店发行）、《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等书，与他人合编的有《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沙俄侵华史简史》（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吴晗史学著作选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晗文集》（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等书。1987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张守常经过做工作，又发展了他的内弟郝启元（家住高唐城东三里庄）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当时郝在北平河北高中读书，由我通过党组织把他介绍给河北高中的党组织。郝启元积极投入了地下工作，有一次该校党组织举办了一个晚会宣传革命思想，演“兄妹开荒”一剧，被国民党特务破坏，逮捕了几个主办人，郝启元也一起被捕，1948年获释后，随姚伯强到了解放区，化名常瀑，由华北局城工部分配工作，1955年我在沈阳见到他时，他在沈阳军区政治文化部工作，后调到北京军委空军政治文化部，再后转业到北京一个军工厂工作。

原在高唐师范学习并参加过我们补习班的刘炳麟（高唐十里园人），以后升入济南师范学习，张守常经常和他通信联系，藉以进行革命教育，我们认为刘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在高唐读书时兼做校工打钟，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故向他做工作，他也很愿意接受革命教育。1948年暑假前，张守常与他先在信上说妥，要送他回“家”。他即从济南带来了他的

济师同学唐建中一起到北平找了张守常。当时我已留在解放区工作，张守常即直接把他俩介绍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校址在河北省正定市）。同年冬，刘炳麟到河北省平川县华北局分配工作，住在华北党校，当时我正在党校任组织干事，参与对他们的工作分配，我看到刘的档案后，把他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北平解放后，他在该报社当记者，后转到新华社当记者，现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参加革命后改名刘野，早已入党。唐建中改名唐米，现仍在《人民日报》社做后勤工作。

杨玉英，高唐县城西街人，原在三清观女子小学就读，抗战时期在德州私立博文中学校续读时，我也在德州上中学，彼此熟悉。1946年她从高唐突然到了北平，来北京大学宿舍找到了我，从交谈中得知她是在高唐有些顾虑，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了解不够，同时也想出来找个工作或进个公费学校，要我有所帮助。我当时把他介绍给高唐同乡朱秋林（当时任北平市卫生局科长兼环境卫生清洁大队长，后改任北平市立第一医院院长）处，在卫生系统找到了工作，她和姚伯强（姚卿诚）等在一个单位，我和姚伯强即向她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给她读了张仲实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进步书刊，她思想转变较快，加上受北平学生运动的影响，约在1946年冬天，由我和姚伯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她进入了私立惠童女子职业学校学习，积极参加了该校驱逐国民党员校长的学潮，起了一些作用。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经组织批准她加入了国民党；又由于同样原因，经组织批准后又加入了特务组织“中统”。1947年她到陕西蔡家坡找她的丈夫团圆去了，由于内战激烈，联系不便，便

与我们失去联系，从此也断了组织关系。杨玉英后在陕西省蔡家坡纺织厂小学任教，解放后仍在陕西（西安或咸阳）做教学工作。

（张金洪整理）

【作者简介】

董华，原名姚卿详，高唐南街人，1923年生，193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先后在高唐、保定、上海、北京（北师大）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铁道兵团党委秘书、兵团干校文化教育系主任、铁道兵隧道系副政委，1982年离休，正师职待遇。

姚彤辉传

姜 维 扬

姚彤辉，原名卿亭。一九一三年出生于高唐城里西街药商劣绅姚定汉家，为其长子姚伟廷之长女。幼年读书于三清观女子小学，曾由城隍庙道人鱼教会做媒与在黑龙江大赉县（1958年与安广县合并改设大安县）任律师之姜子云的长子姜绍虞（姜克夫）订婚。为此姜家在高唐原籍之二百亩祖产委托姚伟廷代管，使姚伟廷成为富商。一九三三年春，姜绍虞自东北来北平东北大学读书，由姚家将其接来高唐完婚。一九三五年夏，姜子云回高唐，决定由姜家供给学费，使彤辉随绍虞到北平读书，彤辉就读于华光女子中学，其授业老师为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工作人员、历史学家梁寒冰，彤辉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姜绍虞及其常在一起的进步同学也给她以影响。经历“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活动之后，由于毅夫吸收参加中共东北特支外围组织“东北人民抗日会”。一九三六年秋，在校经秦芙、张洁珣介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七年八月，平津沦陷，随其夫姜绍虞流亡到济南，因痛恨其腐败龌龊的封建家庭，是年九月毅然与其胞妹卿台（姚毅）考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以“华北救国会”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办的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当年九月中旬，日军接近山东。训练班以平津流亡学生、

中共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的千余名学员，以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合法名义，被派往惠民、临清、聊城、烟台等专员区发动民众抗战。是年底济南失守，留在训练班的百余名女生，不便派赴敌后打游击战，由训育员齐燕铭率领去徐州，参加中共与李宗仁合办的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在战地从事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守，随军退往河南潢川。田汉、万籟天等集中爱好文艺的团员创办抗敌剧社，彤辉随剧社迁往鸡公山。时彤辉任一个中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被桂系反共军官发觉，为避免民先组织被破坏，彤辉星夜逃走，在车站被反共军官追及，两人在车站扭打，将军官大腿咬破，后被缚回剧社囚禁。因彤辉和剧社演员、徐州盐商之女欧阳儒秋为密友，而儒秋容貌俊秀为李宗仁参谋长张任民所垂涎，中共地下党组织遂动员出欧阳向张游说：“目前是国共合作抗战，贵军是主张团结抗日者，不可残害爱国青年。”彤辉遂被释放，由欧阳资助六十万（折合黄金一两）逃往汉口，落脚于“东北救亡总会”。时日军正发动进攻武汉战役，彤辉又随中共前华北联络局工作人员（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助教、第三集团军政训处组织干事）安翰华率领，组织战地工作团，进入西北军刘汝明第二十八军团开展工作，随刘汝明部队阻击溯长江西进的日本侵略军于黄梅、广济、蕲春、浠水、黄冈等地。长江沿岸低洼泥泞，天气炎热，潮湿的气温侵袭，北方的军人不能承受，大多染上疟疾，几乎丧失战斗力，但官兵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与日寇侵略军拼杀了三个月。彤辉在前方亦染疟疾，是年十月初返回武汉。此时其夫姜绍虞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聊城带着范筑先发给的护照南下宣传，也来到武汉。不久武汉失守，彤

辉同姜绍虞随中共东北特委书记刘澜波等去延安。

姚彤辉到达延安，即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八大队。一九三九年秋，又编入女子大学第一中队学习，经乌兰、杨勃然介绍参加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秋女大毕业，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图书馆工作。一九四〇年春，清算王明代表第三国际推行机会主义对中国人民革命造成的极大危害，端正中共路线，毛主席发动整顿“三风”运动。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却将运动扭向审干抓特务。一九四二年春，康将认为情节严重者投入监狱，以其从苏联学来的手段进行逼供，越咬越多，延安成为特务的天下。康生为扩大战果，于一九四三年秋，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在边区各地扩大抓特务斗争，将进入边区的爱国青年，百分之九十打成特务。因彤辉在学校填写入党志愿书时，曾填写其父原系高唐商会会长，日寇侵入高唐，曾一度任维持会长（均系其夫由山东到延安时告诉她的），就成了被审查的重要份子。一九四三年夏彤辉被揪入边区系统审查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行政学院。陕北地方干部将在白区参加救亡运动多年的姚彤辉打成日本特务，日夜围攻，受尽折磨。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周恩来由重庆飞回，向延安各机关作报告《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始解除对外地进入边区爱国青年的怀疑，毛泽东也认为这样下去，中共再无可用的干部，遂向被冤枉者道歉，施行摘帽礼，结束康生这个大坏蛋制造的混乱。姚彤辉因在行政学院受折磨，身体异常虚弱，遂于解除监禁后，去其夫机关“解放日报社”养病。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十月随其夫去东北工作。一九四六年二月起任辽北省安广县教育科长兼县中校长。是年

夏，八路军从长春撤退，为坚持敌后对蒋军作战，大赉、安广两县合并为赉广联合县，彤辉任县妇联会主任，率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土改，一九四七年二月调任齐齐哈尔市政府秘书，是年秋调安达县工作，任城区工委书记。一九四八年五月调哈尔滨中共东北局城工部训练班，与其夫姜克夫离婚，是年冬沈阳解放，任沈阳特别市中共沈阳区委宣传部长，以后又任中共沈阳市政府机关党委组织部长（十三级干部）。

姚彤辉参加工作后，作风泼辣，能打开局面，由于嫉恶如仇，要求过严，为工作疲拖的干部所畏惧。由于幼年时期在封建家庭受刺激过深，在延安康生的抢救运动中又遭受极大折磨，年仅三十几岁即经常神经失常，曾去南京精神病医院疗养，后稍痊愈，但已很难胜任工作，于一九六一年病故于沈阳。

【附】姜克夫同志的信

政协高唐县委员会：

……与解金声、李锡慈诸同志谈起高唐老同志事，都对姚伟廷家族出了共产党不理解，为解除疑团，我将姚彤辉姐妹参加革命事做一简介。

中国在旧时代社会是极错综复杂的，在矛盾重重的旧家庭中会出现革命者，当然其大多数成员仍是极反动腐朽的，姚定汉家就是个典型。我一九一六年生人于后郭庄，每年付外祖家一百二十元寄养，一九二四年我父从黑龙江来高拟带东北读书，外祖家不让，为安抚外家由道士鱼教会作媒定下姚家这门亲事，从此委姚伟廷代管产业，就成了伟廷发家资本，讨了三房老婆。我们家远在关外，不知姚定汉家丑恶内幕，一九三三年我到北平，就由她家接来成婚，又由我家出

钱 供 其济南、北平求学（姚家太吝啬，他们不供子弟求学上进）。姚卿亭来北平认识了我的一些朋友，成了共产主义者，经党培养成了一名勇敢的斗士。以后因神经失常，在哈尔滨经东北局批准脱离夫妻关系，但做为党的干部，她还是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的，为此特将其经历写出。彤辉在高唐妇女中也算个先进人物，故写出以纪念死去的这位女同志。

敬礼

克 夫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浅忆房雪蓑

杨青先

某日，王洪达同志（赵庄乡于庄人，1939年入党）谈起，他在十来岁时，因事到王光照同志（赵庄乡房庙人，1936年入党）家，一进屋门就看到桌子上一群小鸡乱跑，一只老母鸡抖毛展翅咯咯叫，大发雷霆似的向怀里召唤它的“孩子”。洪达同志吃惊地喊道：“鸡上桌了！”其实，不是鸡上桌子，而是房雪蓑同志画的一张画，名曰“母子情深”。由此勾起我的一段回忆。那是在1938年，我的哥哥拿回家来一张画贴在墙上。这张画从近处看是一群大大小小的鸟儿，欢腾跳跃，吱吱咋咋，落在一棵树上，有的在树梢枝头，有的在树的躯干上，有的在露出地面的树根上，它们有的被树叶遮住，有的遮住树叶，有的这只鸟遮住那只鸟的头，有的那只鸟遮住这只鸟的尾，乱而不紊，引人入胜。远看呢，是“龙凤”二字，若飞若舞，气势磅礴。大人们说：“这是房雪蓑（笔名房万里）画的。房雪蓑是画家李苦禅先生的爱徒，酷爱写意画，他画的画生动逼真，义理深奥，传说在全国数第二在华北数第一呢！”

后来，听朱学温、李家丰等同志介绍，知房雪蓑同志的真名叫房士圣，笔名叫房万里，社会名叫房自强或房雪蓑。

房雪蓑，1913年生人，高唐城西房庙村人，幼年时期在家读书，天资聪明。1933年前后在县里他带领在校生带资赴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艺，同年七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艺术系主任的李苦禅教授，思想进步，爱惜人才。社会上反共斥共甚嚣尘上，杭州艺专受到当局的骚扰。据李苦禅教授说，那时上面怀疑房雪蓑班的学生参加共产党活动，派人到学校教学楼上搞突然袭击，他见状急中生智，高声对学生说：“你们完成作业了吗？快些做，时间到了，下课吧！”示意学生躲避当局的搜查。房雪蓑等听苦禅话中有话，心领神会，迅速离去，闹得当局人员呆若木鸡，不了了之，避免了一场麻烦事的发生。1934年房雪蓑在杭州艺专毕业，到济南尚志中学任美术教师，1935年7、8月份，因遭叛徒告密，他和几位进步同学被当局通缉，被迫离校到北京同学家避难，春节回高唐老家暂居。1936年，他去西安，由同学张介平（共产党员）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与西安大学联合在一起，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工作。1937年，他回到济南美术学校做招生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回家乡，曾活动于鲁西、泰西等地区，结识了八路军津浦支队新一营副营长曹丕堂同志，交往甚密，一度生活工作与共，受到韩哲一、张承先等领导同志赏识。他还与本县三清观女高校长杨厚基是密友，两人志同道合，谈吐很投机，经常一起以诗言志，以画表情，陈述理想和抱负。1938年张承先同志任职于中共鲁西党委，给房雪蓑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如鱼得水，竭尽其力，发挥聪明才智，参与组织中共鲁西北工作团，并被委任为团长，活跃在鲁西北大地。1940年，该工作团并入王克寇部，房调中共鲁西党委具体抓宣传工作，经常深入到一些抗日团体和地方武装内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做争取发动工作。

此时，他结识了忠实的马秀文同志，两人在交往中建立了感情，但未经组织批准就结了婚，表现出组织观念淡薄和自矜其功的言行，受到领导批评，作了检查。时，王洪达同志向中共特委组织汇报工作，听领导说，本想叫房雪蓑任高唐副县长，因出了点问题，就搁下了。1942年，房雪蓑奉命去做争取邓协忱的工作，顺便到家探望母亲，不慎走漏风声，敌人当夜去房庙捕他。他警惕性强，机智灵活顺利逃出，但其弟弟和爱人马秀文被敌人捕去。当时，伪县长李九亲临于庄，厉声责问房雪蓑的叔叔：“房雪蓑是共产党你知道吧？”

“房雪蓑来家你知道吧？！”其叔答曰：“不知！”李九又说：“你告诉房雪蓑，邓协忱向我投降了，告了他，别在这里活动了，远走高飞吧！”房雪蓑为了营救亲人，进城托关系使马秀文获释，而本人却落入虎口，敌人妄图利用房雪蓑进城一事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一方面广造舆论，到处散布房雪蓑投降的谎言，一方面又对房雪蓑说：“你这样的人才，我们应当三顾茅庐，你来了是大好事，我们求之不得”。房雪蓑识破敌人的险恶用心，设法带一家人逃出，发现党组织疏远他（实际是必要的警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远走他乡了。房雪蓑进城被捕，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震惊，惟恐房出卖组织，使组织遭受损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那样做。

1948年，房雪蓑从外地回家乡，他身体已有病。当初的老领导调别处工作，新领导人知他已脱党，也就没有重视他。而他自己本希望解放后在党的怀抱得到温暖，可遇到的现实情况却是冷淡，他有苦难言，病情逐渐加重。五十年代初，他曾去北京找李苦禅、张守常等助一臂之力，到学校当

一名美术教师，可在京期间遇上公安人员晚上查户口，他精神病发作，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要跟人家走，人们见状罢之。由京回家后无以寄托，有时到高唐中学找金维城校长聊聊，画过一张《长江万里》画，学生们知他是画家、老革命，患有精神病，觉得惊奇，围观他。他的爱人马秀文在丈夫病体拖累下有苦难言，坚持在谷官屯、卅里、杨老庄等学校任教，有时俩人发生争执，前来劝慰的人一听骂的话是什么“托洛斯基”、“肯定”、“否定”等，不解其意，以为是脏话，不便插言就告退了。1960年后，他闯荡到腾县，制了一个虎版，一家人印虎，制泥虎卖，以糊口度日，生活困难到极点，精神病越发严重。1963年，他回到家乡，有些支持不住了。想起儿子房泽善，1940年参加革命，1944年在恩县公安局做侦缉工作，同年古历正月底在恩县旧城只身下了敌人两支枪，古历三月在腾庄工作期间同敌人遭遇，因打枪卡壳被敌人围捕，凶残的敌人将他活埋了，年仅18岁；想起侄子房泽元，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司法科长、德州专署办公室主任，死于济南。革命战争年代一家人流离失所，如今解放了又不被人理解。想到伤心处，写下遗文自尽了。城关庄助理员闻讯赶赴现场，见其遗文曰：严于律己，最后说我“出卖”了组织，对敌人说了谢觉哉、刘伯承是共产党。这说明房雪蓑同志并没供出地下党情况，而是立场坚定地蔑视和耍弄了敌人。

（根据李家丰、房士龄、王洪达、朱学温等同志口述整理）

郭瑞林血战疆场

于海舰

郭瑞林，清平镇许庄人，1914年生于一个贫苦人家，自幼性格倔强，富有正义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亲眼看到日伪军的残暴行为，激起了民族义愤，于1939年初召集十余名热血青年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他带头卖掉自家的耕地，购买枪支，提出“打鬼镇邪，护家保国”的口号（“鬼”指的是日寇，邪指的是皇协军即伪军），带领抗日武装人员经常夜宿野外，不骚扰百姓，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护，队伍很快发展到二百余人，成立了抗日自卫团。1940年春，郭瑞林与博平县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周庆余（原名周喜）取得联系，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1941年，中共运东地委书记郭少英和专员谢鑫鹤决定郭瑞林部仍以民团为掩护，坚持在旧城镇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郭瑞林英勇顽强地率部打日寇、锄汉奸，威震敌胆，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抗日的赞歌。

痛歼日寇

1942年阴历十一月的一天，一小股日寇（约10人）带一名翻译从旧城窜到仓上一带抢劫，中午来到仓上村西。当时，郭瑞林部正驻扎在仓上村，大家对骄横的日寇早就恨得咬牙切切

齿，盼望郭瑞林赶快下达开火的命令，狠狠地惩罚日本侵略者。郭瑞林沉着应战，示意大家隐蔽待命，近战歼敌。日寇先对仓上村内打了一阵子枪，见没有动静，就放心地进入村西庙内歇息。郭瑞林见机行事，派高富祥近前侦察，高富祥悄悄跃上庙墙，见日寇正在庙内蹲着吃东西，即向郭瑞林招手示意，郭瑞林迅速指挥所部兵分两路包围敌人，步步紧逼，置敌于瓮中之鳖。然后，先锋战士搭人梯攀上庙顶，向庙内投掷手榴弹，炸得日寇血肉横飞，几名日寇当即毙命。日寇小队长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不知所措，等定神后才嚎叫着进行反扑，用机枪朝庙外扫射，但为时已晚。郭瑞林带领几名队员，避开敌人的火力，从侧面绕过去，破窗入庙，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日寇小队长刚逃出几步，被郭瑞林一枪击毙，除一名翻译漏网逃窜，其余日寇全部被歼。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开，群众拍手称好，郭瑞林部士气大振，小股日寇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巧取伪械

仓上战斗结束一个月后，郭瑞林率一精干小队，身着缴获的日寇军服，携缴获的日寇枪支，乘从旧城花行借来的一辆汽车，向夏津县城驶去。快到县城时，郭瑞林派刘立兴埋伏城外准备接应，待机控制东城门出口。在城墙上值勤的日伪人员，见有“皇军”乘车驶来，慌忙打开城门，让“皇军”进城。郭瑞林小队的汽车径直驶进伪军驻地，立即实行戒严，伪军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扮作日寇军官的郭瑞林，叽哩哇啦地喊起话来，“翻译”对日伪领班

人大声说：“皇军命令你们把枪支放在一起，赶快集合！”不一会十几个伪军站到一起，听郭瑞林训话，郭部队员迅速将日伪的枪支扔上车去，日伪人员发觉事情异常，但面对乌黑的枪口吓得都不敢吱声。郭瑞林一个暗号，队员们飞身跃上汽车，向城外驰去，大家说笑着返回驻地。

血战于庄

1943年旧历八月十三日，郭瑞林率团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在旧城城南活动，晚上露宿于韩庄松林里，午夜后进驻于庄村内。时郭部二营李文×驻张庄，三营张茂选驻于庄附近××村。不料郭部的行动被敌人侦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驻旧城的汪伪治安军两个团联合博平伪军罗兆荣部，在日寇的指使下，包围了于庄郭瑞林部。当时驻于庄的郭部兵力只有六、七十个人，兵力少，虽然沿村有三米多高的寨墙，墙外有十多米宽的壕沟，但仍不足以抗击敌人的攻击。郭瑞林临危不惧，力显英雄本色，誓与日伪决一死战。他一面布置战斗，一面安排联系二、三营和在平县大队支援。日伪施展“劝降”的阴谋，修书一封送往村内，说只要郭瑞林不再和皇军作对，要官有官，要钱有钱。郭瑞林撕碎《劝降书》，怒斥伪军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罪行，表明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强决心。日伪头目劝降失败，气急败坏下令发起全线攻击，活捉郭瑞林。郭瑞林和李连长指挥所部近战歼敌，一阵猛打，迫使敌人丢下一片尸体抱头鼠窜。不多时，敌人第二次进攻又开始了，蚂蚁似的敌人涌向村寨，利用云梯爬上寨墙，郭部战士用刺刀把敌人拼下去。敌人又

用小炮轰开了北寨门，冲进村内杀人放火。郭部在已伤亡过半的情况下，以院落为依托进行顽强的抵抗，杀伤了许多敌人，但寡不敌众，李连长光荣牺牲，郭瑞林身负重伤后，拒绝了警卫员背走他的要求，坚持战斗，用一条腿支撑着身体向敌人进行猛烈射击，最后壮烈牺牲。疯狂的敌人又将郭部13名伤员枪杀。至此郭部指战员全部遇难，而敌人也留下了三百余具尸体。郭部指战员的英勇行为唤起了抗日军民更大规模地反侵略斗争，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刘文豹勇斗日本兵

吴光中

高唐县濶河乡后坡村刘家，于1922年的一天，添一虎头虎脑的男儿，取名小豹。旧社会，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苦难日子。刘家更是如此。尽管处境艰难，刘氏夫妇为了传宗接代，不受人欺侮，精心养育着小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小豹十岁了，个儿有一米七高，虎背熊腰，浑身是劲，虽然衣着褴褛，可是性格刚毅、开朗、活泼，乡亲们亲切地叫他“豹子”。因为家境贫寒，豹子没能入学读书。十八岁时，家族排辈从“文”字取名，豹子取了个大名刘文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铁蹄南踏，十月十六日侵犯高唐，翌年十一月驻扎高唐，疯狂烧杀抢掠，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年已十八岁的刘文豹，虽然脸上还流露着稚气，可身材很魁梧，举止言谈也像大人了。他亲眼目睹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义愤填膺。心想，如果我自己能有一支钢枪，亲手杀死日本鬼子，那该有多好啊。1940年初春，后坡村凡是家有几亩地的农户，都开始了春耕备播，有的忙着往地里送土杂肥，有的忙于平整土地，而文豹家地亩寥寥，很快忙完了农活，文豹背着粪筐，手持粪杈，四处拾粪。一天午后，文豹照常出家门上路拾粪，走到村东头时，见一日本兵，由李华村方向向西走来，手持“三八式”大盖枪，

面色黑黄，眼睛放射着贪婪凶残的目光。他原来是从禹城县境窜犯高唐县李华村小股日寇的一员，酒后到后坡村来，以要水喝为名，妄图独自糟踏妇女。刘文豹见此情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心干掉这个日本兵。他镇定自若迎上前去若无其事寻机下手。只见那日本兵哇啦哇啦，比比划划，意思是“花姑娘的有”？“到有花姑娘的人家去喝水”，企图发泄兽欲。文豹趁机迎合其歹意，将他引向一口井边，准备推入井中了之，日本兵到井边迟疑片刻，向文豹摆摆手，意思是“不、不、不”。文豹想，钢枪掉到井里也是麻烦，故而又将其引至后坡村北面离家不远的地方，一则万一自己势单力薄，可以呼唤村里人，以众治寡；二则选一块空地便于同日寇进行搏斗；三则空地旁有一大坑，可以就地掩埋日寇的尸体。文豹横下一条心，从日本兵背后猛力夺下枪来，抱住日寇的腰扭打起来。日本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气红了眼，野猪般嗷嗷大叫，挣扎着拿枪想击毙文豹，文豹那肯让日本兵有还手之机，奋力将其摔倒在地。此时日本兵似醉非醉，施展打斗本领翻滚不止，几乎占了上风。文豹毫不示弱，咬紧牙关，使尽全身力气将日本兵压在身下，卡住日寇的脖子，抡起“铁拳”，击打不停。日本兵无力顽抗了，便拍拍自己的上衣口袋，示意文豹取钱。文豹“呸”一声，举拳打下去，打得日本兵头青脸肿，鼻口出血，脑袋贴地，气息奄奄了。文豹眼看着侵略兵就要命归“王道乐土”，不由自主地心花怒放。就在文豹与日寇搏斗的时候，后坡村民急促相告，赶到搏斗现场相助，其中有一个带手枪的刘家琦（在陈胜堂部当兵），他把枪口稳稳地对准日本兵的血葫芦头，“叭”的一声，彻底交待了日寇的性命，将缴获的

“三八式”大枪，交给了杂团头子陈胜堂。刘文豹不悦，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把枪抓在手呢！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再斗日本兵，夺取钢枪，多消灭“豺狼”，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报仇雪恨。

陈胜堂得了日本人的枪，知道刘文豹是位英雄好汉，一定要文豹去陈团当兵，文豹开始不愿去，后来又想，如果能在陈团扛钢枪，也能多打死些日本鬼子，便去了陈团。1942年，刘文豹在对日作战中英勇杀敌，战功卓著，不幸的是，他随部队在恩县、夏津交界处的津期店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好男儿刘文豹安息吧，人民永远怀念你！

京剧在高唐

张兰亭 鞠立楷

京剧亦称“国剧”，她与国画、中医并称为我国的三大“国粹”。在距今二百年前，清朝乾隆皇帝做寿时，曾召调“汉调”入京，道光年间，距今一百五十年左右，又有王洪贵、童应喜入京供奉演出。到了咸丰、同治年间（1851——1862），距今一百三十年左右，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进京。当时著名的老生程长庚、余三胜老先生就是徽、汉两派的开山祖师，程擅长昆曲，余工汉调，同时还有一位唱老旦的谭志道（就是谭鑫培老板的父亲）。后来谭鑫培老板撷取了各家的优点，包罗万象的自成一派，改唱京剧老生，旦角是梅兰芳先生的祖父梅巧玲老板。他们混合了徽、汉两派地方戏，又吸收了一部分昆曲的精华组织成功的京剧。到了19世纪20年代，京剧有了大的发展，旦角有：梅、程、尚、荀，生角有余、马、言、高等，净角有金秀山、金少山、郝寿臣、裘盛荣，老旦有龚云甫、李多奎，丑角有萧长华、马富禄，小生有叶盛兰等等。京剧的兴盛与叶春善（叶盛兰的父亲）和萧长华两位老先生的功劳分不开。清光绪三十三年，叶老先生创办“喜连成”科班，萧老先生执教，他对生、旦、净、丑角都能教，培养了周信芳、小益芳、梅兰芳、小穆子等一批名角。后来“喜连成”科班的东家易人“喜连成”改名“富连成”，叶、萧仍然主持科班的工作，共办了七科，有四十二年的历史，教

出的学生有700余人，其中有花旦小翠花、老生马连良等。此外，程艳秋办过“戏剧学校”，尚小云办过“荣椿社”，李万春办过“鸣春社”，他们也都对京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我们高唐来说，1922年城里西街姚公富先生组建了第一个科班，名叫“姚家班”，地址在西关“来峰寺”，该科班有70余名小青年参加学习，京剧和梆腔都学，其中出了一个比较有名的青衣“泰顺”和一个名丑“火车头”。到了1927年，东街柳春阳先生又办起了一个“柳家班”，也是京剧、梆腔都学，该科班有60人，后来唱梆子戏的演员中出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刀马花旦“春玲”，唱京剧的演员出了两个好武生：王玉江（外号秃顺）和张集。三十年代京剧在高唐愈来愈兴盛了。一般群众都能喊上两口，农民抗起小镢子、锄头下地干活，嘴里也哼着“一马离了西凉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票界（票友）人物，王惠民老师演过《捉放曹》，杨振生先生演过《坐宫》、《探阴山》，张守常先生演过《落马湖》等。他们的演出可谓影响广泛轰动一时。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青年时就热爱京剧，后来在北京经常票戏，表演过《霸王别姬》、《铁笼山》等剧目。三十年代高唐尚无戏院设施，戏班唱戏不是搭台子唱就是在戏楼上唱。1943年，由姚伟庭出面、商会凑钱修建了高唐第一家戏院，取名“同乐剧院”，地址在菜市街和果木市街之间，院门朝西。同年，伪二区区长陈耀泰组织剧团，由京、津、济南等地陆续邀来姜春霞、韩世富、李和曾、刘洪生、朱文祥、王艳秋、张美苓、魏少臣等，他们上演的剧目主要有《呼延庆打擂》、《借东风》、《辕门斩子》、《失空斩》等。剧院每天晚上

观众爆满，场面十分热烈。许多戏迷顾不上吃饭，怀揣一小瓶（四小两装）山东白干酒，边听戏边饮酒，伴随着台上演员的演出哼着京剧段子。那时，李和曾先生的唱功很好，观众交口称赞，群众争先恐后看他的戏，许多戏迷（如张兰亭、张守常、于满堂等）竟相求教于他。1946年，高唐全境解放，李和曾、刘洪生、姜云霞、朱文祥等组成“解放剧社”，归人民解放军二纵队四旅政治部领导，活跃于鲁西北等地，为推进革命文化事业而奔波奋斗。

高唐群众热爱京剧艺术，不单在城里形成了“京剧热”，而且乡间也广泛开展了京剧演唱活动。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兵匪袭扰，百姓离家出走，有的带着粮食、衣物，有的牵着牲畜，也有的不忘带上自己的京剧伴奏乐器——京胡。大田庄农民田百明，在兵祸将至时，抓起一把胡琴逃往僻野荒郊，看看“风声”不紧时，便依在坟头上拉起了京胡，解开胸中的郁闷，控诉兵匪的罪行；尚官屯村的京剧爱好者，于炎夏乘凉时，聚集场院演唱京剧，有些青年在房顶上聚会，或演奏京剧曲牌或清唱京剧段子，也有的人演练技艺研讨戏文。该村双目失明的农民鞠立朋，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钻研京剧曲牌，拉得一手好京胡，博得广泛的赞誉。

1948年，艺人张兆洪（艺名三保）、孙树申、王光相等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高唐解放后的第一个戏班，演唱河北梆子、京剧和四根弦剧。1950年，商联会会长王长庭发动票友为抗美援朝举行义演，借用在平京剧团（当时该团正在高唐剧院演出）的配角、行头，陈子楨、崔长卿、张兰亭等上演了《空城计》、《打渔杀家》、《起解玉堂春》剧目。1951年，有王清禄（外号王二墩子）、王玉江、

鲁其恒等人，组织高唐“工农剧团”，演出京剧和梆子戏。梆子戏的唱角有“小香水”、徐万城等；演京剧的有张兆洪一家人、王玉江、孙树生（老生）、王清禄（花脸）等。

“工农剧团”成立后的第一场戏在城南三杨村演出，票友张兰亭在朋友的鼓励下也上台票了一回戏。之后，“工农剧团”长期坚持在城乡巡回演出，先后上演了京剧《斩经堂》、《清官册》、《珠帘寨》、《下江南》、《黄逼宫》等剧目，演出的梆子戏有《双官告》、《大登殿》、《喜荣归》、《玉虎坠》等剧目，丰富了高唐城乡的文化生活。后来，剧团因为缺乏名师指导和面临经济困难，归属禹城县“胜利剧团（新生京剧团的前身）”。1952年，城关西街组织了“业余京剧俱乐部”，王长庭、马富民、杨荣谱等组织京剧爱好者张兰亭、张华庭、杨树春、张克峰、张克岭、寇云祥、沈风云、尹绪礼等20余人，演唱京剧，每逢欢送新兵入伍、祝贺“国庆”和欢度春节时机，不断演出，在行头、道具不全的情况下，自己设计灯光（汽灯）布景，既节约了资金，又受到群众欢迎，县文化馆为俱乐部大做宣传，“京剧俱乐部”在县剧院售票演出四天，收入用于置办道具行头。该俱乐部演出剧目有《孔雀东南飞》、《梁山泊与祝英台》、《起解玉堂春》、《宇宙锋》、《翻天覆地的人》等，虽然那时演出条件比较差，演员水平也不算高，但他们的演出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个俱乐部至1956年因故解体。

1958年高禹合县，禹城县的“新生京剧团”，改名为“高唐京剧团”。该剧团的演员多是高唐老艺人张兆洪戏班的老班底，为高唐群众所熟悉。高唐京剧团的诞生，使群众中的京剧热，又掀起了波澜。京剧团因势而振，演员队伍扩

大。主要演员有：老生艳月樵、陈碧芹，陈明玉、李海忠，青衣赵明秋、陈淑芹，花旦陈慧芹，武生王玉江、张少亭、鲁志高，刀马花旦张少英、鄢秀兰，小生闫金堂，花脸房德虎、刘勇，小花脸王长生等。其中张少英曾被全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收为徒弟，她的看家戏《失子惊疯》是尚小云先生亲传的。另外剧团还高薪聘请了演唱俱佳的青衣阚会秋、老生殷昭云、花旦姜梅萍等。剧团的司鼓是李保福、刘会来，琴师是张立文、白月华、杜桂岭。该剧团除上演传统剧目外，还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排演了新剧《洪湖赤卫队》，《向秀丽》、《白毛女》等革命现代戏，丰富了京剧舞台演出内容。他们长期扎根农村，为广大农民演出，每去一地都是自运道具、布景，自带小型流动舞台，自安锅灶起火，不给群众添烦麻。他们的足迹遍布在全县各乡镇农村，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给群众演戏。他们在工作之余，还组成慰问小组，为军属、残废军人、五保户老人拆洗被褥，缝补衣服，打水扫院子，还把戏送到行动不便的观众面前，他们经常对乡村剧团和京剧爱好者进行辅导、说戏，促进了基层戏曲活动的开展。尚官屯村的剧团在他们的帮助下，竟然能够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大型剧目。他们不单在县内演出，而且长途跋涉到位山治河工地慰问演出，和河工们一起挖河治水，鼓舞了河工的干劲。在防洪部队驻地及河北省威县、冀县、峰峰矿区等地演出时，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京剧唱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1963年剧团在河北大名县演出期间，一天晚上剧院附近一商店突然发生火灾，全体演员顾不上卸装就奔赴火灾现场，奋不顾身地将火扑灭，使国

家财产免遭重大损失，当地政府和群众高度赞扬高唐京剧团的良好思想作风。1972年，聊城地区举办文艺会演，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专门调去高唐京剧团，演出该团自编自演的现代京剧《盐庄清泉》，为全区文艺会演增添了光彩。由于剧团全体同志的努力，高唐京剧团多次被地区评为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革命化庄户剧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北日报》等新闻宣传机构，多次报道了高唐京剧团的事迹，社会对高唐京剧团的赞誉声不绝于耳。

高唐京剧团所以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与剧团的领导人恪尽职守是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先后担任剧团领导工作的秘书廷、王曰群、李曰尝、董良臣、杨洪泉、刘荫奎等，大都爱好京剧。他们身先士卒，与演员同甘共苦，加强了政治思想和行政业务领导，特别是王曰群同志，在剧团任职十几年，忘我工作，遇到武场一时缺少人手时，他就补缺到位，拉琴、敲钹样样拿得起来，他对京剧事业的执著追求，鼓舞着剧团的同志艰苦奋斗扎实工作。

1980年以后，随着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看戏的观众越来越少，剧团经费困难，京剧团分为“高唐京剧团”和“高唐县青年京剧团”（时称大团和小团）。“小团”成立后，演员们思想解放，干劲倍增，积极活动了一段时间，但毕竟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虽然作了不少努力，可是仍然步履维艰，票房价值每况愈下。1987年经上级决策，高唐京剧团（含小团）解体，演（职）员在组织关怀下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县直企事业部门）。他们虽然人离开了剧团，但仍然深深怀念那火红的年代和京剧艺术。他们回顾剧团曾经上演

的剧目，多达130多个。其中古装戏近百出，现代戏30多出。古装戏主要剧目有《打金枝》、《苦忠义》、《生死恨》、《穆柯寨》、《八宝公主》、《春秋配》、《十三妹》、《锁麟囊》、《红桃山》、《三打白骨精》、《秋江》、《凤还巢》、《青山英烈》、《玉堂春》、《对花枪》、《白蛇传》、《李逵大闹高唐州》等；现代戏主要有《节振国》、《红嫂》、《海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龙江颂》、《平原作战》等。

原高唐京剧团的演员，离开京剧团后，对京剧酷爱程度依然不减当年。如陈淑芹、张月明、姚雪、钱锋、郭军、张少亭、孙万林、王长生等都在基层单位积极进行了业余京剧文化活动。他们有的赴地区演出，有的在县城演出，有的为高唐酒厂演出广告戏曲小品《李逵卖酒》，有的积极参与节日文化活动，有的参加了老年体协京剧组，他们与常年坚持活动的京爱好者于满堂、张兰亭、王守仁等老同志每星期六到工会俱乐部集中活动，到聊城参加会演受到好评，县电视台多次为他们录相播放，扩大了社会影响。上述情况表明，京剧在我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党中央“振兴京剧”的号召一定会在我县得到积极响应。

张少英小传

石超昆

张少英，高唐城关镇西街人，中共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生前任高唐县京剧团业务副团长。

她1941年5月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其父张兆宏是京剧花脸演员，其母石秀兰是河北梆子青衣演员。前辈的艺术生涯对她有较深的影响，为她从事艺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九岁正式学艺，1953年拜著名京剧演员王艳秋为师，主攻刀马花旦，1962年又拜艺术大师高小云先生为师。她随剧团主要活跃在高唐、禹城、德州、济南和胶东各地。1957年至1966年在禹城、新泰、高唐工作时，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加聊城地区戏剧会演时，被评为优秀演员，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省“群英会”，1963年被推荐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她高尚的思想作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聊城地区较有影响。

她一生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昭君出塞》、《乾坤福寿镜》、《挡马》、《卖水》、《战金山》、《红桃山》、《盘丝洞》、《花木兰》、《泗州城》、《青山英烈》、《三打白骨精》、《水帘洞》、《芦花荡》、《花蝴蝶》、《八宝公主》、《红军关》、《十三妹》等几十个剧目，有不少是反串角色，充分体现了她高超的技艺。其中最拿手的剧目有《昭君出塞》、《乾坤福寿镜》、《挡马》、《盘丝

洞》、《十三妹》、《八宝公主》等。

她的艺术表演风格正规、细腻、严肃认真。她从小学艺，基本功扎实，她主演的《战金山》、《盘丝洞》等刀马戏，取王艳秋老师之长，又增加了一些高难度技巧动作：耍红绸、耍盘、火流星、软功和高跟头等，这些为一般刀马旦所不能及的动作，形成了她自己所特有的艺术风格，使观众耳目一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拜师尚小云先生攻文戏，尚小云亲授她《乾坤福寿镜》、《昭君出塞》。在尚老师的精心培养下，加上她自身的苦练和巧练，克服了自己声音先天不足的弱点，使之达到了高音亮而不飘，低音厚而不闷的要求，老师很满意。特别是她的身段功和水袖功运用得手，干净利落，那真是如彩云飞舞，似青山瀑布。

她从艺几十年，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行车装台，她都是早起晚睡三遍功，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她常说：“误功一时回功三日，没有过硬的功夫怎么能保证演好戏呢！”正规，是她打开戏路子的一个主要因素。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要想把戏演好就要刻苦的磨练自己，把功底打牢，把戏路子走正，这是她常说的话。所以她的表演艺术总给人以正规之感。她认为，演员要对剧本负责，要对剧中人物忠诚，要深刻的学习、理解剧本，刻画人物，而不能叫人物刻画自己，要演什么象什么，不能演什么都是自己。所以在她演过的剧中，不管是小姐、夫人，还是女扮男装的杨家后生，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舞台形象。严肃认真，是她对待艺术工作的集中体现。她一生演过很多主要角色，也演过相当一部分戏的配角，如龙套、家丁、马童等，但不管是什么角色，只要交给她，她都能认真形象地把戏演好。她的技艺，她的

工作态度，她的为人处事，博得了老一辈和同行们的赞扬。她每次到济南演出，尚长麟、方荣翔、路登云都去团里看望她，并在业务上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张少英的心灵和她的艺术之花一样美。她的思想面貌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概括：正派、诚恳、忠诚、热情。1959年她刚满十九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次被评为县级劳动模范，可她从不自满，事事时时严格要求自己。1966年，当组织提出对文艺界高薪演员实行低薪时，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演员，自己要起带头作用，帮助组织做好这一工作。那时她仅仅是个十三级的演员，但她还是主动地向组织提出要求，将自己原有的十三级降为十四级，月工资由五十七元降为五十一元，直至1981年才恢复原工资。她的生活非常俭朴，平时从不乱花一分钱，平生没有买过一双皮鞋穿，一双布鞋打过三个补丁还舍不得扔掉，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她是一位名演员。她团结同志广泛，组织叫她做妇女工作，她就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一工作做好，经常找姊妹们谈心，帮助做些家务，设法给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对本团的学员，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生活上，经常给他们缝缝补补，打洗脸水，做病号饭；思想上经常给他们讲自己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体会，教他们怎样做人；业务上，她对学员从不保守，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艺全部教给他们。由于她教的认真，要求严格，带出了不少“好苗”。宋翠平就是其中一个，少英传授给她的《红桃山》、《挡马》、《武松打店》等几出戏，都受到了领导和观众的好评。

可是，就这样一个酷爱艺术事业、乐意为人民献出一切

的人，也没能逃脱“文化大革命”对她的迫害。1966年，她刚上任业务副团长不足半年，就被诬蔑为“走白专道路的黑典型”、“文艺黑线的孝子贤孙”、“新上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天挨批挨斗写检查，扫大街、帮炊、打扫厕所，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她被逼精神失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得以彻底平反，精神恢复了正常，焕发了青春。她的工作热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经常到工厂、农村、学校演出，从不讲条件。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尽管她把医生的诊断书、休假条藏起来带病坚持工作，坚持演出，但她毕竟是身心受过重创的人，终于在1982年2月21日旧病复发身亡。

1989年5月20日

大石漂游录

朱希江 刘恩水

一块顽强的石头，沐浴过炮火硝烟，饱览了风云变幻，阅尽人间冷暖，曾飘洋过海，去寻求人间艺术的理想殿堂。终于在花甲之年，又归落到母亲怀抱。

——题记

正是花红柳绿、生机盎然的暮春时节，在高唐县招待所的小会客厅里，我们会见了一位名噪画坛的老画家，一位历尽坎坷，曾经定居台湾、美国数十年，最后又毅然回到北京的炎黄子孙。

他虽身材不算魁梧，而且已届72岁高龄，满头稠密的银发，衬着紫红色的上衣，炯炯的眼神，爽朗的谈吐，使人觉得他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他，就是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专业画家、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侨联主席孙瑛（孙大石）。

做为高唐同乡，加上我们又是文化艺术界的同行，谈艺术、讲经历、论时局，孙先生总是慷慨陈词，无拘无束、无遮无拦。我们虽是初识，却象旧友重逢。

—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孙瑛出生在山东高唐城西三十

里铺河涯孙庄一户普通的人家。淳朴的乡俗民风，传统的民族文化以及贫困艰苦的农家生活，赋予他顽强好胜的性格，落后简陋的环境，使他从小就体弱多病，父母为了吉祥和寄托美好的祝愿，给他起名叫琿，也就是打麦场上的石碾。父母盼望他象这石碾一样坚实，这便是他的别号“大石”的由来。他在本村读了两年私塾之后，便去邻村曲庄上小学。聪慧的天赋和难于解释的原因，自幼他就喜欢写写画画，地上、墙上、门上，大凡他所到之处，总要画点什么，同学们的课本封面上也总喜欢让他画点花呀，草呀，装饰美化一番。

本来不太富裕的孙家，在他九岁时，母亲去世，生活的困难，家庭的不幸，逼使他辍学了。转眼混到十四岁，一为糊口，二来想为孩子找个出路，父亲便送他到夏津城里当了学徒。这是一家小作坊，字号名称到挺气派，叫“凤祥镀金局”，是专门跟那些女人们用的首饰和器物打交道的，这虽然与孙琿的绘画爱好不搭帮，好不容易挨到了春节，过了年，他宁肯在家种地，也不愿再去了。

家里有了继母，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总是碍手碍脚的，这里有句俗话：“有了后娘有后爷”，虽是亲生父亲，也主不得过分疼爱他了。总在家里呆着也不是法子，于是，就在他十四时，父亲又送他到夏津县一家画工作坊学徒。在这里他学的是画皮箱，实际上，高唐、夏津一带的皮箱，是在木箱上绘制漆画，这对少年孙琿来说，真是有了用武之地，他有了施展绘画才能的机会。画皮箱画，基本上是拿了师傅祖传了几代的画稿（师傅叫它“粉本”）依样画葫芦。可孙琿却不那么本分，总不愿墨守成规。他常常挑剔师傅的范本上的毛病，什么关公握刀的姿势不对啦，马的屁股不象啦，

张飞的帽戴的不合适啦……开始，师傅轻率地搪塞他说：“几辈子都是这样画下来的，照着画吧！”可后来，见他说的对，画稿也改得好，就越发器重他了。

二

1937年家乡闹水灾，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遍地燃起抗日烽火。学画也学不成了，只好回了家。没了亲生母亲，生活冷落，他曾一度跑到舅舅家去，也同样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生活的磨难更激发了他满腔热情，当时村里正抽壮丁，有钱人家拿钱，穷人家出人，一怒之下，孙瑛毅然当了壮丁。

当时他加入的是什么部队，恐怕他是无暇顾及的，反正他只知道通过当壮丁当了兵。他的念头只有一个：当不了官他不回家，这很能使人想起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好兵”的名言。后来，他才知道，他加入的是正在南撤的东北军刘多荃部，系国民党49军327旅。

孙瑛随着这支南撤的部队，先到泰安，后到苏皖。每到一地，虽狼狈不堪，还要向老百姓抢吃抢喝。几次战斗下来，孙瑛由一个壮丁熬成了老兵，而且上司相中了他写的一笔好字，便让他当班长。从小他就没管过别人，怕干不了，最后封了他个下士，在连部里帮忙，成了文书的助手。连里发饷的花名册子什么的，都由他抄写。

有一次，营的书记官到连里来，看到他写的花名册，暗中欣赏他的毛笔字，要调他到营部去。孙瑛想，营部比连部高一级，机会难得，就背着连长偷偷去了营部。后来回连里拿

东西被连长发现，立刻集合全连人员，以开小差的罪名打了他一顿。

孙瑛到了营部，提为中士，把他安排在军需室，专门负责发粮发饷，他保持着农家那传统的朴实和诚实，没多久就升为营部上尉军需。

然而，孙瑛的天赋和兴趣并不在仕途，自幼的绘画爱好，使他与笔墨结下不解之缘，枪林弹雨的戎马生涯，不仅没有挫伤他对绘画的追求，而且更为他的爱好开辟了广阔的视野。他没有机会进入专门的艺术院校，更不可能成为某某名家的入室弟子。然而，他靠了一颗对艺术挚著的诚心，借助于辗转驰骋的亲身经历，饱览祖国山河壮丽的风光，加上对生活的精密观察和孜孜不倦的顽强探索精神，他画下数以万计的速写，为他后来成为职业画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5年随军进驻汉口时，孙瑛得知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的行踪，便当即登门拜访，虚心求教画理。丰子恺先生对这样一位有志好学的青年也十分喜爱，便诚恳地辅导勉励，遂成忘年之交。在他几年绘画道路上，曾经得益于丰先生教诲，通过漫画的创作，锻炼和提高了他的概括能力和表现力。

1949年，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孙瑛随军去了台湾。远离祖国大陆，心系家乡的父老乡亲，眷恋祖国的壮丽风光，身在军旅，心系乡情。他曾被加上“思想左倾”的罪名送进“反共先锋营”管训了一年多。出来之后，虽复了职，却受到了百般歧视，精神上忍受着极大痛苦。孙瑛的全部情愫和追求，始终寄托在绘画艺术上了。那时，生活非常清苦，早上天没亮，他就骑上自行车，揣上两个馒头到郊外写生去

了。公余假日，一去就是一整天，很晚才回来，接着就是整理画稿。这几年的时间，在大量的素描、速写的基础上，开始了他独辟蹊径的美术创作生涯，成为台湾行伍之中才艺卓著的画家。

三

长期的艺术积累，艰辛的创作道路，孜孜不倦的追求，终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孙瑛的美术作品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956年，他的作品首次入选台湾全省美展，十几年的理想变为现实。孙瑛的水彩画，由此显赫于台湾宝岛，并扬名于日本、美国。次年，又联合美术界名流发起组织四海画会。1958年在高雄市举办第一次个人展览轰动台湾，次年，便结束了廿余年的戎马生涯，从事美术创作和教育事业。由此，孙瑛便有了充足的时间，集中精力，把二十余年的积累，表现于他的绘画艺术，使他成为精品、佳品送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画家。只需摘抄一下那些岁月展览记录，便可了解他成就的一斑了：

1961年，高雄第二次个人展，参加在台北的中国青年联展。

1962年，参加香港第二届国际沙龙美展。

1963年，参加全国水彩画展。

1964年，参加全国现代水墨画展，参加马来西亚国际美展。

1965年，参加中日美术交换展。

1966年，台北第三次个展。

1967年，日本东京个展，获中国画学会最优画家金爵奖。

1968年，同刘国松等筹组“中国现代水墨画学会”，当选为副会长，兼执行主任委员。

1969年，中国现代水墨画学会会员作品第一届展览。

1970年，日本东京第二次个展

台北个展

台北——香港中国现代水墨画大展

参加历年国内获奖画家联展

纽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参加中国艺术展

1971年，参加西德汉堡中国现代水墨画展

东京第三次个展。

1972年，参加中国现代水墨画十人美国巡回展

1973年，参加美国威斯康辛州中国现代水墨画展

应邀参加中国现代艺术欧州巡回展。

日本东京，中日美术交换展。

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画展，频繁的美术理论研讨活动，紧锣密鼓，令人目不暇接的艺术成就及影响，表现了孙瑛充沛的精力，超出常人的艺术才华和社会活动能力。孙瑛的成就，曾经轰动过台湾，轰动过东京，而且远及欧美，这不能不使我们山东，我们高唐的同乡，引为自豪，引为骄傲。

孙瑛的绘画成就，被誉为“中日美术文化交流使臣”的日华美术交友会理事长柴原雪发现，给予很高评价和称赞，并积极筹划和帮助，使孙瑛的个人画展得以顺利而连续三次在日展出，引起日本艺术界和评论界的注目。几乎所有著名评论家都前去参观，柴原雪评价孙瑛的画展说，“盛况超出我的

想象，为筹办孙瑛的个展，我真的搞得精疲力尽，但看到那热烈的情况，我一点也不觉累”。

孙瑛以画水彩成名，早在1959年就明确提出：经多年之体认，深悟绘画是人类感情思想和类性的具体表现。除应尽情表现个性之外，则必具民族性和时代性，因而毅然放弃西画工具，重新采用毛笔、宣纸、水墨作画，对国画做更深入的钻研……成为个人绘画一大转折点。

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田近宪三称他为“放出异彩的天才”，是令人瞠目和惊奇的，一方面他吸取了西欧水彩的感觉，将光的变幻融在墨色的变化中，使其有更进一层的奔放与生发；同时山岳河川的豪迈，正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神所在，而他的作品，就将这种描写大自然的磅礴气象，以现代化的感触更深一层的融化在他的作品之中。称他为“集中西之精华，合二为一，是中西绘画高度的合流”。

《东京展览》称誉“孙瑛是水墨画的鬼才，其点、线、阴、阳错综的画面构成，确有其新的创意，用笔激动，线条灵活，水墨淡彩驱使，有书道力的展示”。

据说，日本评论界发表论著是十分严谨的，孙瑛在日本受到众多评论家的高度赞誉，绝无人事上的关系，他不懂日语，就连田近宪三写了那样有份量的文章，孙瑛还未曾见过面，孙瑛和当年齐白石一样是全靠真功实力的作品，换取他的声誉和地位的。

四

1974年，孙瑛应美国二十一世纪画廊及纽约圣若望大学

之邀，赴美国讲学，举办展览。根据美国法令，外国移民中的三种人（医生、科学家、艺术家）可优先获得居住权，孙瑛在朋友们的挽留便下便在旧金山定居了。

以探讨和发展中国水墨画为己任的孙瑛，到美国定居，成了那里的职业画家，要靠卖画维持生活。而美国人对以线条和泼墨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中国画并不甚理解。因此，他不得不重新操起搁下多年的西画工具，以出售水彩画来补贴家用。虽然水彩画使他在画坛上一举成名，并曾获取过金爵奖，但要通过画廊卖画，克扣得厉害，他们以300——450美元收购一幅水彩画，加框后，以十倍的价格售出。孙瑛后来被迫脱离画廊，独立经营卖画。他用水彩在街头写生，边画边卖，无论是风景名胜，还是街道风景，都是他写生作画的好素材。开始他自己也没料到，往往水彩画才画到一半，便有人向他求购了，有时要画的人多，还要向孙瑛预付订金，排队取画。

然而，做为一个炎黄子孙，他痴心追求的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中国画通称为国画。身在异域他乡，硬是为生活所迫放弃他崇高的追求，而勉强自己去作水彩画，使他的生活和内心失去平衡。思乡之情与日聚增，他曾深情地说：“我想念祖国，想念家乡，想得太苦了。”“我是中国人，在美国国旗下举手宣誓，我做不出来”。这便是旅居海外当代艺术家长期埋藏心底的肺腑之言。

孙瑛苦苦寻觅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绘画精神和时代气息。他说：“我是现代的中国人，受的是中国的教养。我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我对此负有责任，所以，我要创作现代的中国画”。

在他定居美国的八年中，他订了三份政治态度不同的报纸，通过比较分析了解大陆的情况。“四人帮”垮台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改革开放的加快发展，给他这个飘零异国的游子带来从未有过的兴奋和鼓舞。

五

1982年7月，孙瑛携夫人谢从玉以回国探亲为名回祖国来了。

他原想，我们都老了，在美国，虽然有一儿一女，他们都已独立生活，但老俩口都不懂英语，又不能自己开车。终生追求的是中国水墨画这门艺术。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祖国在召唤他，这里有他的生命之根，有他们艺术之根，只要能回到祖国，哪怕在北京郊区盖间小屋，能够使他夫妇共度晚年，就心满意足了。

孙瑛回国来了，孙瑛回山东济南来了，孙瑛要回生他养他的聊城地区的高唐县来了。他夫妇从济南到聊城那天，聊城派专人乘车到聊城边界——黄河大桥迎接。在聊城，地区的领导，在高唐，县里的领导，都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接待他们，陪伴他们，使他真正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家乡亲人的诚挚和热情，使得他激动不已。

一般长期旅居国外的中国人，按正常手续应当是先递上申请，经过审查，才能办理手续。当时他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打听了一下回来定居要找什么单位，人家告诉他要找对台办公室，于是他就找到了北京市的对台办公室。工作人员

从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简介，了解了他的成就及影响，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中共中央统战部杨静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他，著名书画家吴作人、李可染等出席做陪，很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党和政府给予他如此优厚的待遇，这样隆重地欢迎他归来，是他始料未及的。

美术界著名画家吴作人、李可染，对孙瑛的回国都十分欢迎，并给予很大关怀。孙瑛将定居北京的书斋取名“落叶轩”，悬于他画室的扁额，便是李可染先生的手迹。娄师白先生曾以《创造者有血有肉的现代中国绘画——孙瑛先生老当益壮，每日画笔不辍》为题，发表论文，对孙瑛的绘画成就及艺术理论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

谈到与著名画家的交往，最令人感动的要算是与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的相识了。那是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孙瑛首次回国探亲，在北京见到了神往已久的李苦禅先生。

孙瑛是高唐城西河涯孙庄人，李苦禅是高唐城西李奇庄人。两村相距只有数里之遥，同是古老的马颊河畔的村落。孙瑛虽客身国外，对于李苦禅的艺术成就，对他的人品、画品早已倾慕，要按年龄，李苦禅长他近三十岁，是应做为长辈看待的。当孙瑛前往李苦禅住所拜见时，一进门就跪倒在李老跟前，漂泊异国他乡数十年，对家乡的怀念、对父老乡亲的眷眷深情，对自己家乡出了这等伟大的画家自豪和难以遏止的激情……都在李苦禅眼前的跪拜之中奔涌出来了。

两位声誉画坛的画家，虽年龄、素养不同，成才的道路和个人的艺术风格不同，但他们却都经历过艰难的磨砺，都

有着人生和艺术的苦辣酸甜的体验。两人相见，一个是年届花甲，一个是年过八旬，却竟是初识，又象是亲人阔别重逢，谈及家乡往事，涉世艰辛，使得李苦禅老泪纵横，也让孙瑛哽咽难言，

孙瑛回国后，与苦老交往日密，常携带作品请他指教。一次苦老见到他的《江帆风顺》图，便欣然在画上题写：师自然即师造化。上帝造万物，画者亦能造万物，画自家画，即开辟自家蹊径也。孙瑛弟携近作来观，即题数语以勉之。八六岁苦禅。

孙瑛回到祖国怀抱，多年宿愿变成现实，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热情，使他不知疲倦地投入祖国的名山胜水之中，精心创作着一件件艺术佳品。他现为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华侨联谊会主席。祖国和人民给了他这么多的荣誉，他享受着国内知识界、艺术界的最高待遇，出门有公车接送，出差有优裕的条件，孙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踏实，这样舒心，这样的热情奔放。这一切，便是祖国对归来赤子的报应和赐予。

六

孙瑛回国是海外赤子对祖国眷恋的表达，是弘扬祖国传统艺术的勇敢实践，而决不是一片飘零的落叶，归于乡土化做泥土了事。他回国并不企望借一技之长获取钱财和荣誉。他回国十年，从不轻易将画出售。他的艺术实践十分严谨，从不轻易作画。回国后，他的足迹踏遍了黑龙江、新疆、山东、湖北、江西、四川、广西、海南、安徽、天津等

省市的名山大川，城镇乡村。然后，集数十年绘画经验闭门创作，精心研究，决心拿出独具个人特色的佳品，而决不只顾一时的热闹火暴。他曾说：“假如说我还有些抱负的话，那就是要争千秋不争一时！”他在绘画艺术实践的同时，从未丝毫放松过绘画理论的研究。六、七十年代，孙瑛在台湾曾是激扬文字的骁将，他那《中国绘画的现代观》、《论水墨画之创作》、《手眼俱到，再表思想》等论著，都是极有见地、有份量，令画坛折服的力作。回国后，为了更高层次的突破，他虽没有急于发表文章，但他一直在默默地探索着、积累着。在孙瑛的画室“思禅堂”里，你可见到一册《画室随想录》，每一页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蝇头小楷，这是他在作画读画时的偶有所得，随手记下的。现在已经积累了十余本了，孙瑛的艺术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了。

综览孙瑛的艺术理论，见解精辟颇有建树。如果将他的成就汇集成书，将会写成一部很有份量的论著，限于篇幅，俯拾数语，愿能提供了解这位画家的一些线索。

△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艺术品的可贵性、价值性亦就在此。倘其人格扫地，毫无修养，自不能产生伟大感人的传世之作。

△欣赏艺术品，没有什么国际性，而创造艺术品，则必须具有强烈的国际性。我是现代中国人，受到中国的教养，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历史，我有中国人的血统和气质，所以要创作现代的中国绘画。

△画乃吾人灵性之具体表现，宁欠功力，勿缺精神。

△受古人形式之束缚则死，得古人精神之启示则活；受自然形色束缚则俗，得自然气象之感受则雅。

△“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

△古人素讲笔气、墨气，如不运用肌肉将笔墨直接传达到画面，那将失去中国绘画的传统精神。

△中国画是以“阴阳谓道”之理，循自然之规律，作者藉宇宙万物之形色，通过笔墨媒介，来抒发内在之情绪与意志。

孙瑛对于绘画理论的精辟见解，当然不仅以上几点，诸如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正确发展途径，吸收外来艺术的精华以及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等，每逢论及，总是慷慨陈词、声情并重。这位年逾古稀为绘画事业奋斗了数十年的老画家，言谈举止总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七

孙瑛的爱国热情，孙瑛的艺术成就，孙瑛那老当益壮，笔耕不辍的奋斗精神，给家乡高唐县的父老乡亲带来了喜悦和鼓舞，高唐县不仅是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家乡，而且也是著名画家孙瑛的家乡；家乡因为有了他们而感到自豪，因为有了他们而名声大振，因为有了他们景色更加壮丽。

高唐县委、县政府，对孙瑛的归来表示了极大热情。尽管孙瑛没有积蓄更多的钱财，他回国后曾慷慨捐资残疾人和宋庆龄儿童基金会，又曾捐资支援家乡购置送电设备。在国内美术界不少人出售作品收聚钱财的风气日盛之时，孙瑛却固守着严谨的信条，绝不轻易涂抹，更不轻易卖画。尽管高唐经济尚欠发达，财政状况不怎么宽裕，但家乡政府为了彪炳孙瑛的成就，激励人们学习他的精神，在碧波荡漾的北湖岸畔，兴建起一座风格别致的仿古建筑群体，古朴庄重，青瓦

白墙，院内画廊、展厅、客厅，布局得体，是一处幽静、舒适、既能从事绘画创作，又能进行较大规模展览的理想场所。这便是以孙瑛先生别号命名的“大石美术馆”，为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高唐县书画院已迁来办公。这里不仅是孙先生回乡从事绘画活动的场所，而且已经成为高唐县乃至鲁西开展美术活动的基地。

朱昌祚为民请命

石业华

清军入关后，满清贵族大肆圈占土地。广大汉族人民倾家荡产，四处流浪。一些贵族为了霸占良田沃土，还利用权势更换所圈占土地，这对汉族人民无疑雪上加霜。面对成千上万的汉民无以为生，一些正直的汉族大臣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朱昌祚就是这些大臣中最著名的一位。

朱昌祚（？——1670）字云门，高唐朱楼人。8岁时，随父母移居历城县。年12从军北上，被编入汉军镶白旗。昌祚自幼聪颖异常，精通满汉语，被选为宗人府启心郎（翻译），启心郎属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地位非常重要。顺治十八年（1661），昌祚外出任浙江巡抚。抵任后，浙江全省遇特大旱灾，昌祚一面捐金煮粥以活饥民，一面疏请赈恤，浙民赖以活命。当时海寇尚未肃清，朝廷有旨令濒海居民迁移内地，昌祚上疏要求酌拨荒田，让内迁居民开垦为生，待三年土地成熟后再照例起科，其旧居原址田亩丁粮，请予免除。所奏均得实行。当时，陕西巡抚扈申忠条奏军民应该一体听徭，朝廷下令各省议行。昌祚又上疏说：“浙江省各卫所均有运粮之责，其闲丁每年也各赋丁银，认为贴造粮船之费，与陕西省卫所运粮者情况不同，难以再让百姓加倍服役”。于是此事遂放置。昌祚在浙江四年，勤政爱民，不怕犯

颜，频频上疏减轻当地百姓负担，作为封建社会的封疆大吏，难能可贵。康熙三年（1664），昌祚以政绩显著被擢为福建总督，因老母病逝而未到任。

康熙五年（1666），昌祚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在总督中，直隶总督地位最为重要。他一上任就考虑怎样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是年冬，他上疏说：“直隶总督经制额兵，旧驻河间；提标额兵，旧住大名。现在总督驻扎大名，提督改驻河间。若令两标兵彼此调移恐怕携家带口，致使连累百姓。要求免调兵丁，只更换统辖之将之便”。

康熙初年，皇帝幼小，议政大臣鳌拜擅权独断，骄横跋扈，凡忤己意者辄置之死地，朝廷内外无不闻之丧胆。如内大臣费扬古与鳌拜有隙，其子侍卫倭赫不礼敬鳌拜，鳌拜即以倭赫擅骑御马、擅用御弓等罪名，将倭赫论斩，罪及其父费扬古。鳌拜与苏克萨哈共同辅政，因议事不合，矛盾日深。鳌拜即以“怨望”、“有异志”等名，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族诛。其残暴狠毒如此。

康熙五年（1666）正月，鳌拜以本旗镶黄旗的土地，因以前被多尔袞正白旗所占，故决心更换。于是命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主持圈换土地。昌祚经实地勘察，发现自圈地令一传，京东各州县数百里寸土不耕，旗民与百姓“失业者数十万人”。成千上万的士民上呈，请求停止圈地，旗民也不愿圈换。于是，他与苏纳海、王登联一起上疏，恳求停止圈换土地。他在《请停止圈地疏》中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详细分析了应停止圈地的原因：一、现在行圈换地亩，皆振振有词。以腴易瘠与以瘠易瘠者，皆不愿有此举。虽勉强拔给，难免日后申诉，后果不堪

设想。二、两旗分得旧处庄地，20年来相安已久，且无不有父母坟墓在焉。一旦更易，不能相互易徙，必守候日久，正值隆冬，穷苦者冷冻可悯。三、从士民环衙门哀泣看，有谓被圈之地家，即令他往，无处投奔者；有谓时值隆冬，扶老携幼，远徙他乡，恐地方疑为逃人，不肯收容者；有谓祖宗骸骨，父母丘垄，不忍抛弃者等等，凡此不一而足。四、遍蓟州及遵化等应换之地，一闻圈地，自本年秋收之后，周围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明年夏尽，何以度冬。五、京东各州县合计旗民与百姓失业者数十万人，田地荒芜，无以谋生，岂无铤而走险而起哗变者？

朱昌祚详尽地分析了圈地所造成的危害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关心百姓疾苦，为民作主的可贵感情。他深知鳌拜为人，也知道忤其意的后果将意味着什么，却为民请命，据理力争，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坚定地说：“地方出乱子，这关系到为臣的责任，不敢因畏忌而超出本分，不能对此置若罔闻”。鳌拜闻奏大怒，矫旨将朱昌祚及同时上疏的苏纳海、王登联一同处以绞刑。直隶士民闻其死，哭声恸天地，如丧妣妣。时人在《朱昌祚案》一文中感叹云：“昌祚、登联为民请命，死非其罪，士类丧气”。

康熙八年(1669)，鳌拜伏诛。康熙帝特谕吏部曰：“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于拔换地亩时，见旗、民交困，有地方之责，其疏奏闻。鳌拜非其职掌，妄行干预，不按律文，诬陷至死，深为可悯！其予昭雪，以示仁恩”。并复昌祚原职，谥“勤愍”，荫子朱绂入监读书，授督捕理事官。后官至大理寺卿。

朱昌祚为民请命而死，作为封建官吏，其品德难能可

贵，值得后人怀念。因昌祚一家移居历城县，他的后代也一直居住历城，故其生平事迹乡人鲜知之，故撰此文，以示纪念。

本文参考书目主要有：

- ①《清史列传·朱昌祚传》
- ②《山东通志·朱昌祚传》（宣统版）
- ③《清代野史大观·朱昌祚案》
- ④王士禛《池北偶谈》
- ⑤《国朝先正事略》

（1992、10、于胶州市）

武进士轶事

楊 青 先

武进士姓李名慕堂字振楷，咸丰八年（1858）出生在高唐县赵庄乡太平庄。慕堂身材魁梧（身高六尺多），腰圆膀粗。少时体大力大饭量大。有一年正月初六上午到赵庄走姥姥家，姥姥对他说：“饿了到巴斗里拿馍吃”。到中午做饭时，他已将馍吃净，姥姥说：“我这是预备过年待客到十五的，看来你平时十分亏肚子”。十四岁那年的一天，吃了午饭，父亲叫他去随礼，他到席上说：“咱们吃一斤馍馍就一口菜，谁也不能破例”。别人见他肥头胖耳似半截塔，望而生畏，都溜到别的席上去了，他把这八个人的饭菜吃了个精光。一次他给在地里干活的九个人送饭，送到地北头，人们在地南头叫他挑过来，他说：“你们过来吃”，各不相让，他赌气独自把饭吃光，挑着空篮空罐回家了。干活的只好另派人到家要饭。五、六十年前经常听到有关老进士的趣闻。

慕堂家庭世代习武，父辈出过几个武秀才。时，中国领土遭到空前劫掠，外国侵略者争相加紧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侵略，昏庸的满清政府又勾结敌人袭击太平军，造成全国混乱民不聊生。其伯父李奉昌主动办武校培养保家卫国的人才，并设有武场，教武童练基本功，后来辟出跑马道，栽上箭靶，师徒爷们日夜操练。他们还打制刀枪剑戟各种兵

器，有大（360斤）、中（240斤）、小（120斤）几个制石。慕堂习武务专精益求精，拿360斤制石跑园场，耍120斤大刀若草秸，由马步三箭到马步五箭，直练到马步七箭射击水平。己卯科（1879年）在济南中举。癸未科（1883年光绪九年）进京会试，行前其寡母泪流满面地说：当前兵荒马乱，你是我唯一指望，走了叫老身怎么活？千挽留，万祈祷，给他思想上增加了压力。殿试时，偶尔想起母亲的泪眼，一走神，刀失手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急中生智，一脚踢起失手的120斤大刀，燕子衔泥般一啄即起，又在手中飞舞了。当时观众齐声叫“好！”主考官问他：“用的什么招”？他说：“金钩钓鱼”。从而被点中进士，赠给黄马褂及各种执事，御批“河南某某县知县”。他百般请求，说明老母多病不能远离。当时有纨绔子弟出钱顶任，上面见于此就辗转复批他“回家孝母”。

他老实忠厚不会钻营，一直在家为农，兼带徒练武。本地历任知县都高看他一眼。他平易近人，高宽额头，微张双唇，颇有宽厚仁德的风度，在村里做了些息事宁人的好事，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乡民王长庚、徐万山、李生堂等穷苦百姓都是他的好友，跟他学武术，亲如弟兄。他们常说：“慕堂哥个子大，架子不大，他教武术有耐心，我们学武术有决心，他气度不凡，贼人不敢犯我村；他认真理好管事，我村不起诉讼事。”

岳庄有个张林子，打家劫舍，周围村庄不得安宁。扛着铡刀骂平打渔李庄，骂着走街串巷无人敢挡。一日又来太平庄，声言：“骂下太平庄就能在城西称霸”。王长庚一脚踢飞了张林子的铡刀，打倒张林子，砸断其脚后跟，煞了张的

威风。岳李庄李化远恨透了张林子，当即说：“他会老牛大憋气，只要不死，四乡还是鸡犬不宁”。激起王长庚等人的无名火，抡起家伙就打，准备一气打死张林子，除掉这个癞皮狗，李慕堂来了说：“他有罪自有官府治，老百姓打死人就犯法了，我们应当劝教一番放了他，或许他能改了。”李慕堂送给张林子一些养伤钱，令人送他回家。张林子伤好以后不知是服了还是怕了，一去没有回头，四乡也平安了。乡民们说：“进士武术高威信高，地方治安有保障”。

太平庄刘振昌是有名的刀笔，常有人找他写状子起诉。李慕堂就适时的教育刘和起诉人说：“值此乱世之秋，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诉讼、诉讼，这是插在农民头上的一把刀子。自这里缺吃少穿，再加上花钱、罚钱，那真比脖子里系上绳子还难受。再说打官司有赢有输，世世代代结成仇家，冤冤相报没有完。如果给刀笔送了昧心钱、造孽钱，他也会忐忑不安做恶梦的，做为我们老百姓还是好打好散，合好了好。让一分心平气和，退一步天高地阔。你们想想我为啥这样劝。”经慕堂的劝说，双方都回心转意，刘也尽力不写诉状帮着劝说。此后诉讼、起哄的由少到无，一时太平庄非常太平。

1928年武进士李慕堂谢世。他带徒练武常要（用）的一口大刀留在村中作为纪念，笔者弱冠时（1948年）曾见过，并用双手努力数次未拿动，乡民们说“用老秤秤一百四十斤”。六十余年过去了，老人们还在向后生们传颂有关武进士的轶事，说得生动，听者佩服。

刘清如先生

于海舰

刘清如，字穆斋，1873年出生于高唐县三十里铺乡杓子刘村，清代廪生，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安师范学堂及北京政法学堂特别科。民国二年十一月任山东临朐县知事，民国三年八月卸任。后历任湖北荆南道署第一科科长，武汉军警督察处执法主任，京兆尹公署秘书长兼京兆警备司令执法科长，并历任郛城、临沂、临清、沾化等县承审员，清平、文登、平原、武城等县法院检察官。离政后在济南曾以律师为业，1935年赴馆陶修县志，晚年自济南归居乡里。高唐解放后，地方党和政府非常关怀这位正直的老人，多次邀请他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1957年刘清如先生在杓子刘村逝世，终年84岁。

刘清如任职几十年，办案谨慎、细致，执法刚直不阿，爱民如子，深受民众爱戴，民间曾有“刘青天”之美称。

民国元年，国民政府令各县署改科，裁旧制中的班役，设行政警察。时临朐县的班役骄横异常，肆意横行乡里，欺压良民百姓，就连知县也招惹不得，班役依旧未裁。民国二年，刘清如始任临朐县知事，上任后毅然照国民政府令变更县署体制。班役们看到新知县要触犯自己的利益，就相约同时散去，想用这种手段对付刘知县。面对这种局面，他泰然处之，立即调入警察供县署调派，粉碎了班役们的阴谋。班

役们并不甘心失败，时刻寻机和县署对抗。当时临胸有一姓丛的残废绅士，曾是军阀项成的部下，班役们为了扩大他们的旧势力，就千方百计推举这个人入县署任职。刘清如识破他们的诡计，决定借机彻底制服班役。一天，刘清如升堂回理此事，班役们一个个被唤到堂上，刘清如正襟危坐，面带怒色，他们知道事不好，都吓得跪在阶下，屏息悚惧，不敢仰视。刘清如拍案历数他们的罪行，声震瓦屋，气势夺人。他们的蛮横之气一扫而光，全都叩头请罪。刘清如当即将骄横之徒逐出县署，留用正直者改为行政警察。使临胸县顺利完成了县署变革。

刘清如一生注重民族文化教育。他青年时目睹民众愚昧落后，立志从事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他曾入保定师范特别班学习，任临胸县知事时，积极倡学，经常去新学堂视学，赞扬奖励勤奋好学的学生，在他任职期内，临胸小学几乎普及。晚年回家乡杓子刘村定居后，仍不忘家乡教育事业，教村民识文写字，还在本村小学校里亲自授课一年。

清如先生办案之余常博览群书，晚年更是致力于学术研究，以哲理见长，常有精辟见解。1935年馆陶县修地方志，闻清如先生学识渊博，即函约他任主纂，他欣然赴任，凭深厚的文字功力、丰富的生活阅历、求实的治学态度、流畅的文笔日夜赶修，在短期内完成了高质量的《馆陶县志》志稿（编者注：从事民国志修纂的高唐人还有周之桢，主纂《茌平县志》志稿；张修一，协助王静一主纂《高唐县志》志稿），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清如一生追求进步，他早年从政，凭才学和为人正直，想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可是在旧社会腐败的官场

中，他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他不愿同欺压百姓的官吏同流合污，屡遭排斥，身处有才难施、有理难平的环境中，他愤而辞去官职。为求保障黎民百姓的合法权益，他以律师为业，旧中国的律师形同虚设，那能容他为民申诉，同样四处碰壁。“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因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国土沦丧，异常气愤，认识到共产党才是进步阶级的代表，才是中国的希望，他鼓励支持子女从事革命工作，并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闲时常写诗作文，抒发爱国情思，高唐解放后，他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协助政府工作，就高唐政法、教育问题提出宝贵建议，晚年常拖着病体从杓子刘村赶赴县城议政。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生活上均给予他照顾，他常说：“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好啊！”

综观清如先生一生，不求高官厚禄，不计名利得失，辅政抑邪，洁身自爱，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作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从政多年的旧官吏，能较多地接触普通百姓，关心民众疾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周化南事略

周善宏 王 琴

周化南，号阴棠，又名周廷臣，1881年2月出生在高唐姜店乡范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一生热心教育，追求进步，在城南群众中颇有声望，他是高唐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常委兼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县人民政府委员。他在晚年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成为高唐各界人士的典范之一。

一、学优兴教

周先生七岁那年，父亲周月桂送他在本村读私塾，他聪颖好学，很快熟背《三字经》、《百家姓》等书，后来他到县城学校苦读十四年，1902年以州试案首的成绩考入山东高等农业学校，本该晋升秀才，但清政府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1907年他毕业后即选择了教书育人之路，去齐河县伦镇小学当了一名教书先生。1908年济南成立养蚕业训练班，他接受这一新生事物，积极赴济参加训练，一年后带着省府训令回高唐筹办蚕业学校，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当时没有校址，教职员工需招聘，学生需动员，都是他亲自做工作疏通。宣统二年（1910年）一月，蚕业学校正式成立，校名为乙种蚕业学校，起初只开设预科（注：为正科学校培养新生的

机构，附设在高等学校里，也有单独设立的），民国后改为正科，周先生既是校长又是教员，在管理学校、教育学生的同时，还要为校舍之事多方奔走。经过努力，1919年蚕校从文庙小学内迁移到东关鸣山书院，高唐历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乙种蚕业学校终于有了一处独立的校址。1928年蚕业学校改为县立职业学校。这期间，周先生与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严谨治学，培养了一批人才。

1923年，周先生曾应聘任建设局技术员，他看到当时高唐人民的贫困状况及高唐教育事业的落后局面，于1924年起又先后在县立第一高小、三清观女校等学校任教多年，他一生独立或与他人联合创办了多所学校，为高唐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二、思想开明

周先生思想开明，主张进步，在高唐城南一带他第一个剪辫子，对父亲和叔父的训斥、邻里的讥笑他都置若罔闻，父亲因为他“不安分”临终时还在念叨：“挂着小三（周化南排行老三）”，“剃了辫子怎么得了！”他还积极动员青少年进学堂，倡导妇女放足、念书，劝女儿和侄女不缠脚，招来叔婶反对，仍不放弃主张。当土匪在高唐猖獗时，高唐县伪大队长李长兴通过周善荣动员周先生去县大队代笔，周先生一口拒绝，后来李长兴的人传话说：“周化南对咱躲得真远，给他差事都不干！”周先生在蚕业学校任校长期间，适逢他的老师（济南蚕校之教习）来高唐任县长，他们之间旧谊很深，关系密切，该县长发现周先生虽然家贫如洗，从教

任校长多年，不以工作之便收受不义之财，保持两袖清风、高风亮节的品德，该县长深有感触地说：“阴棠呵！你真得穷一辈子了”。此事后被人们传为佳话。1937年抗战爆发，高唐县城失守，秩序混乱，土匪、杂团四起，周先生看到和听到的都是日寇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滔天罪行，他无法安心教学，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奔了在河南保安第二团任团长的好友白智棠（白庄人），在白的手下任文书，这一年他已56岁，此后十几年都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任职服务。1949年，周先生在南京学习农林垦植未结业南京解放，学校解散。周先生于1950年秋回到高唐，当他看到解放后的家乡社会秩序井然，翻身农民安居乐业，殊非往昔，深深惋惜离家走过的这段弯路，他决心在晚年用实际行动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家乡建设尽力。

三、 热 情 宣 传

周先生回到家乡那年已近七十岁，为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而心急。他说：“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坐吃坐穿算什么呢？”为此他主动干一些有益群众的事。1951年，他当选为高唐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读书看报听广播，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他不顾年老体弱，步行五六里路去附近村庄做宣传工作，联系有威望的老人于1953年冬在他的住处成立了老人学习班，每隔十日集合一次，每次多则十几人，少则四、五人，讨论党的方针政策，畅谈国际国内大好形势，增强热爱祖国思想，强调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1955年8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的农民不理解，甚至

有一些抵触情绪，周先生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他说：“国民党和伪杂时期有多少人挨饿，1942年闹灾荒不知饿死多少百姓，咱们能忘吗？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们不会走错道，不会害咱，现国家在建设时期，好比咱盖房，不能没一点困难，咱们应想方设法支援国家建设。”他亲自到马刘庄、柳庄等村户家发动群众卖余粮，村民王德荣有顾虑，经他说服，将3600斤余粮卖给了国家。在“镇反”运动中，他宣传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他说：“如果不把这些人镇压了，大家就不能过安稳日子”。他学习毛主席关于1956年农业合作化规划的报告后，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服他的两个儿子及早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62年群众在经历了特大自然灾害后，生活极为困难，加之蒋匪窜犯大陆，中印边境发生磨擦，群众思想不稳，他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就不行，现在想窜犯大陆，那是空想，印度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谁也不能抹煞真理，违背马列主义而攻击中国必然失败。他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说：“党的政策对每一个公民都一视同仁，只要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有前途。”他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和移风易俗的新思想。1956年他老伴去世，他响应党的号召，要儿女从简办丧事，并写诗以慰悲伤：

“六十年艰苦备尝，伴随久能不悲伤？
只因我有爱国责，应化悲痛为力量。
岁过古稀烛已残，艰苦岁月已走完。
国家事业实为重，强压悲痛度晚年。”

四、义务为民

1951年，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各村成立了识字班、夜校，年过古稀的周化南先生不顾龙钟之苦，主动担任义务教员，他针对村民对学文化的意义认识不够，特别是对妇女上学读书反感的情况，上门劝说，使范庄村三十多名目不识丁的农民达到了能看书看报的水平。他的孙女德芹上到小学三年级出阁，男方坚决不同意德芹继续上学，德芹在周先生鼓励帮助下，起早睡晚坚持自学，1952年考入高唐师范，走上从教为国的岗位。村民周瑞生之女小兰因为无钱交学费退学，周化南先生就给周家送去仅有的五元钱使小兰得以复学。1963年，周先生负责筹办范庄小学，几经周折，校舍仍无着落，他毅然将自己所住的两间北屋让出当教室，使学童按时入校读书。为解决村民们看病难的困难，他买来医药书学医，为村民们看些常见病，经批准他参加了医药联合会，儿子周善宏见他年老体弱，不愿他这样劳累操心，他却说：“我虽年老心尚壮，应该把所会的和可能办到的都贡献给人民，尽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1956年，高级合作社轧棉花要借用他侄子的闲房，侄子思想不通，他劝侄子说：“别说是闲着，即便不闲，社里有困难，咱也应该想法解决。”侄子愉快地将房让出作公用。他尽人民代表的职责，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向政府提合理化建议，如水坑内种芦苇，空地种油料作物等建议都得到采纳。他协助村干部开展工作，指出村干部工作中的不足，做村干部之间的调解工作，教育村干部说：“村干部之间不团结，怎能搞好工作？”在农林种植

方面，他也经常向乡村领导提出建议，促进种植业的发展。

由于周化南先生在各项工作中走在前，干在前，群众尊敬地称他“老青年”。1974年11月他与世长辞，终年93岁。

（此文根据有关档案资料整理）

古代历史人物简介

文 史 科

田桓子 即陈桓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名无宇。田文子之子。有勇力，事庄公得宠。齐景公初年，庆氏专权，预见其必败，田氏将兴。支持晏婴节俭力行，大胆进谏。曾送少姜入晋联姻，为晋平公所执。景公十六年（前532），参与平安栾、高之乱。后告老致仕，封邑于莒（今莒县）和高唐（今高唐东），施舍周济百姓，甚得民心，田氏势力进一步扩大。

夙沙卫 春秋时齐国宦官。事齐灵公，甚受幸。曾接受莱国大夫正舆子马牛各百的贿赂，进言灵公，使攻莱齐军撤回。灵公二十七年（前555），晋会诸侯伐齐，齐军被迫从平阴（今平阴东北）退出，他殿后，连大车，杀马匹，堵塞隘道。第二年，灵公废太子光，立牙为太子，任少傅。后光由崔杼重立为太子而即位，即庄公，怀疑自己被废太子是由于他的缘故，于是奔高唐（今高唐东）而叛。

华歆（157—231） 三国魏国大臣。字子鱼。今高唐县濰河乡大华庄人。东汉末，举孝廉，授郎中丞，汉灵帝死，何进辅政，委任尚书郎，后诏任豫章太守，支持孙策据江东。入京，先后任议郎、参司空军事、尚书、侍中、尚书令。曹操征讨孙权，为军师，转御史大夫。魏文帝即位，为相国，加封安乐乡侯，为司徒。魏明帝时，任太尉，进封博

平侯。史评：“清沌德素”。

华表（203——275）魏、晋大臣。字伟容。今高唐县洵河乡大华庄人。20岁时，官拜散骑黄门郎，后迁为侍中。预料魏帝曹髦和司马氏之间，将为争夺权力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遂连连上表，称病辞官。在后来司马氏与曹氏伙并中，幸免于难。西晋泰始（265——274）中，官拜太子少傅，转光禄勋，迁太常卿。后以老病退休。

华弘 西晋大臣。字长骏，今高唐县洵河乡大华庄人。华表长子。因岳父卢毓典选，避嫌不举姻亲，故至35岁仍不得调官，很晚才当上中书通事郎。西晋泰始（265——274）初，升任冗从仆射。因得罪权贵，在为父服丧时被免官为庶人，并不准袭封，家居近10年，息交绝游，闭门读书，教诲子孙。并集经书中要事成一书，名《善文》。至太康（280——289）初，大赦时，才得到袭封，重新做官。后拜城门校尉，迁左卫将军。数年后，为中书监。武帝死，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书令，进爵为公。杨峻掌权时，被免官。杨峻被杀后，迁为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又进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河南尹韩寿托贾后出面，要将其女儿许配给他的孙儿华陶。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不愿与贾后一伙同流合污，遂加以拒绝。贾后恼羞成怒，竭力报复，深受其苦，不久死去。

华峤（？——293）西晋大臣、史学家。字叔骏。今高唐县洵河乡大华庄人。华表第三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诗赋文章、典章制度无不涉猎，于史学深有造诣，名重一时，被司马昭召为掾属，补尚书郎，转为车骑从事中郎。西晋泰始（265——274年）初，赐爵关内侯。后拜散骑常

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官侍中。元康(291——299)初，封宜昌亭侯。杨峻被杀后，改封乐乡侯，迁尚书。因博闻多识，有良史之才，转为秘书监。认为《汉纪》一书，失之于烦秽，有改作之志。遂遍观秘籍，潜心著述。将东汉光武帝至汉献帝，共195年的史实，分为帝纪13卷、皇后纪2卷、十典10卷、传70卷及三普、序传、目录，共97卷，撰成《汉后书》。深受人赞誉，认为他有司马迁、班固之才，有实录之风。还有议论、驳难、诗赋等著作数十万言。在官制、安边、浚导河渠等方面的建议，也大都得到批准实施。对改善吏治、安定边防和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死去时，《汉后书》的《十典》尚未完成。其著作大部分在永嘉之乱中散失。

华愷 晋朝贵戚、大臣。字敬则。今高唐县润河乡大华庄人。祖父华表，为魏、晋大臣，父华_y为西晋大臣。十分博学，很有声誉。被选作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与荥阳长公主结婚，拜附马都尉。元康(291——299)初，建东宫。被选为太子宾友，赐爵关内侯。晋愍帝即位，以为尚书，进爵苑陵县公。不久，刘聪兵逼长安，朝廷以其为镇军将军，领颍州太守，以为外援。遂组建军队，得2000人。未及西救军师，而关中陷落。只得弃郡东渡，投奔后来的东晋元帝司马睿，被任为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不久拜太常，转为廷尉，加特进。咸和(326——334)初，以讨王敦之功，重新封为苑陵县侯，复领太常。苏峻之乱，侍帝左右，从至石头，备受艰危。为人一向俭素，虽居高位，常布衣蔬食。去世时，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

华衍 西晋官员。今高唐县润河乡大华庄人。史学家华峤

第二子。自幼好学，有文才，有其父之风。目睹其父夜以继日，为撰写《汉后书》而呕心沥血，深为感动。遂暗下决心，继承父志，献身史学。华峤撰写《汉后书》大部完成，唯有《十典》未完。经秘书监何邵推荐，任佐著作郎，继续撰写《十典》。可惜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尚未完成，含恨而死。

华幅 西晋史官。今高唐县淄河乡大华庄人。史学家华峤第三子。自幼聪颖好学，在父兄影响下，尤好史学。父华峤撰《汉后书》，其中《十典》未竟而卒。二兄华彻继续撰写《十典》，又未竟而卒。秘书监缪征举荐奏请，又以他为佐著作郎，继续撰写《十典》。秉承父兄遗志，经长期辛勤努力，终于撰完《十典》。后又草写魏晋纪传。因遭寇乱避难荆州，为贼所害，时年40岁。

刘实（220—311）西晋大臣。字子真。高唐人。少时穷苦，以出卖牛衣为生。性特好学。常手制牛衣，口中背诵文章。遂成为博古通今的学问家。为人洁身自好，志行高洁。曾为河南尹丞，迁尚书郎、廷尉正。后任吏部郎、参相国军事、封循阳子。有先见之明，景元四年（263）钟会、邓艾统领大军伐蜀。认为虽能灭蜀，但都不能平安回来。不久，蜀灭，邓艾矜功，钟会谋反，均被杀，功成而不返，果如所料。此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揖让之礼，荡然无存。遂著《崇让论》，指出：“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应“以让贤举能为先务”。西晋泰始（265—274）初，进爵为伯，迁官少府。咸宁（275—280）中为太常，转尚书。杜预伐吴，以本官行镇南军司。曾因儿子刘夏犯受贿罪被免官。后复官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元康

(291——299)初，进爵为侯，累迁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元康九年(299)策拜司空，迁太保、转太傅。太安(302——303)初以老病休。曾为军人所掠，乘隙逃回家乡。晋惠帝死，怀帝继位，又授官太尉。永嘉三年(309)又准其告老退休。自少至老，好学不倦。尤精《三传》，曾撰《春秋条例》30卷，退职一年后，卒于家。

刘智 西晋大臣。字子房。高唐人。刘实之弟。自幼贫苦，深受其兄刘实影响，每日上山砍柴，而读诵不辍，终于成为很有学问的人。为人洁身自好，注重品德修养。入仕后，曾任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任颍川太守，见机行事，有过刘实之处。刘实妻卢氏死后，有华氏愿将女儿嫁给刘实续弦。刘实恋其女年轻美貌，一口答应。因华家贪而爱财，家风不正，劝阻结亲。其兄不听，终娶华氏女。后生子刘夏。在生母和外婆家影响下长大、贪心无厌，竟至贪污受贿，累及刘实一度免官。自颍川太守任上，入朝为秘书监，领南阳王师，加散骑常侍。后迁为侍中、尚书、太常。著有《丧服释疑论》。

任让 东晋苏峻叛军吏员。高唐人。华恒任州大中正，考察士人，品评等第。因其轻薄无行，被华恒黜退。咸和二年(327)十一月，参加历阳内史苏峻叛乱。咸和三年(328年)二月，叛军将朝廷各台省及诸营办公处，烧成一片焦土瓦砾。随后攻陷宫城，纵兵大掠。他也多所杀害，但见华恒，却毕恭毕敬，不敢肆虐。叛军将大臣锺雅、刘超杀死，然后将杀华恒。因其不念旧恶，尽心救护，使华恒幸免于难。

乙佛弘 善相术，隋末高唐(今高唐县)人。隋炀帝居

藩，召见之，跪而贺曰：“大王必为万乘之主，所戒在德而已”。炀帝即位后，悉诏诸术家置坊以居之，令其总摄。后天下渐乱，炀帝内怀忧恐，尝谓之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验，然相终当何如”？他逡巡不敢言。炀帝迫曰：“不言，且死”！则曰：“臣观人臣相与陛下类者不长，然圣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相炀帝不得善终。自此，炀帝下令有司监视之，毋得与人交言。又泗州刺史薛大鼎曾坐事没为奴，有请于他，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请解衣视之，他指腰而下曰：“位方岳”。

吕才（600—665）唐初唯物主义哲学家。（今高唐县清平镇）人。贞观时直弘文馆，精阴阳、方伎、舆地、历史之书，尤长于乐律。曾任太常博士、太常丞。奉命删定《阴阳书》，颁行天下。确认“极微”和“气”是世界本源，并从“乾坤”、“刚柔”等对立关系中寻找事物变化的原因。反对宗教迷信，对“禄命生成”说、“五德”说、“风水”说等进行了斗争。著作甚丰，但大部散佚。保存在《旧唐书》本传中的《叙宅经》、《叙禄命》及《大藏经》中的《因明注释立破义图序》等数篇，可见其反对迷信和他的逻辑思想的一斑。贞观初曾受召参论乐事，为《秦王破阵乐》协音律。显庆中，又曾奉高宗命修订《白雪》、《阳春》琴曲。

崔敏 唐中期官员。清河（今武城、高唐一带）人。宪宗时补归州刺史。治多驯扰。改永州刺史。俗尚鬼。因约束部吏，毁其淫词，戮其妖师。于是民乃宁一。

崔龟从 唐中期大臣。字玄告。清河（今武城、高唐一带）人。元河十二年（817），举进士。复以贤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拜右拾遗。大和二年（828）迁太常博士。最明

礼家沿革，问不虚酬。九年(835)迁至司勋郎中，知制诰，真拜中书舍人。历户部侍郎。大中四年(850)，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吏部尚书。五年(851)七月，撰成《续唐历》30卷。六年(852)，罢相，检校吏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数徙镇，卒。

崔元略 唐中期大臣。博州(今聊城、高唐一带)人。第进士，更辟诸府，累迁京兆尹，徙左散骑常侍。与崔植素有隙。后植当国，以其为宣抚党项使。辞疾不行，贬黔南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逾年，转鄂州刺史、鄂岳都团练观察使。长庆四年(824)，拜大理卿。敬宗初，还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货钱17000缗，为御史劾奏。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援户部侍郎，讥谤大兴，谏官斥元略方劾而迁，有助力。刘栖楚觊觎相应，疑其妨己路，故排去之。文中朝，大和三年(829)，转户部尚书。四年(830)，判度支。五年(831)，检校吏部尚书。出为东都留守、畿汝防御使。是岁，又迁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卒，赠左仆射。子铉，封博陵郡公。

崔元受 唐中期官员。博州(今聊城、高唐一带)人。元略弟。举进士。以高陵尉直史馆。元和时，从河北行营粮料史于皋谟，督供馈。皋谟得罪赐死，从坐，逐岭表，坎堦不达而卒。子钧、劄、铢相继举进士。

崔元式 唐中后期大臣。博州(今聊城、高唐一带)人。元略弟。举进士后。始署帅府僚佐，累官湖南观察使。会昌中、泽潞用兵，迁河中，拜河东、义成节度使。六年(846)，入为刑部尚书。宣宗初，以刑部尚书判度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兼户部尚书。以疾罢。卒，赠司空，

谥“庄”。

张祜 唐诗人。字承吉。清河(今武城、高唐一带)人。初寓姑苏，后至长安。长庆中令狐楚表荐之，不报。辟诸侯府，为元稹排挤，遂至淮南。爱丹阳曲阿地，隐居以终。卒于大中年间。以宫词得名。有《张处士诗集》及《张祜诗》1卷。

崔铉 唐后期大臣。字台硕。博州(今聊城、高唐一带)人。元略子。擢进士第，迁中书舍人、学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切谏，帝褒纳之。会昌三年(843)，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德裕不协，罢为陕虢观察使。宣宗初，擢河中节度使，博陵县开国子。大中三年(849)，以御史大夫召，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博陵郡公。七年(853)，与馆中学士崔瑒等撰《续会要》40卷。献之。九年(855)，出为淮南节度使，帝餽太液亭，赐诗宠之。居9年，条教一下无复改，民以顺赖。咸通初，徙山南东道、荆南2镇，封魏国公。卒于江陵。子沆，累迁中书舍人。

崔沆 唐后期大臣。字内融。博州(今聊城、高唐一带)人。崔铉子。累迁中书舍人。贬循州司户参军。僖宗立，召为永州刺史，复拜舍人，进礼部、史部二侍郎。乾符五年(878)，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改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时王景崇进兼中书令，让其兄景儒，求易定节度。他认为魏博、卢龙且相援，执不可。卢携专政，而黄巢势渐盛，他每建裁遇，多为携沮抑。黄巢陷京师，被杀。

崔昭纬 唐末大臣。字蕴曜。清河(今武城、高唐一带)

人。及进士第。至昭宗时，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位凡8年，累进尚书右仆射。性险刻，密结中人，外连强诸侯，内制天子以固其权。令族人崔铤事王行瑜。每他宰相建议，或诏令有不便于己，必使铤密告行瑜，使上书訾讦，己阴阿助之。昭宗明察，心不能谏，会太原之师诛行瑜，罢相，授右仆射。再贬梧州司马，下诏条其五罪，赐死。

崔沂 唐末、后梁、后唐大臣。字德润，博州（今聊城、高唐一带）人。宰相魏公崔铤幼子。举进士，历监察补阙。昭宗时累迁谏议大夫。入梁为御史司宪。擢礼部尚书。贞明中充西京副留守。入后唐为左丞，判吏部尚书铨选司，谪石州司马。明宗即位，复为左丞，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70余。赠太子少傅。

崔协 唐末、后梁、后唐官吏。字思化。清河（今武城、高唐一带）人。举进士。为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馆。入梁累官兵部吏部侍郎。后唐同光初改御史中丞。天成初迁礼部尚书太常卿，拜平章事。四年（926）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恭靖”。

曹居润（907—966）五代及宋初官吏。博州高唐人。善书计，后唐长兴中为枢密院小吏。晋初，出掌滑州廩庾，后依附于帅白文珂。文珂荐之于周太祖，周世宗诏以补府中要职。世宗即位后任其为军器库使，累官至左领军卫上将军。恭帝时，加检校太傅。宋太祖登位后，加检校太尉。建隆二年（961），权知澶州。八月，拜为义武军节度。在镇数年，得风痹，诏还京师。卒，赠太师。

张质（933—1017）北宋武臣。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幼时孤，被兄赞养育。赞为枢密院典谒，质因此隶兵房，后

累迁为本房副都承旨。咸平元年（998），授为左监门卫将军，枢密院副都承旨。历任右神武军、右卫大将军。大中祥符七年（1014）转都承旨。在枢要50年，精敏干练，不曾有何过失，很得真宗嘉许。

张逊（939—995）北宋大臣。博州高唐人。幼丧父，后随母归魏仁浦家。宋太宗在晋邸时，召其隶帐下，太平兴国初，补左班殿直。随征太原后，迁任文思副使、香药库使，上书于京中置榷易署，岁增国用50万缗。雍熙二年（985）因其劳授妫州刺史。端拱元年（988）迁任盐铁使。二年（989）任枢密副使，知院事。因与同列寇准不和，相互攻讦，降为右领军卫将军。不久代掌石金吾衔仗。时西蜀李顺领导农民起义，朝廷命逊为右骁卫大将军进讨。斩杀义军首领21人，对余众加以抚慰。深受宋太宗嘉许。卒，赠桂州观察使，归葬京师。

靳怀德（944—1017）北宋官吏。博州高唐人。父为禹城令。怀德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中明法，授广安军判官。历任虞部、比部员外郎，德州知府。咸平四年（1001），契丹入侵时，因守城受到朝廷褒扬，改任为密州知府。大中祥符四年（1011），选为益州钤辖，加任长州刺史。在官以强干闻名，但又常常酗酒失误。迁任北作坊使，很得军民爱戴。因功领昭州刺史，澶州知府。澶州居水陆交通要道，其在任尽心抚治，颇有政绩，为人称誉。又迁为陕州知府。

康焯 金元之际文士。一名康煜，字焯之。高唐人。金正大年间进士，受东平万户严实所聘，为词林祭酒。继后，又为严忠济召为东平府学教官。所教如阎复、夹谷之奇等诸生，后皆为一代名人。著有《淡轩文集》。

邹伯颜 元官员。字从吉。高唐人。初官建宁路崇安县尹。力革职弊，均平赋役，开凿沟渠，广兴水利。又立常平之法，使流民趋归，荒田悉辟，继奉江浙行省令，权任福州路推官。为政廉明，执法持平，有良吏之名。因行省、行御史台联名荐举，选任漳州路推官，卒于任。

王友直 又名王圣孟，宋博州高唐人，生卒年月不详，其父王佑出身武林，友直幼年随父遍游祖国山川，他特熟悉北方地形，友直随父习武，谙熟兵法，交结抗金豪杰志士，渐为朝野人士所注目。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陷宋都开封，翌年俘徽、钦二帝北去，北宋遂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逃至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县）做了皇帝，改元建炎，是为南宋。

南宋皇帝也是昏庸无能，在金兵进攻之下，一逃再逃，先至扬州，再走金陵（南京），后去杭州，高唐等地北方人民，沦金人统治之下。建炎四年（1130）金人册封原济南知府，宋朝降将刘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友直对此极为气愤。绍兴七年（1156），他与抗金志士王任、冯谷、张升、朱霖汝等率众南行，上书朝廷，誓死收复失地，朝廷在爱国主战派的影响下，嘉勉其捣敌腹心，委以天雄军节度使之职，统辖今之高唐、大名等地，友直英勇善战，聚众数万，正隆六年（1161），一举收复大名。

终因南宋朝廷腐朽无能，金军步步南侵。隆兴二年（1194），友直把守昭关（故址在今安徽省东南部含山县北），保卫和州（今安徽省东南部——长江北岸——和县）以及后来的退守镇江之战，都打得十分艰苦，尤其在保卫和州之战中，妥协者退却逃跑，友直背江苦战，打得更为惨烈，堪称

名将。

最后，病逝于徒有其名的宣承使任上。

阎复（1236—1312）元大臣。字子靖。高唐人。初入东平府学，拜名儒康晔为师。又简拔习“进士”课程，经元好问亲自校试，与徐琰、李谦、孟祺号“东平四杰”。宪宗九年（1259），辟任东平行台掌书记。擢御史台掾史。世祖至元八年（1271），举荐为翰林应奉。复以干练有才，选任会同馆副使兼接伴使。从世祖幸上京（今内蒙正兰旗），赋应制诗两篇，深寓规谏之意，得称赏。十二年（1275），任翰林修撰。出金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召为翰林直学士。首先建议定铨选之法，汰黜州郡校官。十九年（1282），升翰林侍讲学士。明年，改集贤侍讲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与高丽国王王璋相处甚密。二十三年（1286），再擢翰林学士承旨，朝廷诏旨多出其手。二十八年（1291），出为浙西道肃政廉访使。以前曾奉旨撰“桑哥辅政碑”文，此时随桑哥倒台而罢官。成宗即位后征召旧臣入朝，起复为集贤学士，建议在京修建孔子庙，恢复曲阜孔林守冢户；又先后提出定律令，颁封赠，增俸给，轻刑罚，减田赋等，多被朝廷采纳颁行。大德元年（1297），改任翰林学士，再擢翰林学士承旨。武宗即位后，晋阶荣禄大夫，遥授中书平章政事。辞官家居。卒后，赠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封永国公，谥“文康”。著有《静轩集》50卷传世。

孙天正（1284—1333）元官员。字梦符。高唐人。祖籍寿光，后迁高唐州定居。初为元仁宗潜邸宿卫军士，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授从仕郎，任文库副使。历太史掾，监修国史掾，中书省管勾等职。后出为沂州（今临沂）知

州。厥岁饥，均徭役，革积弊，抑豪势，旌节义，颇有政绩。任满，改为辽东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后为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不久拜监察御史。再擢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于冤狱多所平反。文宗至顺四年（1333）卒。顺帝即位后，赠中大夫、金太常礼仪院事、轻车都尉，封乐安郡侯，谥“惠肃”。

刘薰 明中期官员。字士元。高唐人。成化二年举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对时政多有建言。忤上意，被谪降为黄梅县丞。以母死辞官，后屡荐不起。著有《勉强集》。

杜潜（1522—1566）生于明代中期嘉靖年间。其祖杜延明为河南省陈州府扶沟县人，明初迁来高唐定居。杜潜为延明七世孙。明朝万历八年（1580），考中庚辰科进士。初为户部主事，后擢升山西左布政使，离京去山西就任。时国事日非，海防松弛，倭寇大肆侵扰，人民残遭杀戮，财产损失无算。杜潜毅然奉命，任蓟州兵备道员，领兵御敌。这里曾是民族英雄戚继光长期把守过的地方，辖境相当今天津、蓟州和河北省三河、玉田、丰润、遵化等县。他镇守今河北省长城以内，东至山海关、西至居庸关之间的天津市以北地区。形势险要，为京畿防卫重点。杜潜组织和督导军民抗敌，战绩卓著，世人敬仰，因皇帝昏庸，杜潜遭受诬陷，含冤而死。葬于高唐州城西门外路南杜氏祖茔。后平反昭雪，叙功追加兵部尚书，倍加厚葬。

朱昌祚 字云门，生于明末崇祯帝即位（1628年）前后。清顺治十八年（1661）任工部侍郎，巡抚浙江，政绩辉煌。旧有《朱昌祚抚浙录》十二条，述其功业。康熙四年（1665）任

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人称昌祚为“朱三省”。时，满清贵族入主京畿，大量圈占农田，严重破坏生产。朱昌祚反对圈地，写《旗民圈地疏》上奏皇帝，力陈圈地弊端，请求皇帝禁止圈占农田。不料却遭奸相鳌拜（旗人）诬陷，被绞死（1670）。后，康熙皇帝知朱昌祚蒙冤，为其平反昭雪，为文立碑，说他秉性纯良，才能敏练，鞠躬尽瘁，倍加厚葬。

朱宏祚（1630—1700）清初大臣，字徽阴，号厚庵。今高唐县梁村镇朱楼人。康熙九年（1670），由举人选授江南盱眙县知县。在任5年，革除杂派科敛，画一赋税条例，严禁争讼，颇多治绩。举卓异入京为御史。改刑部主事。迁兵部督捕郎中。二十三年（1684），出任直隶天津道佥事。参与修《大清一统志》，主持编绘直隶各地地图。调直隶分守道参议。二十六年（1687），越级擢为广东巡抚。力除浮征，严惩贪墨，整饬盐政，蠲除逋赋，以恤民力。三十一年（1692），升任闽浙总督。后因疏奏被责“失言”，降级调用，督修江苏高家堰河工。寻卒于任。著《清忠堂奏疏》传世。

朱纲（1670—1707）清前期文士，字子青，号橡村。高唐人。闽浙总督朱宏祚长子。自负俊异之才，博览群籍，经史子集，无书不读。独薄科举程文，潜心于诗赋。循例入贡捐官，候补主事。诗学王士禛，且身居历下，与四方文士交游，颇负诗名。所著有《云根清壑集》、《风香集》、《观家楼诗》和《吴船书屋集》等，合刻为《橡村集》，为王士禛亲手所评定。又有《岭南草》和《瑞江集》，收入朱氏兄弟合刻集《棣华书屋近刻》。年38而卒。

朱纲 清前期大臣。字子颢。高唐人。闽浙总督朱宏祚之子。由贡生捐纳京官，授兵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康熙

五十二年（1713）授天津道。六十年（1721）擢河南按察使。雍正元年（1723）迁湖北布政使。不久调湖南。四年（1726）署湖广总督。明年，擢云南巡抚。又调福建。卒赠兵部尚书，谥“勤恪”。从师王士禛，能诗赋，有集《济南草》。又著《苍雪山房稿》，为王士禛所评定，收入《四库全书》。又长于法医学，著有《洗冤录》、《检尸考要》等。

朱降 清前期官员。字子桓。高唐人。闽浙总督朱宏祚之子。由贡生累官至广东布政使。所著《岭南草》，与兄弟朱纲、朱纲合刊为《棣华书屋近刻》，收入《四库全书》。

刘灏（1732—1802）清前期大臣，字正林。号岸淮。清平（今高唐清平）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编修。历迁江西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先后奉使巡视南运河漕务和天津仓漕等事务。明定运河附近距河凿井的章程。杜绝吏弊。又疏减挑浚运河役工，以苏民困。继迁任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从嘉庆六年（1801）起，相继奉命赈恤京畿被水灾民，终积劳成疾，卒于任。入祀乡贤祠。

（根据《山东历史人物辞典》、《高唐县志》等整理）

县政协的沿革发展

吴 宪 明

高唐县的干部群众具有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优良传统。早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高唐最早的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就曾团结“红门”群众，举行了著名的高唐谷官屯农民暴动，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承先、韩宁夫、高峻岳、庞均、李日坦、陈达、解金声、王光照等同志积极抗日，团结各族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涌现了刘化溥、吴子杰、殷传业、朱九文等爱国人士，经过八年爱国军民的共同奋斗，消灭了盘踞在高唐的日伪武装，光复了高唐；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高唐县委芦青云、董诚等同志，领导高唐各界人民群众拥军支前，配合八路军扩大解放区，围歼顽杂“十大团”，肃清敌特，巩固了政权；在建国初期，中共高唐县委积极实行民主政治，于1949年设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高唐县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指出，人大是权力机关，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高唐虽然没有建立政协组织，但是各界人士关心国家大事，利用各种形式参与重要事务。1957年以后，统战政协工作受“左”的错误影响，特别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政协工作被迫停止和消弱。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恢复人民政协，1978年邓小平同志担任

全国政协主席，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县市设立政协问题的通知》，中共高唐县委于1981年正式组建了政协高唐县委员会，现已经历四届、十二年。

一、县政协的前身

高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县政协的前身。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政治生活欣欣向荣形势下，中共高唐县委于1949年11月23日至26日，召开了高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农民53名，工人9名，手工业者4名，商人15名，政府工作人员34名，人民武装人员22名，党员5名，妇女34名，青年24名，医生17名，教职员26名，学生14名，乡间知识分子3名，回民1名，来宾2名，民间艺人1名，开明绅士2名，共17个界别266名代表。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县政府工作报告》，解答了代表提案，通过了《大力组织和领导农副业生产》、《扩大棉田面积》、《改革农具保护牲畜》、《兴修水利》、《生产救灾节约备荒》、《加强治安》、《加强文教卫生工作》、《加强青、妇工作》、《修建革命烈士祠》等项决议。第二次会议于1950年5月14日至16日召开，出席会议的218名代表，听取、讨论并通过了《县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当前工作方针任务和措施决议》。第三次会议于1950年11月14日至17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47名，听取、讨论并通过了《县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生产问题》、《秋征问题》、《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大力宣

传婚姻法》、《发展副业生产》等决议。第四次会议于1951年4月27日至29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91名，各村人代会主席列席了会议，听取、审议通过了《县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爱国公约》、《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慰问电》、《巩固国防安定社会秩序》等决议。第五次会议于1951年12月12日至15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82名，会议传达了华北县长会议精神，听取、审议通过了《县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继续深入扩大反美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爱国增产运动、生产自救运动》、《深入贯彻镇压反革命政策》、《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大力开展文教卫生工作》、《全面贯彻婚姻法》、《充分发扬民主》等决议。

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2年11月8日至14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87名，会议听取、审议通过了《关于1950年至1952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三年财政工作报告》、《目前国内外形势报告》，选举产生了以田连峰为县长的县政府领导机构。二届二次会议于1953年3月4日至8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57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县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决议》、《贯彻婚姻法决议》和《1953年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决议》。上述两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虽然没有成立常设机构，但在陈光汉、孙醒民、董诚、姚伯芳、王长庭、姜世钰、金高兰、高家兴、左凤田等同志的领导下，认真实行了人民民主，协商决定了许多重要问题，对于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发展大好形势，发挥了

巨大作用。

二、一届委员会

标志着政协高唐县委员会正式成立的一届一次全委会议于1981年12月13日至17日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县政协委员67人，代表十五个届别。他们是经过充分酝酿协商产生的。会前，县委对党员委员进行了动员，召开了预备会议。正式会议由主席团主持，王世华同志致开幕词，中共高唐县委副书记谷庆雪作报告，李凤强同志作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全体委员列席了高唐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听取中共高唐县委书记翟瑞华作《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有关领导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协商了县政府领导人名单。会议选举产生了县政协一届委员会领导班子，主席谷庆雪，副主席李凤强、王世华、耿效舜；常委十七人（以姓氏笔划为序）：马子俊、王世华、王祥瑞、白荣卿、傅辰荣、叶桂荣、冯秀梅、谷庆雪、李凤强、李开峰、张丙恒、耿效舜、徐志祥、梁希臣、崔学经、童祥云、蒋锡炳。这次会议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委员们提出了72条提案，成立了工交财贸、文教、医药卫生、科技、文史五个工作组，规定了制度。会后，三次召开常委会，多次召开学习座谈会，认真组织委员落实学习计划，重点学习了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办理了78项提案，贯彻了山东省宗教侨务会议精神，对少数民族生产队进行了调查，开展

了文史征集，赴郓城、巨野两县学习经验，探讨了如何发挥政协职能作用问题。

一届二次会议于1983年1月25日至29日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在中央“十二大”精神指引下，联系政协实际，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研究如何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会议由谷庆雪主席致开幕词，耿效舜副主席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委员们列席了高唐县八届二次人代会，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法院、检察院、财政局的工作报告。会议结束时，高唐县委书记翟瑞华到会作重要讲话，强调政协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今后政协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会后，政协及时组织委员学习《中共中央（83）一号文件》、《胡耀邦同志在甘肃、青海对统战政协工作的重要指示》、《邓颖超主席在六届全国政协二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三次召开常委会，组织委员参观了梁村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情况，听取了县公安局打击刑事犯罪情况汇报，办理了73项提案，宣传了模范政协委员叶桂荣、傅辰荣、张连安、王祥瑞、徐志祥等同志的事迹，召开了科技界、医务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向有关单位提出加强知识分子工作的意见，促进了政协委员“要知情出力落实政策”指示的落实。

一届三次会议于1984年4月11日至13日召开。会议期间，耿效舜副主席作常委工作报告，列席了县八届三次人代会，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和计划、财政、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委员们提出了78项提案。这次会议后，中共高唐县委调政府副县长赵立冬任政协主席，召开了三次常委会，办理了提案；配合有关部门对原划“右

派”被错误处理的，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对起义投诚人员，对“文革”中被查抄财物问题等，作了妥善处理；到天主教活动中心张庄村宣讲党的宗教政策，热情接待了“三胞”蔡锦章、孙瑛、倪宝亭等；向县政府申请拨了文史专用经费，张巍等老同志提供了珍贵历史资料；机关工作人员由一人增至三人，吴宪明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购置了打字机，安装了电话，添置了办公用具，机关工作制度开始健全，王百魁等同志连续三年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三、二届委员会

二届委员会由十八个界别83名委员组成。二届一次会议于1984年10月7日至9日召开，与会委员按无记名投票和等额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了二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委委员：政协主席赵立冬；副主席耿效舜、谷庆雪、孙茂全、徐志祥、孙丙浩；常委二十五人（以姓氏笔划为序）：马子俊、王逢春、王祥瑞、冯秀梅、叶桂荣、白荣卿、孙太石、孙丙浩、孙茂全、刘新东、李开峰、谷庆雪、赵丕明、徐志祥、耿效舜、钱锋、崔学经、傅辰荣、童祥云、蒋锡炳。会议开幕时，政协委员济济一堂，县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政协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座，耿效舜副主席致开幕词，中共高唐县委书记赵鲁贵讲话，赵立冬主席作题为“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的报告，赵丕明同志作提案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与会委员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提出72项提案，协商了县政府、法院、检察

院领导人名单。这次会议，规定了主席会议制度、常委会议制度，明确了主席分工，组成了“三委五组”。“三委”：学习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五组”：文教卫生组、城乡建设组、科技信息组、民侨宗台组和工商组。

1984年和1985年，政协的各项工作日趋活跃。（1）把搞好学习作为本会政治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来抓。坚持了经常性的学习活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后，政协机关及时给委员发出了学习通知，多次召开学习汇报会，组织委员参观了北关联中、高唐镇一街、尚官屯大队，加深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端正了业务指导思想，增强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自觉性。（2）及时向县委领导汇报上级召开的统战、政协会议精神，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传达贯彻，给县委政府有关领导人和政协常委各订一份《人民政协报》，印发了《统一战线基本知识讲话》、《县政协工作简报》、《会讯》和《县政协委员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事迹材料》，县广播电台报道了政协开展活动情况，举办了《统一战线基本知识讲座》专题节目，抵制了“左”的错误影响和轻视统战政协工作的现象。（3）二届一次会议后的第一次主席办公会议专题讨论了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的问题，机关通知政协委员实事求是地报告有关冤假错案问题，采取主席会议集体抓、分管主席靠上抓、办事人员具体抓的办法，给13名委员落实了政策，群众称赞“政协办实事”。（4）提案委员会对72项提案和64件信访逐一作了正确处理，达到了领导、单位、提案人“三满意”。（5）先后两次召开政协委员为

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有14人（次）报告了先进事迹，12名委员出席了聊城地区的表彰会议，一名政协委员出席了山东省的表彰会议。（6）吸取了聊城市李海务政协工作组的经验，加强了县直6个工作组、乡镇15个学习组的领导，由政协常委和乡镇宣委任组长，吸收了各界人士参加学习活动。（7）就北关中学教学楼、农村专业户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视察，本着既视察又帮助的原则，按照“立足本身尽力解决，为难之处呈报上级”的途径，作了妥善处理。（8）利用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和八五、八六年的春节等时机举办了庆祝会、座谈会、茶话会，走访慰问了高唐师范、北关联中、韩寨中学、打渔李联中的教职员工，联系了社会各界人士，密切了相互关系。（9）组织政协委员到阳谷、聊城、临清、泰安等县市参观学习了政协工作经验。（10）加强了文史资料工作，第一次制定了包括十二个方面二百多个题目的征集提纲，印发到县内外，按系统分题定人进行征集，王守仁、李洋两位老同志积极帮助工作，一九八五年底出版了第一辑《高唐文史资料》。（11）通过1985年机关整党，统一了思想，健全了党组（书记赵立冬）、支部（书记吴宪明）和规章制度，机关工作作风受到社会赞誉，工作人员增至8人，购置了办公用车，办公地点由原人武部（四间旧房）迁至原内燃机厂部。县委书记赵鲁贵说：“政协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86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二届二次会议，政协主席赵立冬和副主席谷庆雪、徐志祥等在会上致词作报告，赵鲁贵书记到会讲话，与会委员列席了县九届二次人代会，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等，委员们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了87项提案。这次会议强调了重视统战政协工作的意义。二届二次会议后，县政协紧跟党中央部署，召开了县直学校的特级教师、省地模范教师等参加的座谈会，专题讨论了维护安定、团结，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对发展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搞好农业生产、振兴教育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到旧城、南镇、洹河等七个乡镇开展了咨询服务，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农村干部、教师、离退休老同志、对越作战的前线战士家属、复退军人和计划生育后遗症者，进行了义务诊疗；在县直举办了离退休老干部保健讲座；对二届二次会议以来的88项提案进行了办复；省政协委员耿效舜同志就高唐一中教学条件差、高唐县财政困难等问题，向省政协提了七项提案；召开了政协委员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宣传了10名政协委员的事迹，带动了各界人士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配合有关部门落实了侨属私房政策，到梁村镇调查了基督教情况，支持修葺了高唐北关清真寺，在寺内栽种了“民族团结树”；通过各种形式对社会各界进行了统一战线再教育，对143户“三胞”亲属情况进行了调查，对8名生活困难的政协委员进行了救济。

四、三届委员会

1987年4月21日至24日召开的三届一次会议，由主席团主持会议，赵丕明、吴宪明任正副秘书长。新的一届委员会界别增加，委员人数增多，新委员增多。在二届18个界别基础上，新增“三胞”、乡镇企业两个界别；委员人数120

名、其中新委员61名、非党人士72名，委员们的平均年龄44.8岁；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67名；每个乡镇都有4—5名委员，乡镇委员总数达到65名；县直财政、金融、政法、城建等部门也有了代表充实到政协委员队伍；委员人选是各界代表人物和“四化”建设中的精英，具有良好素质。

三届委员会主席李宗生；副主席耿效舜、孙丙浩、徐锡奎、孙太石；常委21人（以姓氏笔划为序）：马子俊、公现光、王逢春、王祥瑞、冯秀梅、白若焉、孙丙浩、孙太石、白荣卿、曲日兴、李宗生、李开峰、李荣勤、岳金生、张兆德、赵丕明、耿效舜、徐锡奎、郭玉珍、钱锋、童祥云。李宗生主席负责政协的全面工作，副主席孙丙浩和徐锡奎分管学习、宣传、文教、文史工作，耿效舜、孙太石副主席分管提案、卫生、科技工作。常委分别担任学习委员会、提案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文教组、医药组、科技组、民侨宗台组、经济建设组主任或组长。15个乡镇的学习组，分别由王凤泉、李丙勋、刘同英、刘立冬、侯廷明、刘学忠、周庆堂、张经湖、王兆文、贾美岭、马长旺、李延录、李玉檩、林宗顺、钟怀凤等同志负责。在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共高唐县委书记赵鲁贵、县长高灿涌、人大主任王长顺及县政协主席李宗生、副主席孙丙浩、徐锡奎等，均致词、讲话或作报告，会议明确了1987年政协工作的指导思想，即：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努力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服务，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调动各界人

士的积极性，完成中共高唐县委提出的各项任务。

1987年县政协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一是把组织委员学习看成是新形势下的一项光荣任务，组织委员学习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本书，贯彻了全国政协召开的工作组（委）会议精神，围绕“三个服务”，为“经济大合唱”献计出力。在学习中着重抓了“快、活、带、联”四个字。“快”，接到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示后，立即发出学习通知和文件，很快形成了学习热潮；“活”，根据委员分布面广、工作性质多样实际情况，采取学习日学、平时自学、例会学、专业活动结合学的方法；“带”，领导干部和机关带头学，政协委员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学；“联”，理论联系实际，不作表面文章。二是在参政议政方面，注重抓大事。请县委领导通报全县1987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农村经济大合唱规划、双增双节、普法教育等情况，召开献计出力研讨会，写了《朱小吴发展多种经营情况》、《发展庭院经济》、《四个企业的改革情况》等调查报告，对全县的主要工作发挥了促进作用。三是在协商监督方面，将委员提出的75件提案打印成文，报送有关领导人掌握情况，引起重视；县政府召开了办理提案会议，有关科局召开了党组或局长办公会议，认真处理了提案。王祥瑞、王玉兰、林勤农等委员关于发展教育的提案，经县政府筹资55万元，新建了北关联中教学楼，规划了职业中专教学楼，落实了教师进修学校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装；钱锋、王华新等14名委员关于教龄补贴、煤炭供应问题的提案，有关领导亲自到政协机关汇报处理意见，使提案得到很好的落实。四是围绕群众普遍关心的“热

点”问题进行视察。政协和人大一道就群众一度反映强烈的市场管理混乱问题进行了视察，检查了物价、衡器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石油混号供应、计划内化肥卖高价、食糖和彩电擅自提价等问题；医务界的护龄津贴问题，经过政协呼吁也很快落实，各界群众反映政协是替他们说话的。五是利用常委会、乡镇工委主任会、台属联谊会等时机广泛宣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组织台属收看在台亲人的录像，帮助台属排忧解难。当得知某台属住房困难后，报经县委批准为其解决了木材、钢筋等建筑材料，对来家乡探亲的王正民、崔占安、加拿大华人张兆铭女士等进行了热情接待，增进了相互间的亲情、乡情、同窗情，“三胞”们喊出了“谁阻碍‘三通’谁不得人心”的正义呼声。六是加快了抢救文史资料的步伐，1987年10月出版了第二辑《高唐文史资料》，发往全国九省146个县市，发挥了社会效益，其中《抗战时期的刘化溥》一文发表后，刘的老部下感激地说：“过去跟刘化溥打鬼子，一直被当杂团对待，背了几十年“黑锅”，现在政协给咱说了公道话”。七是政协机关认真地进行了怎样做模范共产党员大讨论，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增设了工作联络科、文史科，明确了科室负责人，完善了岗位责任制。八是政协领导人到十几个乡镇的数十个村庄和一部分工厂企业作调查，积累了第一手材料，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建议。

1988年1月2日至5日，召开三届二次会议，主席、常委任执行主席，赵丕明、吴宪明任正副秘书长，耿效舜副主席致开幕词，赵鲁贵书记讲话，李宗生主席作工作报告，赵丕明作提案工作报告。与会委员列席了县人大十届三次会

议，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72项提案。会后，政协组织委员和机关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共“十三大”报告和省党代会精神以及全国政协和省政协会议精神，进一步确立了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团结大统一等观念，提高了对政协工作广泛性、长久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增加了从事政协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协商监督上，改变了“一头热”的现象，紧紧围绕经济中心参政议政。1988年初冬，县政协针对棉花生产可能出现“滑坡”趋势，进行了专题调查，写出了有事实有分析有解决办法的调查报告，受到县政府高度重视；1989年年初县委召开“三千会”前，将会上的主要报告和发展农村经济的三个试行规定，交给县政协进行协商，做到了协商在决策之前；在办理提案中，对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97条提案，都进行了认真处理。王兆文、宋传兴、白若焉等委员关于农村生产用电不足的提案，经政府讨论决定调出1500负荷电送往农村，保证了生产急需。在全县“农村经济大合唱”中，县政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的《关于五个乡二十个村经济发展情况报告》被中共聊城地委刊登在1988年第56期《情况反映》中，指导全区工作；新棉上市前，县政协针对棉农存在的“惜售”思想，作深入调查，写出了《关于棉花收购问题的建议》，县长在全县棉花收购会议上进行宣读，指导全县棉花收购工作；1988年春，政协召开了农村委员致富经验交流会，组织39名委员参观孙太石种植的林果、岳金生的鸡场、高德政的养貂场，听取左光勋委员作科学种田经验介绍，讨论了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带头致富问题；1988年秋县政协召开发展商品生产座谈会，与会同志到了茌平县小杨屯参观、学

习了立体种植经验，之后，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各打各的优势仗。童祥云、刘仰训等六次到尹集、旧城传授林果技术，吕学琪带领全厂职工生产出省优、部优产品柱塞泵和超高压泵；文教卫生委员会推出了《关于我县基础教育情况》的调查报告；卫生工作组视察了城市环境卫生，坚持了定期巡回医疗和举办保健讲座。在联谊交友方面，县政协以做团结人的工作为己任，慰问了往届老委员，召开了迎春茶话会、庆祝教师节座谈会、台属座谈会、接待台胞78人次，协助孙瑛、程辛木先生举办了画展，慰问了挖河民工。在文史资料工作方面，完成了第三辑《高唐文史资料》的出版发行。机关开展了“强化服务为政清廉”活动，制定了有关规定，完善了各项制度，服务工作上了新的台阶。

1989年4月1日至4日召开三届三次会议，县政协主席、常委主持会议，徐锡奎副主席作常委工作报告，县委谷庆雪书记到会讲话，耿效舜副主席传达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精神，赵丕明常委作提案工作报告。委员们列席了县人大十届三次会议，听取孔昭信代县长作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领导的工作报告。是年，县政协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时，各界群众为国家安危忧心如焚，县政协及时组织委员学习《人民日报》“4.26”社论及党中央有关文件，统一了思想认识，制定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通过全委会、常委会、主席办公会、工作组会、座谈会、茶话会、情况通报会和列席县委会、县长办公会等形式，围绕安定团结和经济中心进行协商监督，组织了五次专题调查和三次专题视察，写出了书面报告，办理了提案83件；向委员通报了情况，组织

了参观学习，讨论了如何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委员们立足本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王本跃委员实行棉麦间作连年获得丰收，人均收入达千元；朱宝忠委员种植、养殖一起上，1989年人均收入1600元；童祥云、崔学经、公现光关心集资办厂，以提案形式督促县政府调集骨干加强对高申棉纺厂的领导；林勤农、钱锋、叶桂荣、李秀英委员提出了防止中小学学生近视眼的提案；刘长居、刘海军等七名委员提出了保安队人员素质差的意见；陈金柱、李荣勤、冯秀梅委员提出了关于市场物价的提案；丁泽顺等委员提出了有关部门给棉农返还饼油不落实的批评；白荣卿、任景昌委员提出了整顿市容的建议，等等，反映了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引起有关党政领导的重视，采取得力措施，抓了落实，化解了矛盾，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稳定；张连生、曲曰兴等13名胞属委员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同亲人的联系，政协对他们的亲人进行了热情友好的接待，达60多人次，通过双向交流，增进了共识，“三胞”感激地说：“泥土还是故里香”。县政协副主席徐锡奎具体抓文史资料工作，以文会友，朱学温、程辛木、李洋、邵金铭、李玉祥、吴宪明、王琴等同志通过辛勤劳动，保证了第三、四辑《高唐文史资料》的出版发行，吴宪明同志提升为文史科长。政协机关认真学习中共“十三大”以来的重要文献和政协章程，联系实际，克服“政协无权无钱没人求”、妄自菲薄、无所作为的思想，经受住“六四”风波的冲击，安心工作，力求上进。

五、四届委员会

1990年，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文件，为进一步做好人民政协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共高唐县委和县政协，经过民主协商，产生了由十九个界别140名委员组成的四届委员会。委员中有新委员59名，非党人士84名，女委员32名，乡镇委员67名，县直委员73名，大中专文化程度的委员96名，平均年龄是42.4岁，有关团体的领导人和乡镇统战干部被吸收为委员。1990年3月27日下午四届一次会议开幕，县级领导班子负责人和政协委员欢聚一堂，听取中共高唐县委副书记孟宪海讲话；副主席孙丙浩作常委工作报告，刘嘉举、赵丕明同志作提案工作报告。与会委员列席县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几个报告，并进行热烈讨论，提出了101项提案，通过了有关决议，邵庆臣副主席宣布大会胜利闭幕。四届一次会议选举结果：主席李宗生，副主席邵庆臣、孙丙浩、刘嘉举、李荣勤、靳鸿江、公现光，常委27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丁君、马子俊、王逢春、王祥瑞、芦时杰、白玉柱、白若焉、冯秀梅、曲曰兴、刘新东、孙太石、李开峰、张兆德、张庚寅、陈金柱、林勤农、赵丕明、崔学经、董保亭、童祥云。

四届一次会议后，增加政协委员12名，委员总数达152名，设立了15个政协乡镇工作委员会（区级机构），任命了刘春祥、张德恕、刘庆余、赵金山四名工委主任，18名副主任：冯仁英、芦宪岭、孙洪岭、赵怀忠、张令起、王曰谦、何玉山、周忠太、王光礼、朱久奎、刘观阁、孙学颜、郭英福、杨系双、范士祥、冯立成、孔宪忍、王中华。四届一次会议设置八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学习、提案、文史、经济科技、文教卫生、祖国统一、民族宗教工作。认真学习贯

彻了中央、省委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省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党中央《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开了全县政协工作会议、三次学习座谈会、五次常委会、十次主席办公会和一次全委会，请县委书记谷庆雪就全面做好政协工作讲了话，制定了《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意见》，加强了同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联系。1990年部分乡镇遭受水灾后政协领导迅速赶赴灾情严重的乡村，看望受灾委员和群众，鼓励他们抗灾夺丰收，反映了他们要求疏通沟渠的呼声，建议县政府狠抓了抗旱防涝工程。在强化基本职能方面，围绕“两个稳定”，对政府工作报告、加强农业、发展棉花生产、搞好良种基地建设、建立科技兴农组织、发展乡镇企业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对高唐针织厂、高申棉纺厂和五个棉厂进行了视察，对101项提案进行了认真办理，参与了全县重要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对群众反映的医药市场管理问题，加强科技应用推广问题，政协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作了改进。政协委员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沟通党、政府与各界群众的联系，对群众进行了拥护党、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米双忠阿訇在回族群众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维护了民族团结；教育界委员连续三年举办高中文化补习班，升学率逐年提高；卫生界委员多次下乡为农村行动不便的老干部、老教师义务看病，把党的温暖送到家家户户；文史委员会通过出版发行第五辑《高唐文史资料》，广泛宣传了爱国主义；科技界委员论证了科技与农业、工业的关系，努力探索科技兴高的路子；工商界委员立足本职求效益，取得了累累硕果。许兰山委员担任榨油厂厂长后，加强经营管理，连续三年迈大步，在九〇年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实现利

税过百万元；董保亭委员使濒临倒闭的砖瓦厂摘掉了亏损帽子，五年上交利税64.4万元；左光勋科学种田成绩非凡；周庆生自配农药治虫效益显著，受地区农机局好评；刘华英养鸡致富后，帮助22户农民走上致富路；政协机关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国内治理整顿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面临一些新情况。四届二次会议于4月1日至4日召开，县委书记谷庆雪作形势任务报告，刘嘉举副主席作常委工作报告，邵庆臣副主席作提案工作报告，许兰山、董保亭等委员介绍了工作经验，与会委员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157项提案。

四届二次会议后，政协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责，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是扎扎实实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重点学习了中共中央和省委文件、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和《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提纲》。

二是政协主要领导人参与全县重要问题的协商讨论，召开五次常委会、六次主席办公会、六次乡镇工委主任会，围绕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规划纲要》，对工业发展问题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三是对县直部门代县起草的《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等进行了认真协商，使“规定”更加切合实际；对15个管区、132个村庄的集体经济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写出了《关于农村社会化服务情况的调查报告》，为县委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

四是认真办理提案，满意率达到95%。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制止“三乱”问题、以工代干问题、建立贸易市场问题、提高自来水质量问题、制止婚丧大操大办问题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

五是在“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中，视察了机械厂、工具厂和油厂；在全县计划生育集中活动、城市社教、105国道建设、位山清淤、干部包乡镇包村、巡回医疗咨询服务、社会办学等各项工作中都起了促进作用，程辛木、张兆德、米双忠等10名委员受到政协地区工委表彰。

六是县政协组织“三胞”委员，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讲话，通过十余次接待“三胞”，为“三引进”牵线搭桥；在中秋节、教师节、春节和党的七十周年生日之际，召开了座谈会、茶话会、庆祝会，联络感情，宣传政策，扩大团结面。

七是完成了第五辑《高唐文史资料》的出版发行任务，审定了第六辑《高唐文史资料》初稿，聘请了56名文史研究员和文史员，聊城地区政协工委主任许继善题词：“高唐文史资料办得很有自己的地方特色”。

八是组织乡镇工委主任赴郓城、菏泽、曲阜、泰安等县市学习考察，制定了《工委暂行工作条例》，宣传推广了濰河乡政协工委的做法。

九是超额完成《联合周报》征订任务，受到政协地区工委奖励。

十是调整了四名机关同志的职务，周正文任办公室主任，张克民任联络科科长，王百魁任联络科秘书（正局级），唐书生任办公室秘书（副局级）。机关搬进新楼办

公，更换了轿车，办公条件大改善。

四届三次会议于1992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刘嘉举副主席兼秘书长，王玉堂、周正文、吴宪明、张克民任副秘书长，邵庆臣副主席主持召开预备会议，李宗生主席主持开幕式，县委书记谷庆雪到会讲话，邵庆臣副主席作常委工作报告，周正文主任作提案工作报告，与会委员列席了县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及人大、法院、检察院、计划、财政工作报告，委员提案126项。4月1日全体委员选举李玉兰同志任政协副主席，4月2日，邵庆臣副主席传达地工委会议精神后，会议闭幕。会后，政协适应形势要求，发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消除了“姓资姓社”疑虑，实现了一次思想飞跃，政协联系工作实际，务实求实，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主战场，支持县委政府对13个企业的改革试点，帮助企业落实国务院给企业的14项自主权，积极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农村工作和李鹏同志的电视讲话精神，就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进行了协商，调查了五个乡和部分村的经济发展情况，视察了张大屯、清平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召开了台属座谈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发动了有识之士参与文史工作；办理了126项提案，提出了壮大集体经济、加强大市场管理、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等建议；16名老教师连续五年举办高中文化补习班，1992年144名学生升学深造；卫生组到涸河、清平镇进行了巡回医疗服务；经科委进行了良种优化服务；文史委整理了工商经济历史资料，审定了第七辑《高唐文史资料》初稿。

展望未来，催人奋进。即将成立的五届政协委员会，一

定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造更加光辉的业绩载入史册。

（1992年12月）

光 荣 的 事 业

——忆解放初期的王庄完小

李 兴 成

1945年高唐县城解放，1947年伪杂盘踞的城东北二、八区人民才被党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扬眉吐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群运”、“土改”和政权建设。解放后百业待兴，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开始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为满足人民翻身后的文化要求，乡村级小学相继建立，1948年秋，八区区政府组成了筹建完全小学的领导班子，选定前辛庄农会四合院为校址，县、区分别选派教职员工9人，招收五年级学生两个班，连同前坡、前辛一至四年级学生共160人，建成了八区完全小学，区长李振明兼校长，李兴成任教导主任。1949年夏，校迁王庄，增加五年级学生两个班100人，王庄、辛庄等三个村的一至四年级学生80余人合并本校，定名为高唐县王庄完全小学。王庄当时属二区，学校受二、八区双重领导，业务直属县教育局领导。这时全校共有学生280多人，教职员工14人，是城东北唯一的一处完全小学。该校在县区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教职员工确立了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思想，发扬了为国育才的革命精神，全体同志团结奋进，严谨治学，学校规模越办越大，声誉越来越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育了一批合格人才。据我知，王庄完小当时

的四个五年级班，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分别考入初中和初师，这些同学相继在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下，奋战在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有的在北京新华社、北京航院、北京医大、山西医大、天津医大、山东师大任职，有的在部队师团当领导干部，更多的同志在地县工作，他们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齐心协力 艰苦创业

解放初期，国家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贫困，但政治上已经翻身做主人的人民群众，文化翻身的要求是很迫切、很强烈的。党的领导视群众要求为己任，尊重现实，决心因陋就简办教育。学校筹建小组李振明等领导同志坐阵前坡、前辛现场办公，大家认识到条件差只能创不能等，选定前辛农会做校舍，房屋破旧，筹委委员郭成美（前辛农会主任）、张学恩（前坡村村长）当即表态备工备料，义务修缮，三五天就把房屋修补好。当时办公所需桌凳、费用、粮柴及工人全是两村援助的。县教育科见八区办学决心大、进度快，当即派林凡五、唐德华同志前来任教。区政府还专门召开了各村干部会议，做了齐心协力办学校的动员，大会宣布：八区完小筹建就绪，教职员工已到校办公，可动员群众送子女入学，目前所需桌凳、柴草（伙房用柴，铺床用草）均需各村援助。人民政府人民爱，一呼百应，雷厉风行，五六天就将东西送齐，送来的桌凳有的残缺不能用，我们请木工一齐动手修，床上没铺板就勒秫秸，没苇席就铺干草，很快筹备就绪，招生开学，这所学校象一盏灯，照亮了城东北劳动人民的心，激发了群众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次年，根

据群众要求，扩大招生，经二、八区协商迁校王庄。王庄环境好，房子多，布局适当，操场宽广，但历经沧桑，损坏严重，修缮任务大，师生齐动员，拉土泥房打院墙，平操场，植树绿化，将一所破碎荒芜多年的学校整修一新。学生增加，桌凳不足，结合反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文明的社会活动，征得二区区政府同意和支持，由文教助理员纪恒带领全校师生将业官屯（现属张庄乡）西大庙里的神像全部拉倒，把神桌神凳改制成课桌凳，既解决了校具不足，又给学生上了一堂破除迷信的现场课，在周围村庄发生了很大反响。

这段时间，师生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秫秸床，同吃大伙房的窝窝头、稀饭汤（当时只有10%左右的细粮），上级拨款买了一头小毛驴，自己碾米磨面，教师工资是每人每月80—120斤小米，每三个月领一次谷子（小米折成谷子），除加工食用外，卖一部分作为零花钱，办公费用仅能保证急需的笔墨纸张，交通工具一无所有，进城开会往返70里都是步行。教师每三个星期回家一次，最远的往返六十里都能做到星期六下午课后走，星期日下午准时回校。虽然生活苦、任务重，大家却感到为国育才乐在其中。

辛勤耕耘 教书育人

旧社会把教师当作自由职业者，更有甚者称教师为教书匠、孩子王，故教师本身多自卑感。旧社会的学校面向官宦子弟、豪门子女，家长送孩子入学是求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所以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也是一场政治思想革命。遵照教人者必先受教育的哲理，在县区政府的具体指导下，首先

把组织教师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定作制度，经常坚持，通过对华北行政区教育发展大纲、《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件的学习，端正了面向劳动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的办学方向，认识到教书是革命，是为人民服务，从而奠定了热爱人民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在加强教师思想建设的同时，通过政治课、周会、演讲会向学生进行了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接好革命班、肩负建设祖国重担的教育，课堂教育与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相结合，教师身体力行，师生一起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土地法大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婚姻法……，参加捕蝗灭灾、拥军优属等活动。

教师深入学生、深入生活，密切师生关系，开展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排演革命短戏等活动，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课内外每个环节，做到上课是严师，课下是慈母，唐德华同志懂医学，每遇学生有病，他主动诊治，亲自买药送服，深受学生敬佩。学生端正了学习目的，自觉性发生了可喜变化，由家长要我学、老师要我学变为我为革命学。为满足学生求知欲，完成教学任务，学校建立了可行的业务学习、教案分析、集体办公、领导听课、观摩教学等制度，有利地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讲课，强调语言精练，深入浅出、打好基础、注意连贯、努力变书本知识为学生知识。四个五年级班的学生基础高低悬殊，对后进生由教师课外辅导，动员高才生热忱帮带，建立健全了月考、期中考、期末考、补考一套严格的考试制度，及时榜示，优者表扬奖励，差的耐心帮助。严格的纪律、健全的制度，促成了教师

克尽职守、学生刻苦攻读的良好校风，也是学生学习成绩优秀的保证。

举贤纳士 报效祖国

王庄完小的起步和发展证明，尽快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是治国之本，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团结依靠知识分子（当然也要对其进行思想改造）。王庄完小第一学年有6名教师，其中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2人，济南解放后回来的高中生2人，仅有高小程度的2人。第二学年，学校扩大，教师增加到12人，其中旧知识分子占90%以上。我们坚持用而不疑，疑而不用的原则，思想上关怀，政治上培养，生活上体贴，工作上支持。当时区长（兼校长）、区政委经常到校检查指导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时吃住在校，与师生一起学习、工作。工农出身的区政委王昀同志结合自身经历，给教师讲高唐党组织开展地下工作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和没有文化的苦，教育我们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代课教师郝捷先和王政委都爱好文艺，经常接触，受益颇深，增强了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心，工作积极，加之他文化水平较高，教学得法，颇受学生敬重，代课期满，政府拍板留校任教转为正式教师。张士印年轻有为，勤奋好学，工作扎实，经校推荐、县批准保送平原师范学校深造。1949年秋，学校有几位同志调离，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信念，领导指向哪里，就跟到哪里。为适应教育发展之急需，县筹建了短师班，校方根据学生志愿，征得家长同意保送吴光中、刘景文

等7名高才生入短师学习,为发展高唐教育事业输送了人才。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到了实处,教师亲身体会到党的温暖,感到从事教育工作的光荣,忠于教育事业,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了自觉行动。忆过去深受教育,看现在倍受鼓舞,可以这样说:解放初期的王庄完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1年8月

李开芳部久据高唐

——太平军北伐一百四十周年祭

史 唯 真

1853年5月13日，太平天国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北伐，从天京（南京）出发，经安徽、河南、山西进入直隶（河北省），十月末到达天津附近，在独流镇、静海县屯扎待援。1854年1月末，南进迎接，3月到阜城（属衡水地区），5月5日移军连镇（今河北省东光县），得知援军已到山东的消息。28日，李开芳即分兵630余骑，突围南下迎接援军，经德州东南转向西南，大约在途中得知援军已在临清失败，29日急穿恩县县城（今平原县恩城镇）南下，在津期店（夏津县辖）渡过了马颊河，申刻（下午四时前后）进入高唐州城，知州魏文翰闻风丧胆，投井自杀（前些年城内尚见魏所投之井，此井曰“魏公井”）。守备纪琳，千总李万化弃城逃跑，民团团团长林其购企图顽抗，被太平军击杀，太平军遂据城固守。清军胜保即日率军追赶，傍晚也达高唐，陆续调集兵力二万余人，持续九个月而未攻克高唐。1855年3月7日，僧格林沁攻克连镇，林凤祥部败没。11日，僧格林沁来到高唐，将胜保拿问解京。李开芳见僧格林沁来到高唐，知道连镇太平军失败，且高唐州城“圣粮馆已报粮绝”，遂突围南移。17日夜，出高唐东门，18日凌晨进入茌平县冯官屯。这样，李开芳部太

平军自1854年5月29日进入高唐驻扎，到1855年3月17日突围离高，共计据守高唐州城293天。人们不禁要问：这支北伐军仅有630余人，胜保率军尾随而来，李部何以能够久据高唐，又使主帅胜保“久师无功，逮京治罪”？！以下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李部这支队伍，是身经百战的太平军精锐部队，勇猛异常，清军不敢接近。具体说，这支部队是广西金田起义时组成的，即胜保所谓的“真正粤贼”。李开芳本人就是太平军自广西到南京一路打先锋的著名将领，意志坚强，作战经验丰富。相传，李开芳能文能武，一抬腿脚即可踢死敌人。李所率630余名骑兵，系经过挑选的“健卒”、“壮马”、“骁悍死党”，李开芳用来得心应手，以一当百。而清军虽众兵围城，却不敢接近、强攻，或围而不打，或打而不克，久处胶着状态。清军无计可施，遂在城北（五里铺）铸造“神威”巨炮数门（今仍可见此炮），轰开了城墙东北面一道豁口（9月3日事），但未能攻入城内。而太平军众志成城，及时堵住了口子，恢复了防御。

二、这支北伐军利用了高唐州城的有利条件，坚固设防。

高唐州城原建于明朝正德年间，清乾隆38年（1773年）改建为砖城，道光《高唐州志》、《建置考》记载：高唐城周围9华里30步，城墙高2丈，宽1丈，上有窝铺22个，垛口2640处，环城壕沟宽2丈，水深达3丈（此城墙于高唐光复后的1946年拆除）。清工部尚书翁心存（1791——1862）在太平军驻扎高唐前五年，即1849年春路经高唐州时，曾作诗称赞高唐州城墙“水云飞渡”蔚为壮观（《知止斋日记》）。

北伐军驻扎高唐州城之后，除利用了高唐州城高墙厚、壕宽水深之外，又迅速地沿城壕外围架设了栅栏，布设了陷井，还在壕沟上下设了鹿寨。如此这般，致清军叫苦不迭，非常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再说太平军在城内掘有暗道通往城外，用于夜间出城突袭敌营。这不仅可以煞煞清军的胡作非为行为，也可以夺一些粮草补给自己（群众叫“打粮”）。本来城内粮食较多，此举更加丰富了补给，因而赖以据守。李开芳临进高唐之前，知州魏文翰鉴于临清被太平军攻破后死伤人员太多，曾打开城门任地主老财纷纷出逃，殷实居民出走者也不少。太平军来势凶猛，官僚士绅、地主老财来不及转移或藏匿粮秣，不若北伐援军进入临清时（1855.4.12）那样，城内储粮被知州张积功用火烧毁，援军难以解决给养之困，也就不可能久据临清（当然援军在临清的失败还有其他主观原因）。高唐州城内粮多人少，而又“本地产硝，淋制药之具城内俱有”。太平军“遂得恃以为固”（陈思伯《复生录》）。

三、这支北伐军之所以能够久据高唐，是因为他自身纪律较好，与群众关系比较密切，取得了群众的支持。

这支北伐精锐部队是颇受当地群众拥戴的义师。调查时，老人常说太平军头蓄长发，人们叫他们“长毛”，说：“长毛”很好，买咱们的粮草给大价钱，买麸子给麦子的价钱，老百姓很愿同他们见面说话。农民常常带上饲料进城卖给太平军，农民明知太平军是反对当朝的“反叛者”，却也不怕同他们接近，有一首民谣说得好：“高唐人好大胆，拿着反叛当会赶”。至今高唐的老人还传颂着许多“长毛造反”的故事。有的说他们“傻”、“憨”，打仗出城到老百姓家找水喝

时，问“家里有人吗？”躲在席筒里的女主人顺口回答“家里没有人”，他们便扭头就走，再也不打扰人家；有的说他们慧眼识财宝，善于识破地主老财匿宝之地，因而得到不少金银财宝；有的说太平军同咱们农民关系很好，和老百姓同在高唐州衙共度春节（1855年），李开芳激情满怀，挥笔写了一幅对联，抒发他们直捣北京、决心推翻清朝的雄心壮志。这对联是：

称尔干，比尔戈，立尔矛，虎贲三千，直达幽燕之地；
辟四门，明四目，达四通，龙登九五，冲开尧舜之天。

综上所述，既表明了太平军将士们憨厚、耿直、文雅、有纪律，又说明了他们聪明、智慧、专同地主老财做对，对老百姓则是很善良的。太平军走了，人们在叨念“长毛哥，长毛哥，一年来三遍也不多”。

太平军在高唐的斗争已过去140个年头了，可是乡间人们还传诵着一首怀念太平军的儿歌：“咯登咯登秧秧，长毛来到高唐，骑着大马，拿着长枪，穷苦人家喜气洋洋，地主老财无处躲藏”。

与太平军的骁勇善战和深得群众拥戴相反，胜保军则是一群腐朽透顶、群众鄙夷的歹徒。

1、咸丰五年（1855）二月十二日朱批给事中毛鸿宾奏折中记载了胜保军“掠人财物，淫人妇女，无所不至。甚或执持器械，结党骑马，白昼闯入村庄，纷纷攘夺，近二三十里，无得幸免。”毛氏说到清军进入张庄淫掠，遭到该村众人反抗，双方发生械斗，胜保“遽令将弁……，将该村焚烧一空”。

2、时任布政使、署理巡抚的胜保随员、胜保围攻高唐

的目击者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官海见闻录》中记载着清军为了铸造巨炮“将三五十里村民釜甑概行撞碎，车运至营，民间骚扰不堪”。

“胜保往高唐时，并有随营娼棚，不但兵勇往来梭织，即将备亦复前去”，“上有好者，下必甚”。“兵气不扬，无怪贼氛难靖也”。

因此，也无怪群众称胜保为“败保”了。而对于“好杀掳掠，太平军则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英人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然而，“久住一地，必有一失”。林凤祥据守连镇307天失败之后，僧格林沁率精兵8000名南下高唐。面临强攻、孤立无援、食粮告绝的李开芳部突围向南，途中得知在平城东北18里处冯官屯有“富名闻于各府县”的大富户，村大富户多，存粮可供扎驻。于是他们在1855年8月17日凌晨，即进驻冯官屯。可是，僧军又尾追而至。当地群众说：“马尾巴咬着马尾巴地追了上去。”太平军面临着一场更加险恶的战斗！

参考书目：

- 1、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军数考》
- 2、张集馨《道咸官海见闻》
- 3、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
- 4、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 5、陈思伯《复生录》
- 6、河北、北京、天津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

集》

- 7、周家齐主撰《高唐州志》
- 8、周之桢（高唐人）主撰《茌平县志》
- 9、《胜保为督剿高唐州太平军情事奏折》

移民溯源

何庆臣

根据一九八二年地名普查和一九九〇年地名补查资料统计，高唐县居民的祖先百分之七十来自山西洪洞县。我县乃至中原几省广泛流传着一句民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何以中原几省要从山西移民？为什么又都说是从大槐迁来？

早在宋、元之际，中原各地就已烽火迭燃，广大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口有减无增。元人入主中原之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便制造民族矛盾，实行民族压迫，将各族人民划为贵贱四等。把汉族人划为最低等，从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压榨。禁止汉人持兵器，杀戮张王李赵刘五姓百姓，致使民族矛盾日益恶化，终于在元末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使战争连年不断。仅元末大战乱就发生了三次。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的“靖难之变”又使山东人民罹第四次兵灾。前后三百余年，中原人民得不到生息繁衍，必然地广人稀。

第一次战乱。不堪忍受元朝奴役，为了死中求生，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刘福通等各树旗帜，抗击元朝。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声势最为浩大，他们“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起义之民达十几万。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之后终遭镇压，苏鲁豫皖的百姓亡之七、八。

第二次兵灾。帝位的争夺是与整个元朝相始终的，仅从一三〇八年至一三三〇年的二十五年间就换了八个皇帝。诸王众将各怀异志，矛盾重重，内讧纷纷，争城夺地，相互残杀。先后在河南、山东一带，晋东、晋北、关中地区展开恶战，大量百姓在战争中无辜丧生。

第三次兵燹。在众多农民起义中，朱元璋异军突起，削罢群雄，直指元军。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扼守潼关，直捣大都。终于推翻了元朝，统一了全国。在此次战争中，又有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山东首当其冲，我县百姓也难幸免。

以上三次兵祸历时十六年。据《明史》载：“山东、北平数千里沃野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莽莽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在兵荒马乱之中，军队无粮，杀老弱为食。再加上黄河多次决口，蝗虫之火，传染病流行，百姓死亡难计其数。也如明嘉靖《高唐州志》所载：“高唐在齐颇称强庶，历汉唐以来俱为上县，自宋室南迁，遂沦夷狄中，更元季绎骚残弊极矣”。又“国朝地尚荒芜，民少土著，迁入……。百八十年来，生齿未繁，一遇早蝗，死徒多矣……。洪武二十四年，户一千二百九十六，口八千二百三十。”全县仅有八千余人，还多是从外地迁入的，可见当时的高唐县多么荒凉凄惨。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继位，其子朱棣以靖难之名起兵夺了皇位，内战四年，双方动用了几十万军队，厮杀于济南、济阳、济宁、兖州、汶上、东平、东阿、东昌、临清等地，百姓又遭屠戮，洪武年间刚刚回升的人口，又减少许多。这是永乐年间移民的原因。

战后移民充实都城或开拓荒凉之地，历史上不乏其例。秦末战乱之后，汉高祖刘邦曾徙富户充实都城长安。从东汉至隋朝都有民户的大迁移。“明太祖行事多仿汉高”，明廷为了均衡人口分布，振兴农业，恢复中原经济，为了加强国防，巩固政权，便采取了果断而强硬的行政措施，实行了大规模的历时半个世纪的移民政策，以解决“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人力不至、久致荒芜”和“累年租税不入”等难题。进行土地丈量，均平赋役。对农民“迁使课耕”，“编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有者助财，贫者助力，春耕秋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所以屡屡徙山西民户至苏鲁豫皖各省。从明太祖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六月，至明成祖永乐十四年（一四一六年）十一月，共移民十三次。据《明史》载，太祖徙民八次，成祖徙民五次。本县居民除部分来自东三府（登州、莱州、青州）外，大部分来自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及潞、泽、辽、沁、汾诸州。《明史·成祖本纪》：“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州，令其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以实河北、山东”。

由于山西表里山河，地势险固，战乱较少；还因其土地肥沃，农民殷实，生活安定，故人口繁多。这就是明廷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人们都说是从大槐树迁来？古人迷信，统治者尤甚，“洪洞”正合朱元璋年号“洪武”，地名吉祥。明廷确定从山西移民之后，便在洪洞县广济寺设局驻员，从事办理迁民事宜，发凭照川资及农耕种具等。被迁农民集中到这里，再分赴各地。《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志》载：“明初移

民，山西各州县被迁徙的百姓，指定荟萃于大槐树。大槐树在洪洞县城北望鸞门外三华里处之坡底村广济寺。广济寺位临通衢，东滨汾河，寺左有汉槐一株，高标百尺，盘日拿云，荫蔽数亩。寺内有佛塔一座，巍然矗立，上插云际。树塔参天拔地，目标显著，十数里外，清晰可见。官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然后分迁就道，各赴指定省县。”出发前，移民皆汇集于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土。迁民在新地定居后，思乡之情萦回缭绕，大槐树下的高情永志难忘，为了寄托思乡之情，便将带来的槐树种子种在房前屋后、大门内外，把槐树作为家乡的象征。有的将村名加上槐字，如在平县菜屯镇的“杨槐庄”，我县尹集镇的“朱双槐庄”，有的祠堂楹联上嵌以“槐”字，有的墙壁上书以“望槐思乡”。中原人民的植槐之风经久不衰，人们亲切地称其为“家槐”，意思是“我们永远在家乡的大槐树下”。甚至给槐树赋予吉祥而神秘的色彩，说什么“家中有棵槐，银钱自己来”，当然，不靠双手劳动银钱是不会自己来的。总之，槐树成为古人赖以生存，祝福子孙繁衍昌盛的吉祥之树。

岁月更替，星移斗转，代代相传，老幼皆知“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反而不知其具体乡村了。

郝祖修花钱买郎中

张 立 亭

清光绪年间，尹集郝家大财主的公子郝祖修和师弟二人赴京赶考郎中（清朝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由于郝平常读书不求深学，自知录取无望，就打起用金钱收买考官的主意，他在其父母的支持下，通关节，大肆行贿主考官，终于买了个郎中官职。郝祖修花钱买官，师弟不服，接连上告朝廷。不久圣旨传到，郝祖修郎中官职被罢免。一心想做官的郝祖修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仗着他昌盛的家境另寻出路，他知道慈禧太后的厉害，就拿定主意瞄准目标贿赂。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用了比上次行贿更多的金银财宝之后，郝祖修终于重新买回郎中官职。然而慈禧太后很想知道郝祖修是什么样的人，便传下圣旨召见郝祖修，这使郝祖修既惊又喜，惊的是怕露出破绽，喜的是可有出头之日了。为准备朝见慈禧他忙得不亦乐乎，差人定做了一双底厚达四寸的靴子，衣服也做得宽松肥大，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得高大威武以掩盖自己个矮体瘦的弱点。与此同时，他还用了很长时间学练朝见太后的三拜九叩礼法。将为进京朝见太后备置的专用大木轮轿车，装上许多元宝（一个元宝据说相当于五十两银子），每过一个关口都送给守卫一些银子，每到一个官府，就用大量金银行贿，这样终于得到慈禧的召见。慈禧太后知道详情后，便送他一个“富猴”的美称。从此，郝祖修的郎中一职

得到保留，“富猴”的绰号也流传开。郝祖修自知郎中的来历，所以他不轻易行施官威，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才使郝祖修及郝家人在济南大出风头。事情是这样的，郝祖修在济南西门里建有公馆，突然有一天巡警通知郝祖修搬家，理由韩复榘的大太太要住，郝祖修不搬也不加理睬，几天后的一个早上，郝公馆四周围布满了岗哨，郝祖修的五儿子（郝有六个儿）见状慌忙找他说：“您还不起床，门外都让人包围了。”郝祖修起床过了一阵烟瘾后，坐人力车来到宫茶街道西某朝廷官居住处，与朝廷官寒暄几句后，郝满脸怒色说：“不能住了，搬回王八窝去”。他把巡警勒令搬家的情况向那位朝廷官员说了一遍，那位官员马上打电话对韩复榘说：“你让搬家的那位是我常向你提起的尹集郝老伯。”韩复榘听后目瞪口呆，连说不知此事。他表示要查清此事，找出当事人坚决扫地出门，经过核查，是当地巡警恶作剧，后来当事人被革职，韩复榘又下令凡郝家的人和车在济南畅通无阻，这件事在济南引起震动，也使郝祖修知名度大增，当时尹集郝家上济南跑买卖，使用的大铁轱轮车，按规定不能进城，但只要一提郝祖修，立即放行。郝祖修在济其间，郝家人在省内外出尽了风头，各种买卖也兴旺发达。

（根据王万信、尹序更、韩其友、陈文俊、朱长贵口述整理）

万 家 洼

杨 金 龙

城西赵庄乡北部有一大片沙洼碱地，群众称之为万家洼。万家洼是两千年前黄河主流冲积而成的历史大洼。封建社会里，种地完粮，养马当差，是农民天经地义皇上封就的神圣职责，百姓种地不完粮，被官府称为刁民滑户，抗粮不交，犯有杀头之罪。群众生活在这方土地上，常年累月祖祖辈辈对这片沙洼碱地有所改造，由于受封建制度所限，自然灾害频繁，群众听天由命，种在人，收在天，种一瓢收一碗，年复一年，完上皇粮国税所剩寥寥无几，遇有大雨积水封冰过冬到来年，有时官府报灾减税，但官方层层扒皮落到农户稀松了了。种地不见收，皇粮国税少不了。抗粮不交抓人坐牢，罚款赎人造成家破人亡。曾出现卖地的还得倒付给买地人钱，目的是卸粮税。如出现个别死亡逃户，四邻代交皇粮国税，闹得民不聊生。群众流传着：万家洼里种庄稼，十年就有九年瞎；有女养到八十八，不给万家洼村民做亲家；春天有风沙遮日，夏天无雨白茫茫（碱地）；秋季大雨水汪汪，冬季远望十里无屏障。由此可见过去万家洼一带群众生活的惨景。

万家洼，顾名思义，一定是万姓家族的洼地。其实，从前这里并不叫万家洼，周围十余里村庄也没有姓万的人家。为什么又叫万家洼呢？

传说有一年，外地一单身汉流浪到高唐城，以讨口要饭

为生，冬季他打狗自食狗肉，狗皮卖掉换几个零花钱。此人姓万，因排行老二，群众送其外号“万二打狗”。当地风俗不吃狗肉，市场上更无狗肉出售。后来从南方来高唐任知县的刘大人嗜吃狗肉，县衙出高价买狗肉，也得不到县太爷的满足。万二打狗得此消息，选打好狗，肉送县衙不取分文，常此来往，县太爷认为万二打狗老实忠厚，便收留万二打狗在县衙专为县官打狗，县官送其大名叫万稀有。万二打狗从此堂堂正正的有了名和姓。三年之后，县官奉命南调升任州官，打狗行业在高唐不兴旺了，万二打狗失业，生活无着。

万稀有为养身糊口便到千里之外的南方找到了刘知州，因久别重逢彼此都非常高兴，叙谈旧情时，万稀有苦诉衷情，寒心流泪，悔当初未置买下产业落得生活无着，现年老力衰想买百儿八十亩地养老安度晚年。刘知州念其友情，答应在高唐给万稀有置买二百亩土地，并要求二百亩一块平川好地，没有坟头，留万稀有在此居住耕耘。刘知州派人携带金银来高唐重托官府，协助限期完成。高唐官府按照刘大人的要求条件召集文衙绅士商讨征用，大家认为一块二百亩平川没坟头的好地不好征，便派人在本县范围内寻找，限期将到，事无结果，县官焦急，衙役为难。这时有个姓赵的衙役，禀报县太爷说：“依小人之见，城西有一片黄河故道，千亩平川洼地，无坟头，请大人下令，小人我自愿承担此任务”。县太爷同意并派赵衙役办理，低价买地，高价要钱，赵衙役从中贪污自肥。当地群众借此买通官衙卸去好地皇粮国税，弄地立约在万稀有名下从中谋私。来人回南方后将契约奉上刘大人转交万稀有，而万稀有笑在脸上，乐在心

里，持约回县，认地耘耘，梦想享清福。可是一年四季受沙、涝、碱危害，有种无收，皇粮国税无力交纳，官衙传讯万稀有“抗粮不交，捉拿问罪”，万稀有一个人身逃，契约作废。死亡逃户，免交皇粮国税，周围群众为免税不交，把洼地都推卸在万稀有名下，号称万家洼，流传至今。

胡 家 林

吴光中 胡文集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坐落在高唐城东北约四十华里的大胡集村，曾有一片大松林，传说林中有“仙”，兴事镇邪，闻名遐迩。

明清时期，大胡集村的胡氏族人，在村北兴建了胡家林，安葬死者。这块林地，位居胡集大洼（古时为四十八顷放马场）的西南。紧邻大胡集村，是一个正方形地块，边长为265米，四周护林地各五亩，总计占地120多亩。林地为沙质土壤，高出地表面约两米，四角设石界桩，高一米半。林内尽植长青松柏，计四十八行，每行四十八株，共两千三百零四棵。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松柏树径在70厘米以上者，已达百余棵。在林地的正前方入口处，两侧各植大柳树一棵，其形状相同，侧枝相连，遮成一弧形，中间一道夹缝恰似一个大门。当你走进林地，顿觉身处林海，松柏放射出的一种特殊香味扑鼻，幽雅轻松，心旷神怡。冬去春来，胡家林多姿多彩，景色秀丽，令人向往。春季，大地复苏，春风送暖，吹绿了林地，生机盎然。但也带来了细沙，淹没了坟墓，堆起了沙丘，十里外可见耀眼“黄土山”。夏季赤日炎炎，松柏繁茂，竞相生辉，遮天蔽日，当地农民在劳动之余不时来此小憩一番。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气候宜人，年迈人带着丰收的喜悦，聚集林中，说古道今，海阔天空，享

受天伦之乐。间或有之，打扫松籽作燃料，地面的苔藓杂草随之不见了。鹊雀、乌鸦、啄木鸟、老鹰等欢腾在林中，悠游自得，其乐无穷。数九寒天，冷风刺骨，林中格外宁静，狐狸、獾、刺猥、野兔、时隐时显，使林地更加阴森凄凉。至皑皑白雪时，松柏披上了银装，一则美景尽收眼底，二则清冷异常。

壮观秀丽的胡家林，世间罕见，据说山东省内除孔林之外，要数胡家林了。由于林内遍地皆是胡氏坟墓，加之碑、坊许多，直矗其间，苍松翠柏，荫郁幽蔽，景观特殊，给人一种警幻莫测的印象。在旧社会，广大贫苦农民，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饥寒交迫，文化上愚昧落后，常常被封建迷信思想所捉弄，所以林中出现了一个虚幻的偶像——胡仙（即狐狸精意），它不时参与人间世故，铸成了骇人听闻的桩桩事端，遍及高唐、恩县、夏津、禹城、平原诸县。主要的故事有四。①1932年前夕，当地群众照惯例采松枝绑扎天灯，一为供奉姜太公；二为寓意吉星高照，来年幸福，前途光明。一位名叫“三十”的小伙子到胡家林砍松树枝，刚爬到树的高处，忽然神志恍惚，不由自主，大声喊叫：“你们看，天上来了一个戴红缨帽的！”喊罢，就从树上摔下来，命归黄泉。之后，大胡集周围村庄的百姓便流传一句口头禅：“胡家林的树——动不得”。此乃“胡仙”显灵护林所致。②某年，一推车运粮商人，夜晚路经胡家林，遇一位白胡子老头，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后唤来众徒弟，帮助推车，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推拉一个晚上还没有走出胡家林，天蒙蒙亮时，见众帮手悄然离去，运粮人累饿至极，精疲力竭，挣扎着回到家中，曰：

“中了邪”，不久便呜呼哀哉。此谓胡家林夜晚不受侵犯。

③澗河乡小华庄曾有一大财主，名叫华杏田，当过伪乡长，是高唐县老八区有名的恶霸人物，外号叫“华二少”，即华家二少爷。他见胡家林的松柏树材实在好，便兴心把胡家林的松柏树弄到手，经过苦思冥想，采取串通和威逼的方式，花钱买通了一位胡姓人，以自己买树为名，报请族人商议，族人无奈答应卖给他15棵松树。“华二少”选定吉日良辰，乘坐跑车，带上家丁和供品，来到胡家林，先摆供后作揖，然后嘟念祭词，鸣放鞭炮。就在华家家丁准备动手刨树之际，一佣人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少爷，不好了，太太疯了”！华杏田听后，大吃一惊，无心刨树了，眉头一皱喝令随从急转回家，见他老婆果真口出狂言，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以为是“胡仙”显灵作祟，故在他的酒店（小西屋）里，用红纸写了“常年上供胡仙老爷”八个大字，放在一个精制的木盒子里，上供桌，摆供品，五体投地跪拜不止，念叨：“胡仙老爷，我不刨树了，钱也不要了，饶恕我吧！”一阵祈祷之后，华的老婆还真的逐渐清醒了。此曰“胡仙”治少爷。

④1938年，二鬼子团长门五（门保信）手下的小队长姜立朝（张桃庄人），正在小华庄据点里吸“白面”（海洛因），突然进去一人对他说：“队长，你家出人命了”！姜立朝听罢，立即带护兵骑上马飞奔回家，走到董庄村后，（距大胡集二华里），姜迷糊了，马也惊了，护兵们扬鞭催马朝前奔，姜立朝的马四腿蹬开直奔胡家林，围着胡家林不知跑了多少圈，时至东方放亮，姜也明白了，拔出匣枪朝天打了两枪，大胡集村民们听见枪响，认为是鬼子进了村，急忙爬起，从西门逃之。日后，人们知是姜立朝放

枪，叫苦不迭。为此，姜立朝坐卧不安，精神萎靡，遂请道士20多人，打醮三天。此是“胡仙”治邪恶。

但是，“胡仙”毕竟是封建社会人们精神的寄托。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故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巧合、有迷信、有人为的因素和现实的需要，并无科学依据。“胡仙”是时代的“宠儿”，人们头脑里的“紧箍咒”，虚无的构想，并非真实人物，他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and 惊人的法术。要不，胡家林的消失又怎样解释呢？

1943年，高唐县灾荒甚重，穷苦大众在死亡线上挣扎。前面提到的那位门五团长，让在他手下当兵的胡××（胡氏族），以卖树的名义，门五花了一些钱，刨走了155棵大松树，随后，又有几个胡姓人卖给门五500棵松树，剩下的树也被几户胡姓人抢光了。从此，胡家林的面目全非，黄土山经过风吹雨打逐渐消失，死者的白骨露出地面，林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

1946年，高唐县全境解放。大胡集村成立了护林队，在胡家林又栽种了一些柏树，当长到有茶碗口那么粗的时候，赶上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有人决定把胡家林的柏树，移植到胡集村里，不过一夜，村中街道两侧整齐地栽满了柏树，确实美丽壮观，给大胡集村增添了光彩。但时隔不久，柏树由绿变黄，由黄变枯，死了。胡家林遭到了彻底破坏，“胡仙”也随之扬长而去，一去不复返了。这说明胡家林中无“胡仙”，“胡仙”不是“仙”。

王辛庄民兵叛变真相

张艺民 孔宪忍

1946年秋，我县全境解放。但是溃散的伪顽残余，贼心不死，加紧垂死挣扎，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其中一部分残匪散而复聚，重新拉起反动武装，集结在我县东部一些村庄，秘密与隐藏在解放区西部村庄的反动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里应外合的勾当。他们秘密串通组成武装匪特团伙，潜入解放区，制造出一起起破坏我基层组织、残杀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严重事件。我县城南聊禹公路西侧的三区王辛庄就曾发生过匪特策动民兵叛变投敌和惨杀革命干部群众的事件。

王辛庄是1945年底解放的，解放后不久就建立了民兵组织。1946年9月间，村民兵队和邻村东侯长屯、曹庄等三村联合成立了民兵联防队。民兵、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保卫着人民的胜利果实。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王辛庄有一个名叫王信芝的中年人，就是隐藏在群众中的一支毒箭。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伪顽刘文学部当兵，其间结识了不少狐朋狗友。1945年刘文学部被我军打垮，王潜逃回到解放了的王辛庄家，可他并没洗新革面安分守己重新做人，向人民靠拢，而是死心塌地继续与人民为敌。他经常以轧棉花赶集卖皮棉为名，与盘踞在我县徒骇河畔夹滩村一带的杨敬斋匪部相勾结，报告我解放区的政治军事情况，回到村里造谣惑众制造混乱。1946年阴历九月下旬的一天，他来到距夹滩

村不远的傅桥村匪巢，与他在刘文学部为匪时的老相识王立亭见了面，王立亭在杨敬斋部陈振兰指挥的高唐县匪先锋大队任大队长。两人一番密谋，制定出策动王辛庄村民兵叛变投敌计划，预谋了王立亭亲自带领匪特到王辛庄搞破坏活动并杀害干部群众的方案。王立亭当场交给王信芝手枪一支、匣枪两支、子弹若干发，还规定了王立亭股匪以我县大队的名义进村用暗号联络，王信芝充当内应人员，脖子上扎白毛巾作为联络标记。

王信芝按照他与匪特共谋的罪恶计划，携带三支短枪回到本村，仍以轧花为幌子，加紧对民兵联防队的策反活动。他先串通曾在五区郭进城匪部当兵、溃逃回村后又当上民兵联防队长的焦振生及动摇分子民兵指导员马振平、民兵中队长白善德和王宝善等人。他们多次在王信芝家秘密开会，密谋行动步骤。王信芝把带回的三只短枪除自己留用一支外，另两支分别交给焦振生和王宝善使用，然后在王信芝的主持下进行了分工：由焦振生杀死村农会主任马振彪，马振平负责绑架村妇女主任张秀英，王宝善负责打死村党支部书记王天梅，王信芝负责全盘指挥，焦振生同时负责集合民兵叛逃。

他们密谋策划之后，王信芝再次去夹滩向匪首王立亭作汇报，同时确定腊月初十晚上为行动日期。王信芝要求王立亭带匪徒进村接应，并当场指定由马振平在东寨门联络指引并发暗号。腊月初十夜，王信芝、焦振生、白善德、王宝善等都各自按密谋分工，脖子上扎着白毛巾上了东寨门，约十点来钟，王立亭便带着十多名匪特来到王辛庄东寨门外，王立亭冲着寨门上的人叫着马振平的小名：“寨门上是五生

吗？”马振平借月光已看见人影，便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匪特们答：“我们是县大队的。”马振平见对上暗号，又喊了声：“开开西寨门打取舅子。”匪特们都明白，这是让他们快去进西寨门的暗号，于是快步转到西寨门。在西寨门等着的焦振生、王宝善、白善德、王信芝借月光冲着外边的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匪特们答道：“我们是县大队的，借个火吸烟，”王信芝、焦振生见对上暗号，遂按密谋打开寨门放“县大队”的人进了村。匪特们与王信芝、焦振生等人见面后便都上了寨门。这时离他们不远的农会主任马振彪见不当民兵的王信芝也出现在寨门上，而且焦振生、白善德等人与“县大队”见面举动异常，尤其看到“县大队”进村后不去民兵队部，都上了寨门，他觉察有诈，于是悄悄溜下寨墙，钻入黑暗处逃得性命。民兵积极分子王保坤这时也在寨门南边寨墙上，他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听匪特队长王立亭问：“你是保坤吧？”王保坤一听口音不对，觉得不好，忙举枪射击，可一枪没打中，却被王立亭一枪击中头部倒在寨墙上。

不多时，焦振生以联防队长的名义把十五名民兵集合在寨门外场院里，王信芝、王宝善、白善德等人捆来了村党支部书记王天梅，马振平捆来了村妇女主任张秀英。

匪特们妄图继续查找马振彪，但又不^敢久留拖延时间，害怕区人民政府闻信调来外村民兵包围他们，正准备带着十五名民兵和我方人员以及抢来的十七支步枪撤离时，竟碰上了马振彪十二岁的孙子马金玉。王立亭、焦振生、王信芝等匪徒拥上去一阵拳打脚踢，小金玉便昏死过去。他们认为金玉已死，便押着村支书王天梅和妇女主任张秀英向东而去，

过了聊禹公路约半里来路，他们就开枪杀害了王天梅同志。他们撤离后，金玉苏醒过来，幸免于死。

事隔二十天后，匪特才把被绑架的妇女主任张秀英放回。不多久这股武装匪特被我军打垮，这伙反动分子先后受到制裁。1947年白善德在王辛村被人民政府枪决，王宝善逃往济南病亡。主犯王信芝逃往哈尔滨市，1954年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955年11月26日被判处死刑，在高唐县城召开公审大会，同焦振生一起被枪决，马振平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杀人魔王刘昭祺

孔宪恩 张艺民

“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烽火风起云涌，众多热血青年慨然走上抗日前线。各种旗号的抗日武装也相继成立，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是，也难免泥沙俱下，一些地痞流氓和兵痞恶棍乘机以抗日为名，打抗日旗号拉土匪武装，烧杀抢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给日寇铁蹄蹂躏下的穷苦百姓带来更加沉重的灾难。杀人魔王刘昭祺的罪行就是典型例证。

刘昭祺，1917年出生在原清平县第一区韩庄村（今赵寨子乡西韩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其生父赵荣庆把他送给清平县刘海子村（今清平镇刘海子村）刘庆合为义子，改姓刘名昭祺。

刘昭祺自幼好逸恶劳不务正业。1938年他因贩毒被清平县伪县长冷玉璞扣押，后留在伪清平县府常备队当兵。从此，他从贩毒走上兵匪道路。他先后在郭瑞林、伪顽齐子修和伪阮专员等部当兵数载。之后刘昭祺又网罗闫友义、叶金山、王其洪等地痞流氓恶棍一百余人，收集民间长短枪一百余支，拉起土匪武装，盘踞在清平县一区商庄一带。先后被伪阮专员委以清平县保安第八团团长和被伪清平县长冷玉璞委以清平县第一区区长等职务。他本性凶恶狠毒，依仗有一百余人一百多条枪的土匪武装横征暴敛，鱼肉百姓，

大开杀戒。凡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有过前嫌纠葛的人以及闻说对他有不睦之举的人，他都不放过，先杀为快。他对因贩卖鸦片毒品被伪清平县长扣押一事总是耿耿于怀，后听说是刘海子农民刘瑞文告的密，他为泄私愤杀害了刘瑞文父子。1939年1月，刘昭祺探听到与他的部下传达长王其洪有矛盾的清平县一区西仓村农民王其胜去清平县新城所在地办事，就与王其洪等匪徒埋伏在清平城西老官庄设卡堵截，把从康庄办事回来的王其胜截住捆绑起来随走随打，还割去王的一个耳朵，砍去王的一只胳膊，最后把王押到刘海子村西杀害了。事隔不久，刘昭祺又带领闫友义、孔庆生等匪徒杀死了刘海子村农民刘昭文父子二人。当年秋天，刘昭祺和他的部下在清平城西一带活动时偶遇刘海子村刘××的舅舅（博平县娄庄村人），刘昭祺听说此人存有步枪子弹，便向其逼要，最后刘某的舅舅被逼无奈投井自杀。他们还杀死一区仓上村（今清平东仓、西仓两村）伪乡长周茂成叔侄二人。在去收缴清平一区芒庄村民团的枪支时又当场杀死二人。尤其残忍的是，他的生父赵荣庆与本村农民张思敬有家仇，刘昭祺早就为此怀恨在心图谋报复，1941年7月间，他带领匪徒一百余人包围了韩庄村，将张思敬一家老少十三口，其中还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女人，押往他的匪巢一区芒庄村严刑拷打折磨后，残忍地用铡刀铡死，用刀砍死，没留一具囫囵尸体。此事过后没多久，他又以盗卖枪支的罪名把他的部下赵荣臣、邱继明等人杀死。韩庄村农民闫振殿不知何故以前与刘昭祺本姓三哥赵庆合结下冤仇，刘昭祺得势后并没把这事放过，指使赵庆合带人去杀闫振殿，未抓到闫振殿便把闫的妻子和女儿残杀。后来刘昭祺又返回刘海子村，用同样残忍的手段杀

死刘海子村农民刘瑞居父子二人……。清平解放前夕，刘昭祺畏罪逃往济南，其间他从济南潜回刘海子村向刘二标索要枪支未果，便将刘二标杀死。1944年秋天，清平已解放，刘昭祺又从济南伙同他赵姓族弟赵木申及高唐贯匪李连祥的部下，潜回韩庄村。他探听到张思敬的胞弟张思颖在张庙亲戚家住着，于是他派赵木申带匪徒数人在一天夜里把张思颖父子二人堵在张庙亲戚家杀死。

刘昭祺依仗恶势力草菅人命。据案卷记载从1938年至1945年间他亲手或指挥他人杀死三十一人，另外还有多人已无法查寻。他所杀的人绝大部分是善良本份的农民，还有女人和孩子。刘昭祺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当地平民百姓对他无不恨之入骨。解放后，我公安机关在济南将他逮捕归案。1956年6月在清平古城召开群众大会，判处刘昭祺死刑并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更 正

第一辑《高唐文史资料》载《高唐南北团情况片断》一文中，“张仁廷在城内文庙小学组成抗日自卫团”句，应为“张辅廷在城内文庙小学组成抗日自卫团”。

